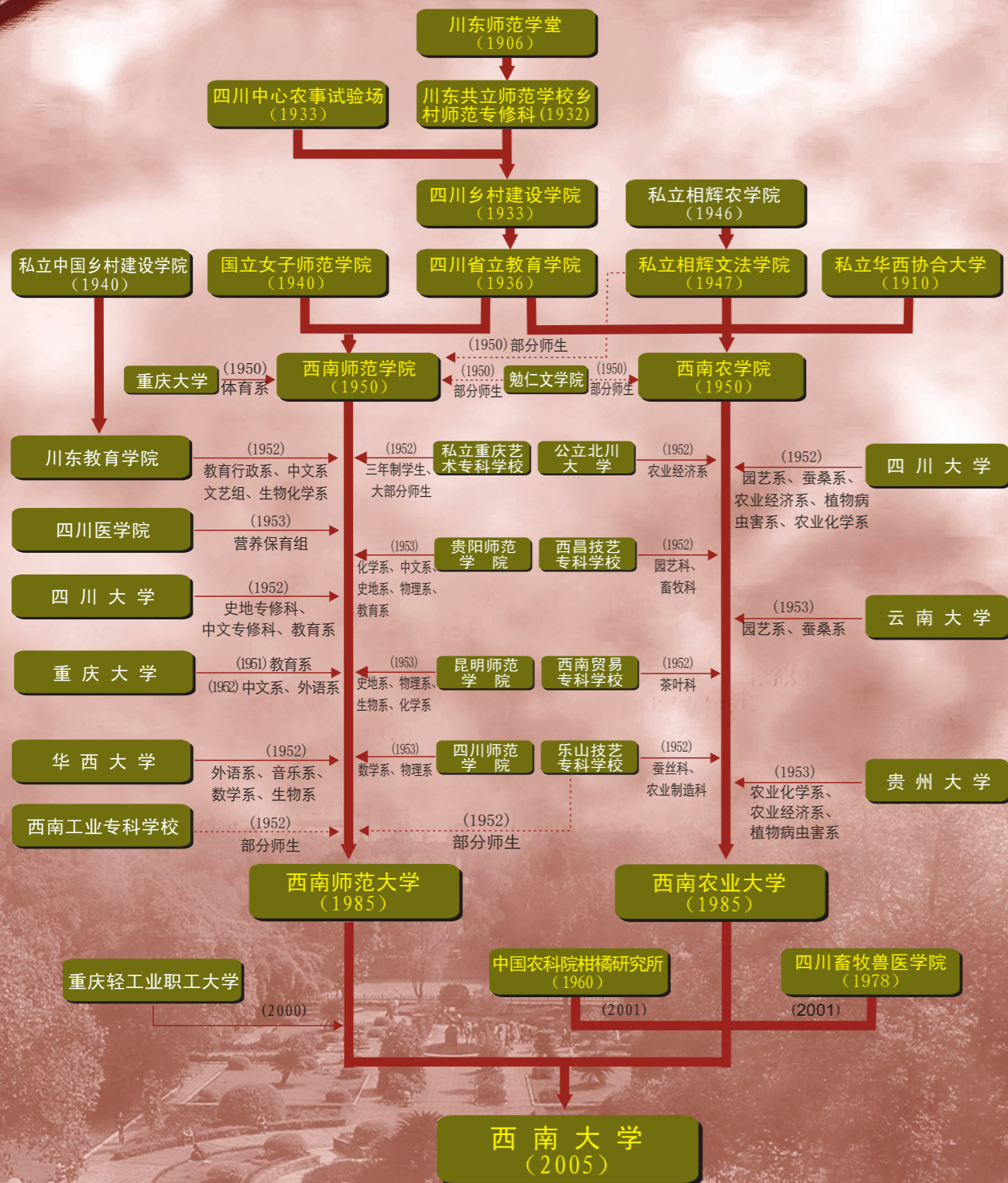




历史沿革

LISHI YANGE

西南大学记忆



◆ 名师风采

甘绩镛与川东师范学堂
身处军政要职 肩挑教育重担
识得“葡萄”只姓苏



◆ 档案拾遗

档案中的川东共立师范学校

◆ 校史校情

西南大学寻根（之七）
《海瑞罢官》中的吴宓
校地合作，比翼双飞
他眷恋着这方热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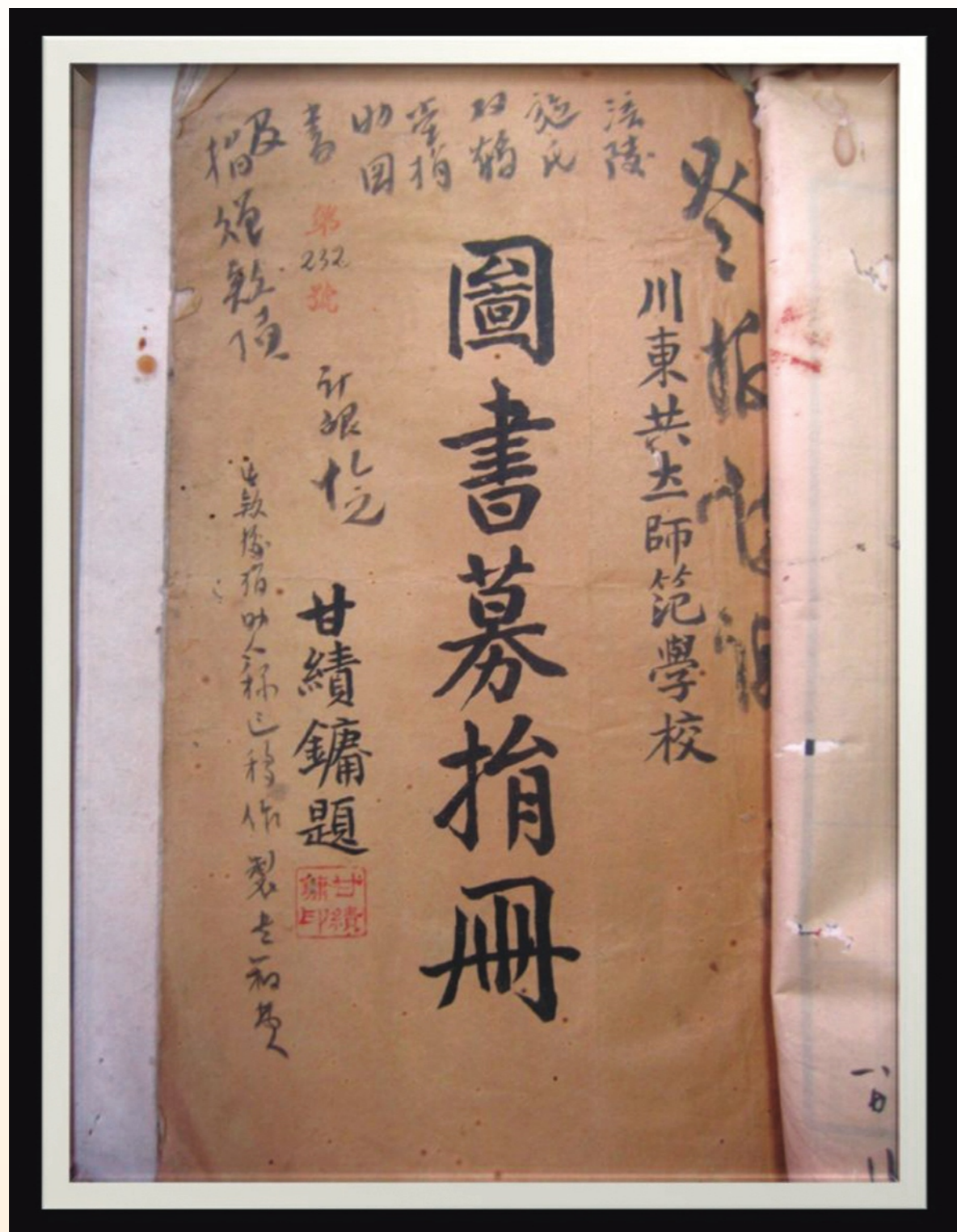
（注：2008年12月，西南大学档案馆经广泛查阅资料，修订并完善了西南大学发展沿革图）



主办：西南大学档案馆
校史研究室

2010年第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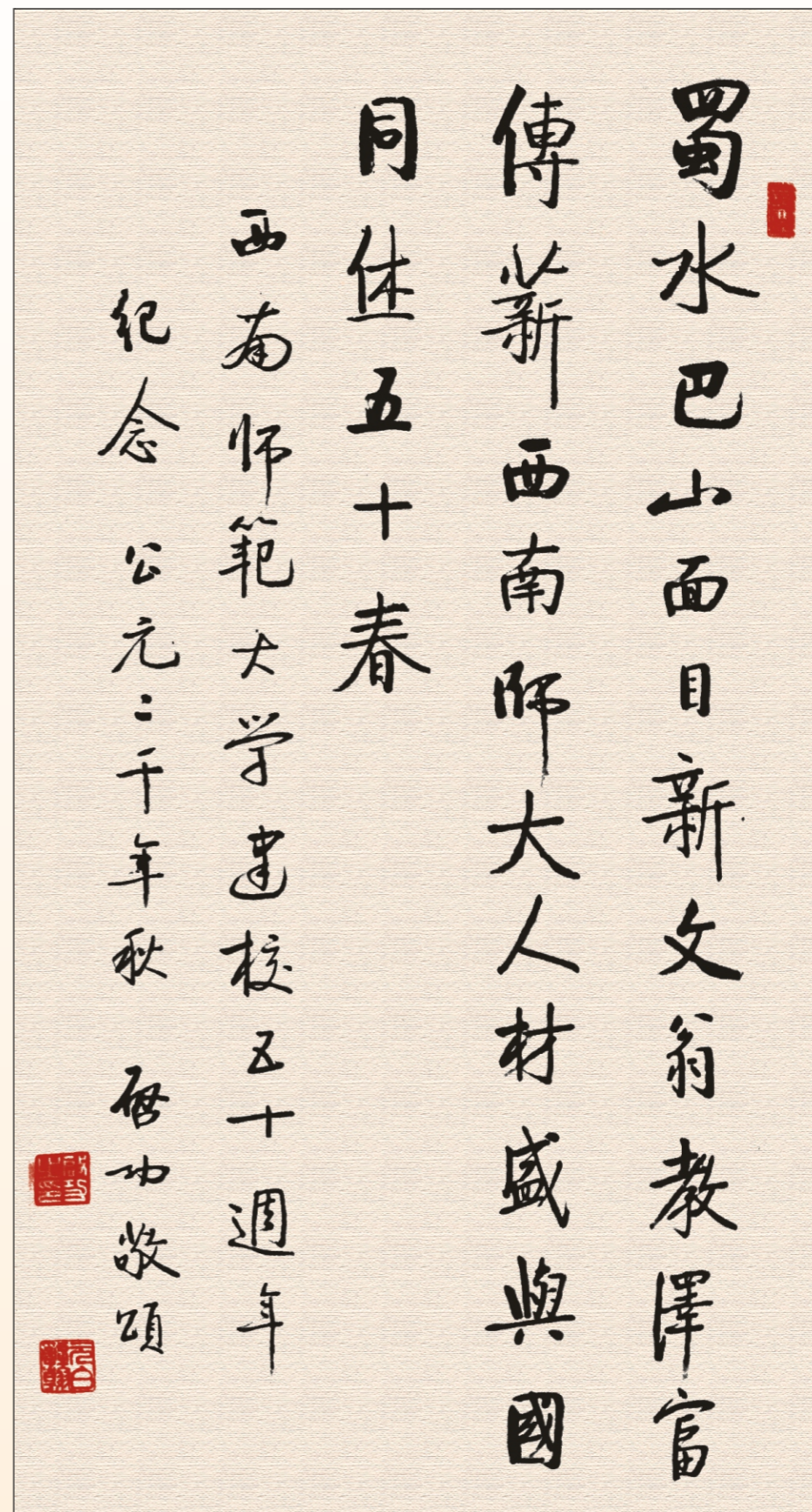
（总第8期）



甘绩镛题写的《川东共立师范学校 图书募捐册》封面^①

^①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0129-02-160。

川东师范学堂创建于清光绪三十二年（一九零六年），校址初设在重庆学政试士院，后迁到巴县文庙（今解放东路黄学街），解放前夕迁至石马岗。一九一四年改名川东联合县立师范学校。一九三一年改名川东共立师范学校。一九三五年改名川东联立师范学校。一九四零年改名为四川省立川东师范学校。



启功先生于2000年为西南师范大学建校50周年作^①

^①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SW-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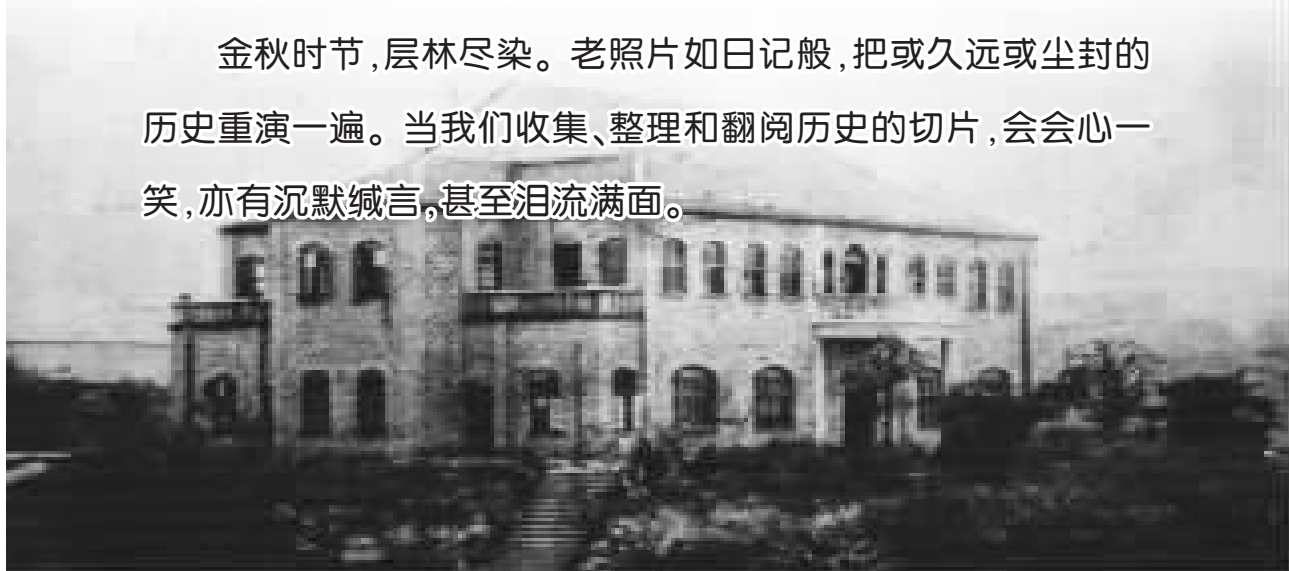
刊首语

□文/蒋 涛

历史的记忆,不仅能够穿越时空,还能逾越心灵的阻隔。戏剧如此,老照片亦如此。《西南大学记忆》作为一本记述历史的杂志,我们想达成这样的野心:提供一份镌刻在史册上的视觉记忆。那些被定格在镜头中的历史,那些史无前例的年代,将通过《影像记忆》栏目为您倾情呈现。

留存的影像——历史的切片,为我们轻轻开启了似水流年的记忆之门。发黄的像片、古老的像纸以及褪色的像册,绕过久远的暮霭与白昼,绕过冷暖交织和顺逆更替,像历史书籍里缤纷的书签,安静地守候在《西南大学记忆》里。

金秋时节,层林尽染。老照片如日记般,把或久远或尘封的历史重演一遍。当我们收集、整理和翻阅历史的切片,会会心一笑,亦有沉默缄言,甚至泪流满面。



西南大学记忆

2010年第3期(总第8期)

主办：西南大学 档案馆
校史研究室

顾问：张跃光 丁忠民
李 兰 徐仲林

刊名题字：袁隆平

主 编：邓 力

执行主编：蒋 涛

副 主 编：李亚勃

执行编辑：徐 林

编 委：邓 力 潘 洵 蒋 涛
刘重来 李亚勃

编 辑：马云飞 朱 林 朱文婉
唐朵朵 韦雪贞 姜海庭
陈 娜 杜玫娟 王 贤
张小兰 姚 恒

美 编：覃 奋

校训：



目

刊首语..... 蒋 涛

名师风采

4 甘绩镛与川东师范学堂 陈 娜

7 身处军政要职 肩挑教育重担 唐朵朵

12 识得“葡萄”只姓苏 陶昌馨

档案拾遗

18 档案中的川东公立师范学校

校史校情

22 西南大学寻根(之七)

——西南师范学院的发展 张晓华

29 《海瑞罢官》中的吴宓

——解读《吴宓日记》一则 刘重来

38 校地合作,比翼双飞

——记西南大学科技扶贫之石柱模式 马云飞

45 我的“大跃进” 王远伦 郭 兰

录

校友天地

50 他眷恋着这方热土 韦雪贞

西大地标

54 园中之园 王远伦 郭兰

57 六角塔的来历 郭兰

兼葭之声

58 当我们想起年轻的时光 吕进

他山之石

65 走进兰州大学博物馆 杜政娟

影像记忆

69 学生塘 王贤 牟乔雅

封面人物 甘绩镛

封二 甘绩镛题写的《川东共立师范学校 图书募捐册》封面

封三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启功先生作品

封底 西南大学历史沿革图

Memory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让我们共同书写记忆,为
西南大学创造希望与奇迹!

本刊地址: 重庆·北碚
西南大学档案馆
校史研究室

联系电话: 023-68252544
15923240270

校史馆参观预约电话:
023-68252544

投稿邮箱: xdjy2009@126.com

邮 编: 400715

照 排: 重庆新综艺图文广告

记忆:



编者按:甘绩镛(1888.11.19—1962.11.24),号典夔,四川省荣昌县(今重庆市荣昌县)人。1928年至1935年任川东师范学堂(西南大学前身之一)校长,西南大学的校训“含弘光大 继往开来”正是甘绩镛在1928年任校长时所题。甘绩镛在任之时正值军阀混战,学校经费紧缺,濒临绝境,他临危受命,四处筹款,复兴川东师范学堂。与此同时,他积极创建四川乡村建设学院,支持卢作孚组建中国西部科学院。在军政界,甘绩镛解放前历任二十一军财政处处长、川军税捐总局局长、川东道尹、军政务处处长、四川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等军政要职。解放后他参加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随后在四川省文史馆作馆员,并担任成都市人民代表和省政协委员等职。本期《名师风采》收录了《甘绩镛与川东师范学堂》、《身处军政要职 肩挑教育重担》两篇文章,分别介绍甘绩镛振兴川东师范学堂的教育事迹及他的生平经历。

甘绩镛与川东师范学堂

□文 / 陈娜 整理编辑

甘绩镛先生青年时期,认为发展工矿实业可以救国济民,乃去成都四川全省中等工业学堂就读,毕业后很想升学深造,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宿愿未遂。因自为长子,返而求业养家,乃辍学就业。他经过仕途历练,深感人才可贵,而人才又需要教育培养,因此教育事业之兴衰,直接关系到国家之百年大计。人才辈出,大可以建功国家民族,小可以有益乡里。因此,先生把兴办、扶持教育事业引以为己任,只要有时机,便竭尽全力,兴办教育,对重庆地区及川东数十个县的教育事业都作出了很大贡献,其中一件就是振兴了川东师范学堂。

川东师范学堂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由川东道尹张振兹倡议创建,拨库银五万两为学校基金。校址初设在重庆学政试士院,后迁到巴县文庙(今解放东路龛学街),以后又迁到石马岗,直至解放前夕。川东师范学堂数易其名:1914年,川东联合县立师范学校;1931年,川东公立师范学校;1935年,川东联合师范学校;1940年8月,四川省立川东师范学校。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连年军阀混战,四川军阀混战中,川东三十六县被大小军阀分别割据,成立了防区,防区内所有一



甘绩镛先生

切,都是军阀们私人所有,各县按规定应交到学校的经费,全被停止。学生无饭吃,教职工无薪金,校长去留,一年数易,前后几任校长,都变卖校产,艰难维持。到1927年周天治任校长时,情况更为恶化,学校濒临绝境。

1928年甘绩镛先生就任川东道尹,奉二十一军军长刘湘^①之命,到川东联合县立师范学校去宣布停办学校的决定,安置师生,处理校产。刘湘要停办学校,理由是经费无着,师生情况复杂,经常闹事。实际情况是学校师生思想进步,革命热情高,关心国家民族的兴衰命运,积极参加当时的革命斗争。川东联合县立师范学校学生联合会总部、重庆学生联合会总部,均设在川东联合县立师范学校校内。先生到校后,首先安抚师生,调查情况,广泛征求意见,了解到川东联合县立师范学校是培养师资的重要基地,学生来自州县,普遍家境贫寒,朴实勤奋,读书求学心切。先生深深同情学生失学之苦,而这里又是清寒学子就读的优良场所,认为这样的学府,不应停办,而应该振兴,把它办好。于是甘绩镛先生提出整理内部,清理各县经费,改组校维持会为校董事会。校董们一致推选甘绩镛道尹兼任校长。甘绩镛接受了校董们的推选,决心把川东联合县立师范学校继续办下去。甘绩镛即委以校董张德敷、杜香樵、张体杰、李次伯等分别担任教务主任、训育主任、斋务主任、事务主任,以张德敷为总务主任,总揽校内一切事务

(兼管教务)。

甘绩镛为学校的振兴和发展,1929年将学院街旧校舍出卖,另在两路口石马岗购买大幅田地修建新校。由于施工抓得很紧,新校很快建成。1930年末学校即迁到石马岗新校址上课。修建新校,购置仪器、图书及各种设备需款甚多,出卖旧校址的收入远远不敷。甘绩镛除自己慷慨解囊,捐助一部分外,并亲向重庆商界及知名士绅募款筹集,各界知名士绅深知甘绩镛之为人行事,廉洁奉公、作风正派,因而无不慷慨解囊,从而使学校所需款项迅即如数筹足。

新校就绪,甘绩镛亲自主持制定校歌,多次向师生讲述其具体涵义,勉励学生身体力行。他倡议建立周会制,常在学校礼堂周会上,给学生讲话,勉励学生勤学、修身、立志,富国强民,情真意切,学生深受感动,学习情绪十分高涨。

1932年甘绩镛就任二十一军政务处处长,综理辖区七十二县民政、财务、教育和建设。先生极为重教,为放手整顿全区教育事业,撤换了一些不称职的校长,从多方面解决学校中存在的问题,提高教学质量,并商请张德敷担任教务处教育科科长,商请聂荣藻任教务主任,为学校发展奠定了基础。先生深悉学校现有经费难供发展之需,在整顿全区教育经费时,先生为学校争取得到在全区屠宰税中每只猪附征一角,作为补充经费。至此,学校经费足、教师优、设备齐、教学质量高、学生勤奋好学,给社会留下良好印

含弘光大
继往开来

1928年川东联合县立师范学校校长甘绩镛题“含弘光大 继往开来”(现为西南大学校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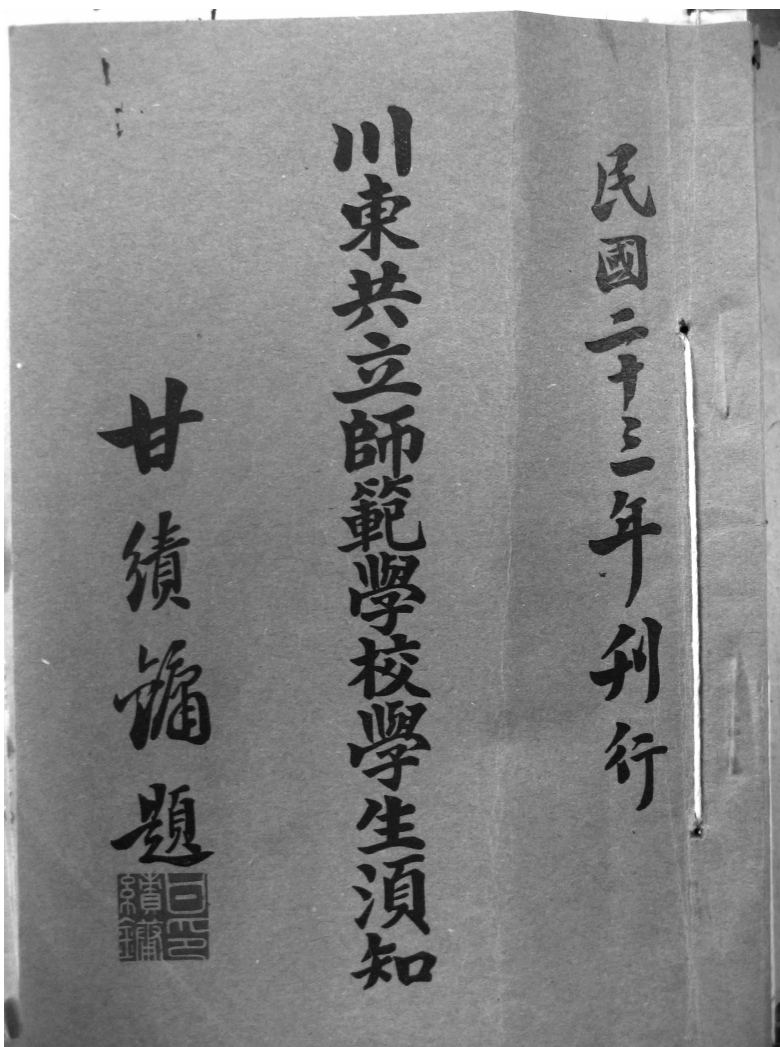
^① 刘湘(1888—1938),男,字甫澄,四川大邑人。曾参加辛亥革命,历任川军第二师师长、川军总司令、四川善后督办和四川省政府主席等职。

象。1932年夏，毕业生参加全区七十二县高、初中毕业会考，十七班的学生吴继先、十九班的学生杨鹤鸣，分别获得高、初中毕业会考成绩第一名，校誉更为大振。为时不久，学校再加发展，停办前期师范，改办后期师范，增设高、初中班。由于就读本校的多系贫寒子弟，为奖励、资助优秀学生，先生自捐款项设置了“典夔奖学金”，每学期评发一次，奖四、五十元，此外，先生对于学生在生活上特有困难者，常

按其具体情况给予资助；对于毕业后有志返原籍教书、办学者均一一函荐回县，助其献身教育事业，服务桑梓；对于考上大学深造、而经济困难者，则汇款资助，促其完成学业。

1935年2月，先生在渝就任四川省民政厅厅长，7月，省政府迁成都。乃辞去校长职务，由董事会总务主任聂荣藻接任校长。

由于先生振兴和发展学校不辞辛劳，有所贡献，对学生循循善诱，多方关怀爱护，因而深得全校师生的崇敬、社会的好评。他离校后，学校将图书馆改名为“典夔图书馆”，以示纪念。在1928—1935年间历届毕业生，对先生多具好感；1935年后，众多同学相聚，每谈及先生时，都以“典夔校长”、“老校长”亲切



1934年甘绩鏞题写的《川东共立师范学校学生须知》

相称，不因为他从政多年，而视同一般官吏。

为躲避轰炸，学校于1939年5月迁至四川江津白沙镇继续办学。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5月，学校从江津白沙镇迁回重庆石马岗原址。新校建成后，在校内建有“复兴亭”以示纪念。亭上刊有碑文，记述了川东师范学堂的创建及振兴始末。其后，于1948年，又于校园内建立了“典夔纪念亭”，专记甘绩鏞振兴川东师范学堂的功绩，碑文为当时重庆大学理学院院长何

鲁用魏碑体书写。解放后，1951年在院系调整中，重庆市政府将该校与歌乐山重庆市立师范学校合并，将环境优美的校园改建为“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两纪念亭及碑文均被拆毁。

参考文献：

[1]许增纮，潘洵.川东师范学堂与西南师范学院的组建[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5月，第31卷，第3期

[2]甘新春.甘典夔振兴川东师范和为重庆地区教育事业作出的贡献.川东师范，2001年

（责任编辑 李亚勃）



身处军政要职

肩挑教育重担

文/唐朵朵 整理编辑

西南大学北大门有一块特别突出的绿茵草坪，草坪形成八个大字——“含弘光大 继往开来”。这八个字是我校校训，自 1928 年提出直至今日仍影响着代代西大人，它的提出者正是时任川东联合县立师范学校校长的甘绩镛先生。

甘绩镛，号典夔，四川省荣昌县（今重庆市荣昌县）人，在军、政、教育“三界”颇有成绩，军政人士的魄力与教育家的儒雅在他身上融合，可谓“文武双全”。1912 年至 1938 年，他历任二十一军财政处处长、川军税捐总局局长、川东道尹、军政务处处长和四川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等职。大革命时期，吴玉章^①回四川整党，在重庆莲花池成立四川省党部，甘绩镛在此参加国民党。解放初，他在成都又参加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随后，在四川省文史馆作馆员，曾为成都市人民代表、省政协委员。1962 年 11 月 24 日，他在成都东门街寓所病逝，享年 74 岁，安葬在成都北门外磨盘山公墓社会名流区。

忠于职守 为所当为

甘绩镛家世代以耕读传家，后裔中儒生不少而居官者不多见。他聪慧奋勉，幼承庭训即知发奋自强。年龄稍长，他渐渐感觉社会腐朽堕落、国困民穷，甘继镛认为发展工矿实业可以救国济民，于是去成都参加考试，进入四川全省中等工业学堂就读。甘绩镛为家中长子，毕业后，原想升学深造的他由于家庭经济困难，被迫归返求业养家。

返家后，在亲友的帮助下，甘绩镛在川军彭林围营充任书记官。不久，又被推荐到川军第一师第二营担任同职，营长刘湘对他颇为器重。甘绩镛为人长厚，对上不阿谀逢迎，对下能宽容爱护，从 1912 年至 1938 年 2 月，担任刘湘的僚属，与上级、下属以及同仁互相尊重，相处和善。这二十几年间，他历任铜梁县知事，二十一军财政处处长，川东税捐总局局长，

^① 吴玉章(1878—1966)，男，原名永珊，四川荣县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曾加入同盟会并参加辛亥革命。1915 年与蔡元培等倡办勤工俭学会。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参加南昌起义。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院长、中国教育工会主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

川东道道尹,二十一军政务处处长,四川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等职。1938年刘湘去世,他接任四川省财政厅厅长,1940年组建四川省政府县市财政整理处,自兼处长,1941年兼四川省田赋管理处处长,后就任川康区食糖专卖局局长。1944年,甘绩镛因为“社会贤达”名声在外,被选为国民参政员。国民参政会撤销后,他隐居在成都西郊百花潭,荒园一片,陋室数间,恬然自若,未再与闻政事。

甘绩镛忠于职守,为所当为。从政有年,据要津

而不骄,遭冷遇而不恼,累经浮沉,均能泰然自处。他教诲子侄,常说:“作事应求为所当为,无愧于心,是非穷达何足计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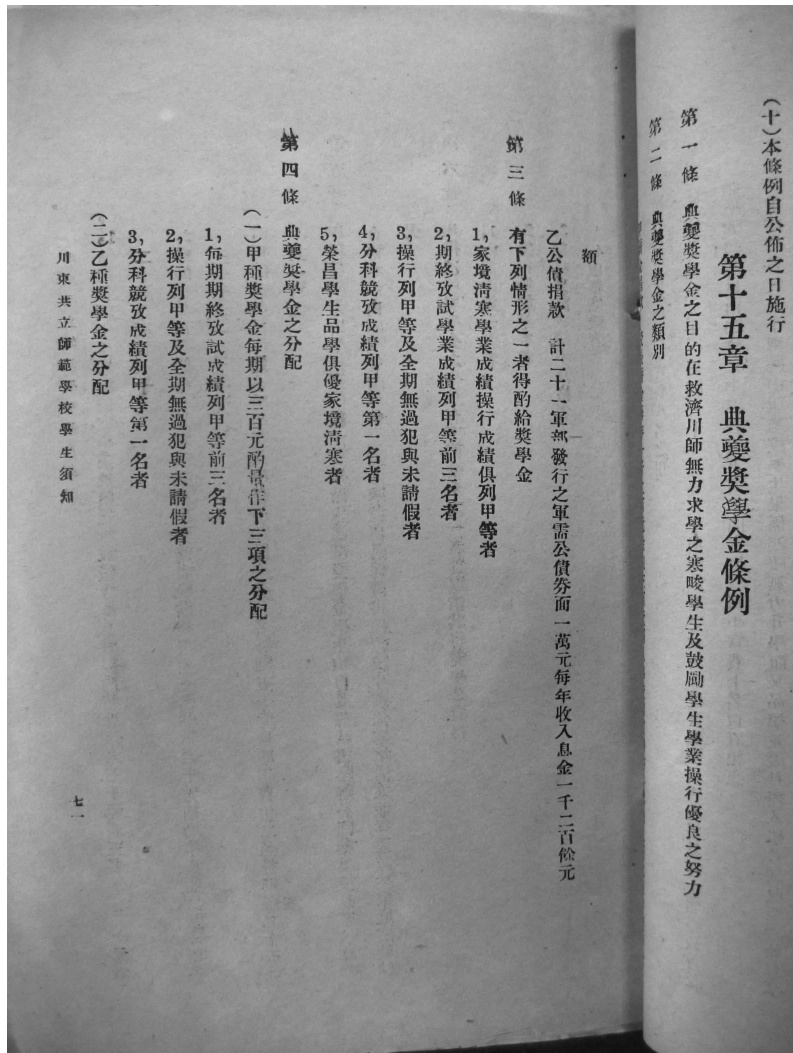
办学建校 竭尽心力

或许是因为早年被迫离开校园,未能完成自己深造的心愿,一直觉得遗憾在心,甘绩镛对学生常常寄予厚望。再加上,军政界多年的历练让他深感人才可贵。而人才的培养首先就依托教育的发展。因此,他一直认为当官就要为民造福,扶持教育事业更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在他从政期间,虽然工作的涉及面非常广,但他特别关注而且也自愿竭力支持的就是教育事业的发展。他意诚志坚,上下同仁、乡邦人士多愿协同尽力,因此倡议举措常能如愿。他对重庆地区及川东数十个县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

(一) 振兴川东联合县立师范学校、川东共立师范学校^②

“母校川东师范是在清末戊戌维新运动的影响下,在提倡科学、废除科举、兴办新学的浪潮中,于1906年(即光绪32年)创立的。由于种种原因,几迁校址,领导多变,校长频频更替。其中,由甘典夔担任校长,于1930年在重庆两路口石马岗购置大片土地,新建校舍,进行振兴之后,是极盛时期。”^③有校友如是回忆道。

甘绩镛在任时期的校园发展情况从校友的文字中可以看到,“这时校园规模宏大,由于大量购置教学



典夔奖学金条例(部分内容)

^② 川东共立师范学校,是西南大学前身之一。1906年,川东师范学堂建立,1914年改名川东联合县立师范学校,1931年改名川东共立师范学校。

^③ 来自余时伟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647f29060100gp4a.html。余时伟,曾是川东师范第四十五班乙组学生。



设施、图书仪器、体育器械等等,教学设备完美齐全,在当时堪称第一流。并以高薪聘请社会名流、专家学者到校任职、讲学和执教,制定校徽、校训、校歌、校规,实行周会制,设立‘典夔奖学金’,奖励成绩优秀学生(每学期领奖一次),资助贫困学生就读,对直接选送和考试升入大学的经济困难学生,亦加以资助,让其完成学业。由于学生多来自专县,艰苦朴素,勤奋好学,加上教师好,教学质量高,又受到革命传统的熏陶,因而培养出来的学生品学兼优。1932年夏,川师毕业生参加二十一军辖区七十二县高、初中毕业生会考,十七班学生吴继先,十九班学生杨鹤鸣,分别获得高、初中毕业生会考第一名,川师的校誉,为之大振。”^④

学校虽然得以振兴,但是在那个动荡的社会,很

多事情都是未知,身在军政教育三界的甘绩镛,很多时候不得不花出精力处理三者之间的矛盾。

学校历届毕业的学生数以千计,并且在成、渝两地影响极大。因此,学校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当时国民党的两个派系,在各个方面,向学校进行渗透,以扩大自己的实力。但是,他们受到了师生的坚决抵制,而且学校毕业的学生中已经出现一批进步力量,如二十班的杨照临、二十三班的周应培、二十四班范

远举、三十班的向国灵、三十七班的李光荣和四十班的罗启蒙等都是当时学校地下党团员,积极从事革命活动的。学校反动势力废除了由学校聘请教官的制度,改由军训处直接委派,这些教官便成为监视进步组织和进步师生的密探,对进步教师要马上解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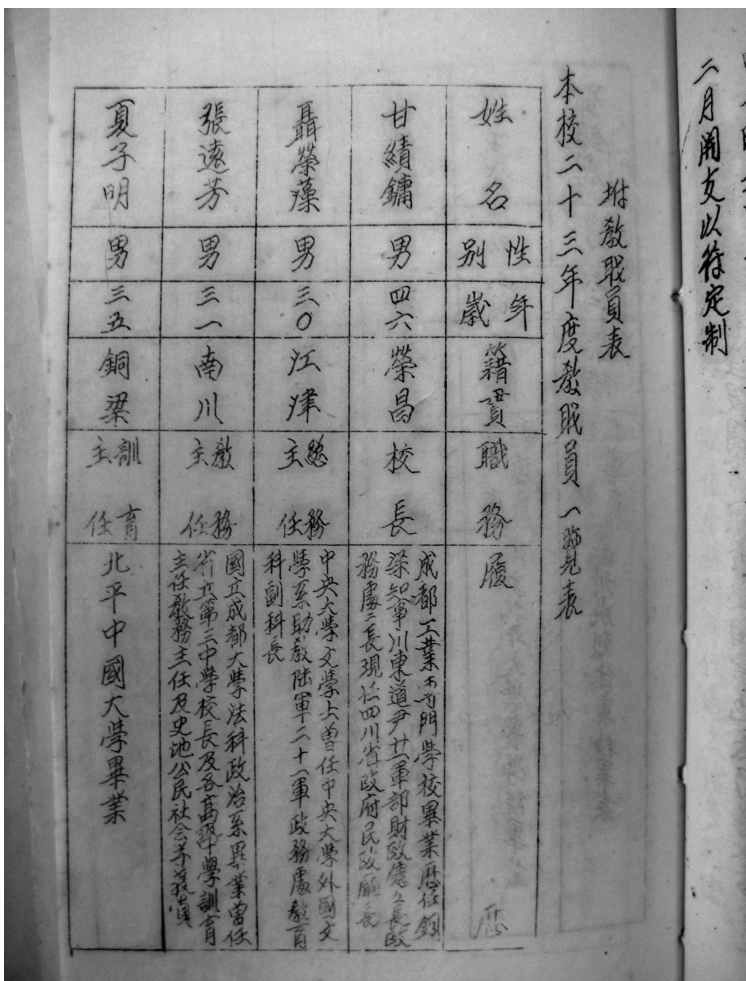
对进步学生要开除或逮捕。校长甘绩镛在政界任职,利用此种关系,采取种种办法,得以使进步教师和学生勉强无事。如生物教师邹剑隆,教务王国新等都先后受到指示说他们是共产党员,要学校马上辞聘,学校用各种借口,仍把指示顶回去了。

(二)创办四川乡村建设学院

四川乡村建设学院也是西南大学的前身之一,是在原来川东共立师范学校的基础上建立、扩展并发展的。

20世纪20年代,社会急需一大批懂教育、懂农业、

能下乡从事乡村建设的人才。乡村教育受到普遍重视,乡村师范教育应运而生。而在30年代初,川东各县所设立的乡村师范因为师资力量不足,大多有名无实。甘绩镛决定以川东共立师范学校为基地,邀请一些热心教育事业又对农村、农业素有研究的人员积极开展筹建乡村师范专修科的工作。1932年,他在川东共立师范学校内增设乡村师范专修科,专修科“以研究乡村问题,培养中级乡村师范之健全师资



联合县立师范学校教职员一览表(部分内容)

^④ 来自余时伟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647f29060100gp4a.html。

为宗旨”。该专修科于是年8月先后两次招生,9月1日正式开学。

川东公立师范学校办乡师专科后,校舍更不敷用,必须扩建。原拟将从两路口沿马路到上清寺和大溪沟一带巴县的数千亩学田移作扩大校舍和农场之用。但是,刘湘感到一个中等学校内包含一个大学不妥,而且以后市区扩大,在市区内放置一个大农场也不合适,所以决定另觅新址建校。经多方踏勘,最后

选定并购买了龙隐镇(磁器口)地藏寺土地修建新校舍。在新校舍西南半里许为中心农事试验场。乡村师范专修科的农作实习场就在中心农事试验场内。后来,又买附近凤凰山地为造林试验之用。1933年,甘绩镛将乡村师范专修科和农业试验场全部员工及机具设备科正式迁入磁器口新校舍。是年7月,四川省政府颁发《四川乡村建设学院办法及组织大纲》,并拨款4万元,正式将乡村师范专修科改为四川省乡村建设学院,开始招收本科生。时任川东公立师范学校校长的甘绩镛兼任该院院长。1935年,甘绩镛任省民政厅长后,辞去院长职务,二十一军政务处副处长高显鉴接任院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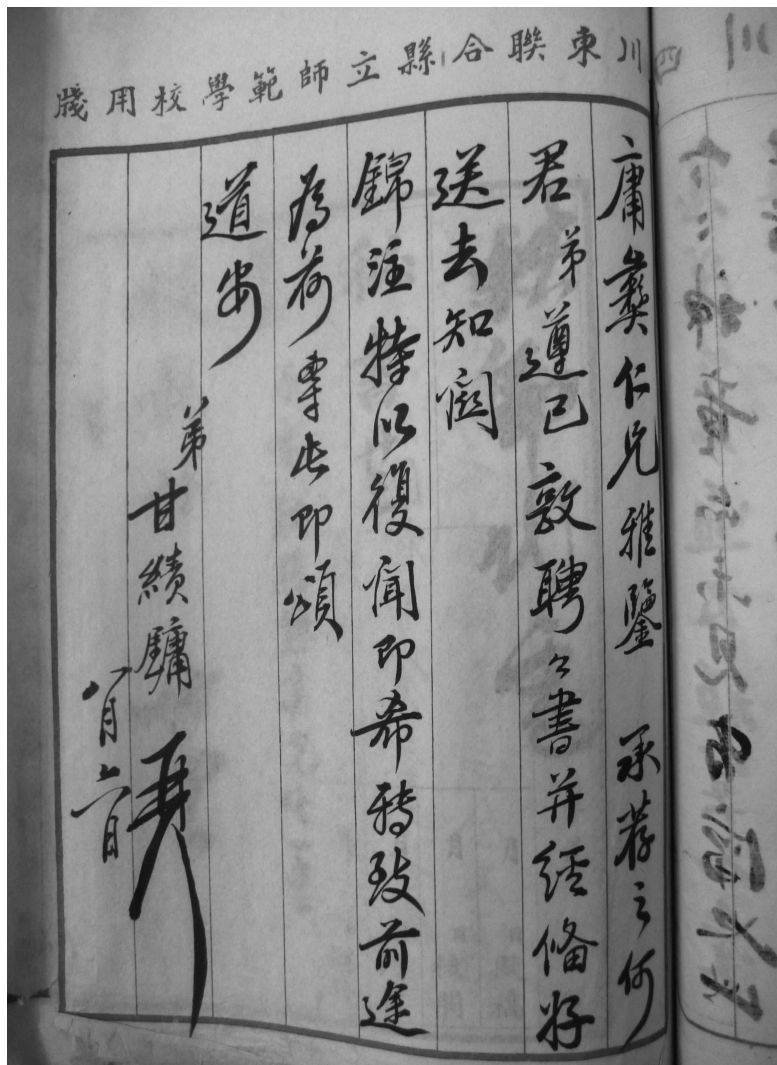
此外,甘绩镛还不辞辛劳,他亲自从水路、陆路去勘察地势,选定校址,参与筹建了重庆大学(甘曾担任副校长)。他不仅支持发展公立学校,对私立学校也同样加以扶持和资助,使重庆地区及川东数十个县的教育事业,面貌焕然一新。

(三)支持卢作孚^⑤组建中国西部科学院

当北碚的乡村建设和社会改革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时,1933年,中国科学社第十八届年会在北碚召开,像这样全国性的科学盛会,在当时的四川来说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在这次科学盛会以前,四川重庆等地科学事业发展的另一里程碑是中国西部科学院的成立。

早在1927年,卢作孚出任北碚峡防局局长时,就决心要将科学文化极端贫乏与民众愚昧落后的北碚,建成一个科学文化发达的现代化城市,并以此为中心,辐射牵动整个四川与



甘绩镛书信手迹

^⑤ 卢作孚(1893—1952),男,四川合州(今重庆市合川区)人,中国实业家。早年加入同盟会,后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积极宣传新文化。1925年创办民生实业公司,经营长江内河航运。抗战胜利后,向远洋航运发展。建国后,任全国政协委员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等职。

西南地区的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这时,北平、南京、天津先后成立了科学研究机构。卢作孚深感四川科学落后,必须要有相应的科研机构 and 大批科学人才。回到四川后,他积极筹备在北碚设立科学研究机构,并定名为中国西部科学院。甘绩镛深知科学对当地教育发展的作用,对中国西部科学院的组建积极支持。在一次中国西部科学院院务会议上,郑东琴^⑥和温少鹤^⑦等被推选为常务董事,甘绩镛被选为董事。

1933年,中国科学社在北碚举行第十八次年会开幕典礼。甘绩镛作为军部代表在这次年会讲话中发表对中国科学社寄予的希望:第一,帮助四川调查资源,改良实业;第二,帮助四川发展科学和教育;第三,希望将科学知识灌输给军人的头脑中,使之注重建设事业。

当时的科学界很贫寒,缺乏资金,科研人员希望能在这次会后得到四川各界的支持,集资千把元,解决一些急需困难。超乎他们的意料,各军将领当场捐款,数量都是几千不等,当时作为处长的甘绩镛,私人就捐了2000元。

甘绩镛热心发展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无所企求。他的一个朋友曾说,他在公立学校建办好后就功成身退,帮助私立学校却不为己谋,真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这样做不值得。甘绩镛一笑置之。事后告诉家人:“我之效力教育事业,旨在培养人才,获得机令即当奋力而为,或奠基,或扶助,自尽其心,但能具有成效,于愿已足,功成岂必在我!”^⑧由此,可见先生之风范矣!

参考文献:

- [1]许增絃,潘洵.川东师范学堂与西南师范学院的组建[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5月,第31卷,第3期.
- [2]甘新春.甘典夔振兴川东师范和为重庆地区教育事业作出的贡献.川东师范,2001年.
- [3]张守广.卢作孚年谱[M].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
- [4]卢国纪.我的父亲——“航运大王”卢作孚.光明网人物版商界精英专栏.

(责任编辑 李亚勃)



^⑥ 郑东琴(1882—1965),男,曾参加同盟会,帮助卢作孚发展民生公司,曾任重庆工商联常委和四川省重庆政协委员等职。

^⑦ 温少鹤(1888—1968),男,重庆巴县人。著名实业家。1928年发起创办重庆第一个自来水公司,后又参与筹建重庆大学。解放后曾任重庆市政协副主席、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和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⑧ 来自余时伟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647f29060100gp15.html。

编者按:苏葆桢(1916.5—1990.6),江苏宿迁人,自幼受其父熏陶,以善画闻名于乡里。1939年考入中央大学艺术系,获得艺术大师徐悲鸿、张书旗、傅抱石、陈之佛和吴作人等的教诲。学生时代即举办个人画展,作品曾荣获1941年全国美术作品展览青年画家一等奖。1956年起在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任教授,硕士生导师,曾任重庆国画院副院长。苏葆桢擅中国画,尤长画葡萄,人称“苏葡萄”,代表作有《川西三月》、《硕果丰收》和《樱花孔雀》等,作品流传遍及亚洲、非洲以及欧美许多国家。



1916年5月的一天,江苏省北部距历史名城徐州百余里远的宿迁县,村塾先生的房子里传来了婴儿落地的啼哭声,他就是后来以“苏葡萄”而称誉中国画坛的花鸟画家苏葆桢。

苏葆桢先生之父苏老泉公是前清秀才,喜好书画,家中收藏有一些碑帖字画,闲时拿来欣赏。苏先生六岁时经父亲启蒙,初试画笔,在绘画方面就表现出很高的天赋。看到儿子潜在的天赋,老泉公就节衣缩食,寄点钱到上海的书店邮购画贴给儿子临摹。

上初中后,美术老师余定栋先生特别喜欢他的聪明颖悟。余先生是上海老画家张律光先



苏葆桢教授庭园写生(高石汉摄)

① 陶昌馨,女,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各体文学研究。

生的弟子,对萧谦中^②、胡佩衡^③的山水和张书旗^④的花鸟画都颇为熟悉,在余先生的指教下,苏先生画技大长,学期结束时,全校举行绘画课外小组的画展,他得了头奖,奖品是一本《书旗画集》。从那时起,张书旗先生的画风就影响着他。初中毕业,家中无法负担他投考美术专科学校的费用,苏先生只好就读本校的职业高中部,学习玻璃制造业。职高部不但教绘画技艺,而且让学生给校办工厂设计制作花瓶、笔筒、帽筒等,对学生锻炼很大。后来,学校改名叫江苏省立窑业学校。转眼高中毕业了,因为成绩优秀,学校将苏先生留下,一边担任刻印钢板印刷材料之类的杂务工作,一边也为学校的窑品设计画画。1936年,窑业学校得到几名公派留日的名额,到日本学习玻璃器皿的制作,苏先生也在入选者之列。大家欢天喜地整装出发,等到了上海,准备乘海船东渡时,忽然传来消息:不走了!因中日关系突然紧张,留学之事取消了。大家很扫兴地回到窑业学校。

风声越来越紧,常听到飞机低沉的轰鸣声呼啸而过。宿迁城里风声鹤唳。1937年7月,抗战终于爆发,学校的几位青年教师相约去参加青年军抗日,苏先生也去了。其实青年军只是东躲西藏,并未与日本人交手。青年军常常没有吃的,往往走到半道上挖点地里的山芋充饥。苏先生心想:这如何是好呢?于是,向指导员告了假,就又回到窑业学校。此时,日军已占领华北大部分地区,正向南推进。学校也准备内

迁,校长章纪南先生见回来了几个青壮年,非常高兴,拉着他们说:“我正愁得没办法,你们来了就好了。我们赶快打点学校的有用之物,迁向内地。”江苏省立窑业学校就这样开始了迁徙之途,苏先生也加入了逃难队伍,离开了生养他的家乡江苏。

学校一行到了武汉,才知道湖北根本不能停留,日本军队已经向武汉逼近,只得继续向西进入四川。校长章纪南先生有一个同乡在江津县教育局任官职,他力荐江津作为校址,一是这里物产丰富,有鱼米之乡的美称,二是;年个濒临长江水道,往来也方便,三是离都市中心区有一段距离,生活相对便宜。1938年,校址就定在江津的中渡街,与江津县城隔江相望。

新安顿的学校改名叫江津窑业学校。苏先生也随学校安定了下来。

二

1937年10月,美术界巨擘徐悲鸿先生及当时国立中央大学(下文简称“中大”)也相继辗转到了重庆,中大的校址就设在重庆大学旁边的松林坡。校舍自然十分简陋,是用竹木编搭的几十座房舍,但教授阵容却十分强大。徐悲鸿先生、陈之佛^⑤先生、傅抱石^⑥先生、张书旗先生、黄君璧^⑦先生、吕斯百^⑧先生、吴作人^⑨先生、谢稚柳^⑩先生、李瑞年^⑪先生、秦

^② 萧谦中(1883—1944),安徽怀宁人。曾任北京艺专教授、中国画学研究会评议等。与萧俊贤并称“二萧”,在北方卓有影响。

^③ 胡佩衡(1892—1965),中国现代中国画家。曾任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画院画师兼院务委员等。其代表作有《西山丽景》、《野溪朝阳》、《丰沙线写生》等。

^④ 张书旗(1900—1957),浙江浦江人。曾任南京中央大学教授。因喜用白粉调和色墨,素有“白粉画家”之称,其作品曾被美国总统收藏。

^⑤ 陈之佛(1896—1962),浙江余姚人,中国现代工艺美术教育的先驱者、杰出的工笔花鸟画家。历任上海东方艺专、上海艺术大学、广州美术学院图案科主任、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等。

^⑥ 傅抱石(1904—1965),江西南昌人,我国现代著名的国画家、美术史研究和绘画理论家。

^⑦ 黄君璧(1889—1991),广东南海人,国画大师。历任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及国画组主任,并被教育部聘为美术教育委员会委员等。

^⑧ 吕斯百(1905—1973),江苏江阴人,中国油画家。历任兰州西北师范学院艺术系、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教授兼系主任等。

^⑨ 吴作人(1908—1997),男,师从徐悲鸿先生。早年攻素描、油画,功力深厚;间作国画富于生活情趣,不落传统窠臼。晚年后专攻国画,境界开阔,寓意深远,以凝练而准确的形象融汇着中西艺术的深厚造诣。在素描、油画、艺术教育方面都造诣甚深,他在中国画创造方面更是别创一格,自成一家。

^⑩ 谢稚柳(1910—1997),江苏常州人,中国画家,书画鉴定家。历任上海市文物保护委员会编纂、副主任,国家文物局全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组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等。著有《敦煌石室记》、《敦煌艺术叙录》、《水墨画》等。

^⑪ 李瑞年(1910—1985),天津人,油画家。先后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北京分会副主席等职。代表作有《挣扎》(原名《暴风雨》)、《沙坪新村》、《向日葵》、《古柏》等。

宣夫^⑫先生、黄显之^⑬先生等,都在此任教。蒋介石曾亲任中央大学校长。一时间,西南重庆的文化气氛掀起高潮。

很快,中央大学艺术系开科延考。从四面八方逃难到大后方的青年学子一下找到了求学的地方,高兴地奔走相告。招生的消息传到了江津,苏先生十分高兴,他积极备考,1939年9月,苏先生考取了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国画专业。

在中大学习的五年中,苏先生得以系统学习绘画技艺和绘画理论,是他画技突飞猛进的时期。中大艺术系十分注重对学生的基本技法的训练,第一、二年级学习素描,进行石膏写生和人体写生,训练学生有扎实牢固的绘画基础。在此基础上,又以速写和默写的方式训练学生的造型能力。速写要求在极短的时间里抓住物象的特征并以笔墨传神。默写则是根据生活中观察到的瞬间生动物象,凭着敏感的记忆力和印象默写描绘出物象的原貌。到三年级,才开始分科学习油画和国画。

在中大的教授们中,尤以徐悲鸿先生对这些从四面八方来的青年影响最大。他衣着朴素整洁,态度和蔼可亲,不仅不抽烟喝酒,连品茶的习惯都没有,渴极时找杯开水一饮而尽,经常和大家一起在集体食堂吃

饭。有时为了节约时间,叫同学顺路代买点白薯或烧饼充饥。对学生的绘画,他总是因材施教,根据学生的才能,发挥学生自己的特长。他对学生说:“无论有多大的困难,多画画是最重要的。”他经常把他珍藏的画册和图片带给同学们看,并做详细的讲解。徐先生教导学生,看画要看“天下第一”,画画要“一千张”。实际是说,要有量变,才能产生质变,要画得多,才能画得好。每次给大家作完示范之后,徐悲鸿先生都要把画桌收拾得干干净净,他说,举凡纸、笔、墨、颜色,无一不是许多人辛勤劳动的结果,绝不容许浪费。这些教导,成为了中大艺术系学生受用终身的宝贵精神财富。

事有凑巧,苏葆桢先生进入中央大学艺术系所听的第一堂国画课竟然是张书旗先生所授,从此以后,张书旗先生和苏葆桢先生的师生之谊保持多年。张书旗先生为浙江浦江人氏,青年时废寝忘食地习画,是吕凤子^⑭先生所办上海美术学校的得意门生,徐悲鸿评他:“刻意写生,自得家法,其气雄健,其笔超脱,欲与古人争一席之地。”吕凤子先生评他:“画花似闻香,画鸟若欲语,对形神兼备

表现手法,可谓尽画家之能事。”他的书画不仅师承“黄筌富贵,徐熙野逸”,更对近代名家任伯年^⑮、潘椒石两人的绘画技法颇有把握。张书旗先生花鸟画博



苏葆桢 1960年作《紫藤八哥》^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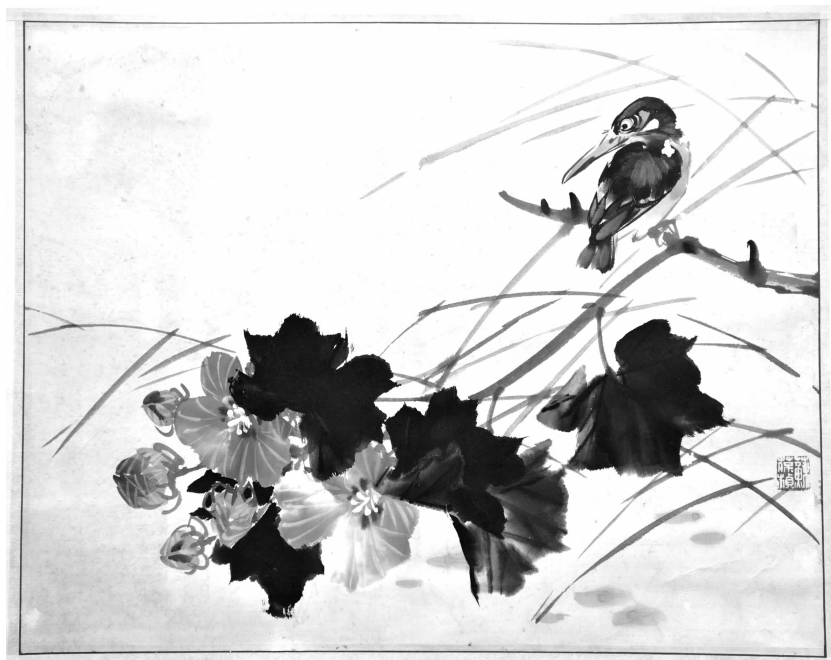
^⑫ 秦宣夫(1906—1998)。广西桂林人,我国著名画家、美术史论家、美术教育家。

^⑬ 黄显之(1907—1991),湖南湘潭人,著名油画家、美术教育家。历任中央大学艺术系副教授、教授,南京大学艺术系主任,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教授。

^⑭ 吕凤子(1886—1959),江苏丹阳人,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历任苏南文化教育学院、江苏师范学院教授、江苏省国画院筹委会主任委员,省美协副主席等。

^⑮ 任伯年(1840—1895),浙江山阴人,是我国近代杰出画家,海上画派中的佼佼者,有《苏武牧羊》、《女娲炼石》等作品传世。

^⑯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1-1960-SW-76。

苏葆桢课堂教学作品^①

采众家之长但又不亦步亦趋，特别是他的彩画独树一帜，在近现代花鸟画坛具有重要地位。苏葆桢先生在中大艺术系学习时颇得张先生教益与嘉许，对张先生的作品心摹手追，努力学习张先生花鸟画技法。当时，中国画教室是艺术系条件最好的了，三十平方米的一间大屋子，每个同学都有一张较大的画桌，画桌下是几个盛画具的抽屉。最前面一张，专门留给老师上课时作示范用的。那种良好的教学氛围不但是在战火连天的艰难岁月难以寻觅，就是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也是弥足珍贵的。名师出高徒，在那样动荡不稳的年月，重庆时有敌机轰炸，物质匮乏，加之许多学生都是逃难出来，连生活费用都成问题，而他们中许多人都刻苦学习，多年后成为了当代美术界的栋梁之材。

苏先生离开了江津窑业学校，经济十分困难，好在中央大学管饭，肚子可以吃饱，但买纸、买笔墨颜料总需要钱的。第一年的时候，靠着老乡的关系东挪西借总算过来了。但同学也很困难，有的同学甚至做点熬锅肉，吃饭的时候端到饭堂卖，以一片肉多少钱论价，这样凑点钱买纸笔颜料。苏先生则画了许多花鸟小品，拿到沙坪坝和市中区的裱画店去寄卖，由此

结识了几位裱画店的老板，其中，赖廷增先生是一个。赖先生在市中区新华路一带开了一个裱画店，他常帮苏先生卖画，抽成后将画款交给苏先生。卖了画，苏先生总是十分愉快的，因为那意味着他可以添置点必需用品了。苏先生的画颇受张书旗先生影响，画面清新美丽，喜用粉彩，造型生动，瓜棚豆荚、芙蓉鸳鸯、墨竹促织、菊花茸鸡、芦苇群鸭、红梅黄雀，莫不入画。有一次，苏先生画了一张翠绿色的芭蕉下卧游几只毛茸茸小鸡的画，颇有四川农家风味。画好后就放在画桌上了，正遇上画店老板到学校来找人，马上就看中了这张画，立刻出钱买下了。

国画系的同学在教室旁边养了锦鸡、鸭子，甚至还养上了兔子，这些东西常常可以作为写生的对象。苏先生从小就爱小动物，所以照料这些东西的经常是他。鸡鸭就在他们的画室外游走，其神态与形态都成为绘画的资料。有一次，苏先生发现养的兔子不在了，接连好多天不见踪影，他想恐怕是弄丢了，哪知过了一阵子，教室里突然出现一群小兔，带队的自然是那只老兔子。这才知道，这只老兔子下崽子去了！

过年了，有家难回，大家心中充满难言的苦痛。家在重庆的同学刘泽提来了腊肉，大家合计，宰只鸭子炖腊肉吧。同学们都知道，平日里都是老苏在照顾它们，所以眼睛都望着苏先生。苏先生叹口气道：“鸭子呀可怜的鸭子！我本不忍心杀你，无奈过年了，大家没有吃的，只好对不起你了！”鸭子杀后和着腊肉一起炖，鸭子都炖烂了，腊肉还未耙未熟，大家还是把这一大锅怪香怪香的东西吃了下去。

三

1944年苏先生毕业后，吕凤子先生竭力延揽，推荐他进入璧山正则艺术专科学校担任教职，他此

①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1-SW-74(年代不详)。

间辗转于重庆、成都、泸州、江津等地举办个人画展，画名鹊起。1947年，因与重庆璧山士绅杨家女儿鸿瑚女士结亲，故抗战胜利后苏先生留在重庆。

1956年，周恩来总理指示教育部在全国招聘人才，苏先生进入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美术系任教。1956年到1965年这段时间，生活安定，是苏先生艺术生涯中的第一个黄金时期。他一遍教学一边

画画。苏先生写生十分勤奋：一年四季的各色蔬果、花卉，足迹所到之处的罕见花草，无不进入他的笔下：胡豆花、凌霄花、绣球花、海棠花、秋葵花、石斛花、菖兰花、厚朴花、蔷薇花、紫藤花，无花不画；蚕豆、茄子、萝卜、白菜、南瓜、丝瓜、玉米、葡萄、广柑、冬瓜、豇豆，无果不

写。不同的品种，不同的组合，线条流畅简练，笔锋饱满圆润，晕染浓淡适中，形象准确，布局巧妙，令人感叹其观物工夫的精到。他还用画笔记下了人民公社喜庆丰收的场景；黄南瓜、绿丝瓜、白菜萝卜满篮筐，鲜活的蔬果中融进他对生活的美好祝愿；既有娄山关雄关道上的殷红山丹，也有金橘装满筐葵花向太阳，还有双蝶戏芙蓉群鸭卧莲塘，鸽子展翅

飞葡萄挂枝头……这些作品都体现了他善良的人生愿望。

1968年，苏先生因所谓“历史遗留问题”被关入西山坪劳改农场，经历一年零四个月才放出来。苏先生把这种磨难和屈辱当成了生活对他的挑战，他那苏北汉子不向厄运屈服的阳刚之气，顽强地击退了一次又一次几近灭顶的灾难。1972年以后，文革因

林彪的毁灭而过了疯狂的高潮期。苏先生又一次回归绘画阵地。从1974年到1990年，是苏先生的艺术生涯的第二个黄金时期，尤为不易的是苏先生的作品始终以“真、善、美”示人，正如徐无闻[®]先生所言：“他（苏先生）对生活始终抱乐观态度，即使经历坎坷，仍然紧握画笔，执着于艺术的追求。画如其人，



70年代苏葆桢教授在北泉公园指导学生写生（高石汉摄）

在他的作品里，没有怪僻荒诞，没有灰暗阴冷，他笔下的一切花鸟，组成一个爽朗清新、富丽和谐的世界，给人们以甜美的慰藉。”这时期苏先生的画品已走向成熟而独具风格：馨绿的百合花，浅绿的腊梅花，粉红的菖兰花，风声萧萧的墨竹，珠圆玉润的葡萄，柳丝轻拂紫燕纷飞，珠藤垂吊白头相依，雏菊横斜茸鸡觅食，卷丹吐蕊雄鸡高吭。这些画笔法圆熟，

[®] 徐无闻(1931—1993)，四川成都人。生前为西南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前身之一)中文系教授，硕士生导师。历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篆刻评审委员等。

设色清秀,情调明快,构图精致,令人忘忧,催人向上。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精神产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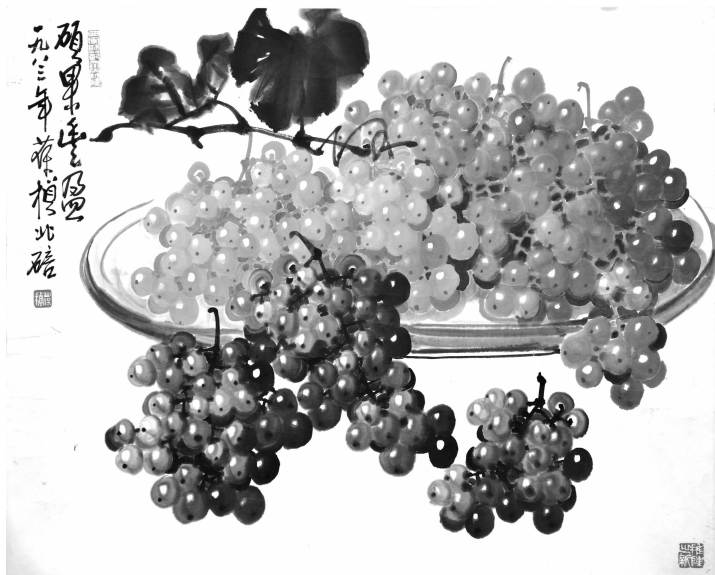
苏先生深深懂得艺术长存的生命在于创新。他选择了幼年时期就十分熟悉的葡萄作为突破口。葡萄因其甘甜唯美之实受人喜欢,而在苏北乡间,还寓有多子多福之意,所以苏先生对这种水果珍爱有加。苏先生认真研习徐渭^①、吴昌硕^②、齐白石、汪亚尘^③及张书旗先生所作葡萄图。传统画葡萄之法,重在写藤叶之粗放有力而疏于绘果实,绘果实皆采用工笔勾勒添色或没骨晕染,因而葡萄缺乏透明的质感,以徐渭作葡萄画题诗为例,“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置野藤中。”多感叹人生命运坎坷、怀才不遇、投路无门之苦。苏先生反其意而用之,他认为应该表现那粒粒饱满晶莹的浅紫色或深墨色的葡萄串,展示其充盈充实之美。苏先生以“师造化”为起点,多年以来,无论走到哪里,都想对葡萄进行仔细观察。从他存留的白描画稿看到,1963年和1965年夏天,苏先生就绘有多幅藤子和盘子葡萄写生图,他几乎走遍了重庆近郊的果

园,西师园里的葡萄不知多少在他笔下留过形象,他借出差北京之机,数度到京郊葡萄园写生。苏先生对传统画葡萄的“填写法”进行改造,利用水墨和生宣中棉料净皮宣纸的性能,采用“圈写法”,用精简的两笔完成葡萄的形状,利用墨色的淡浓和中间留出的高光,画出带光感和水分饱满的葡萄,并将葡萄组成一球球富有立体感的葡萄串,表现枝头葡萄的空间感。苏先生不拘限使用水墨画葡萄,还运用花青、曙红、胭脂、藤黄相调配,画出紫色葡萄和绿色葡萄,并将紫、墨、绿三色画出不同颜色的葡萄串,配以篮子、盘子或各色花卉,表现不同颜色下的葡萄。70年代末以来,一幅幅构图精巧、设色秀丽、珠圆玉润、典雅端庄的作品相继问世,这些画富有昂扬的时代感,体现了焕然的生命活力,充满绵韧不屈的生机。人们为表示对他所创造的葡萄画品的极大认同,给予苏先生以“苏葡萄”的美誉。

苏先生80年代喜用几方印章:“百花齐放”、“鸟语花香”、“推陈出新”、“80年代”,这是苏先生现实主义艺术主张的写照,也是一个老画家经历了大波大澜之后归于淡泊宁静人生的结果。他以生命之沉重赋予作品厚实的内涵,以自我牺牲之精神奉献出朗朗无优的画境。我们不但要看到苏先生作品笔墨所具有的价值,还要读懂其历练人生赋予画的价值。走过了数十载的风风雨雨,描绘了大半生的花卉禽鸟蔬果,苏先生可谓恪尽画家之职守。他高尚的人品和画品,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本文选自《缙云山下一支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文章略有删改)

(责任编辑 姚恒)



苏葆桢 1983年于重庆北碚作《硕果丰硕》^④

^① 徐渭(1521—1593),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中国明代文学家,戏曲家,画家,书法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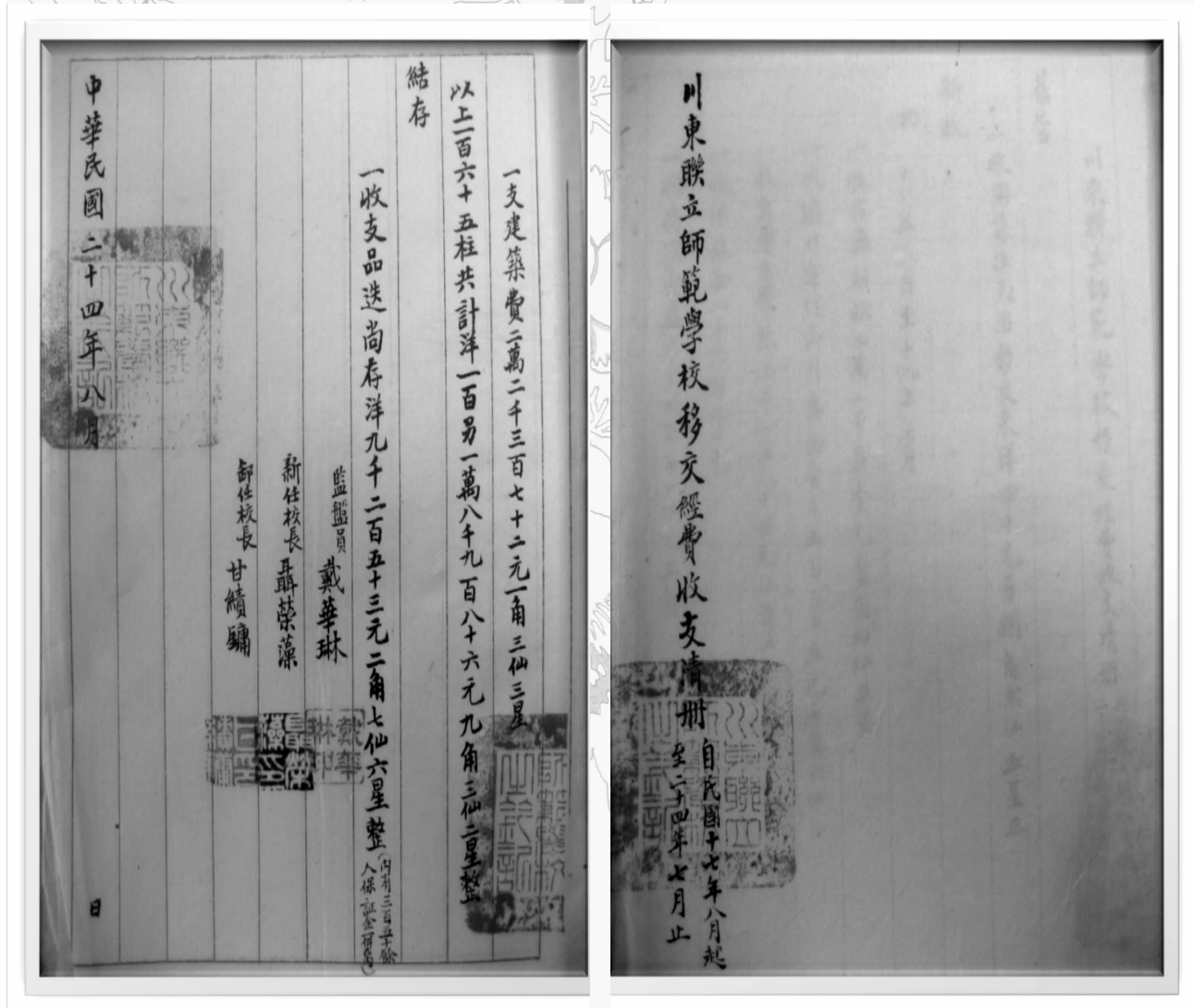
^② 吴昌硕(1844—1927),浙江人,是晚清著名画家、书法家、篆刻家,为“后海派”中的代表,与虚谷、蒲华、任伯年并称“清末海派四杰”。代表作有《瓜果》、《灯下观书》等。

^③ 汪亚尘(1894—1983),浙江杭州人,中国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擅长西画及国画,尤以画金鱼著称。

^④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1-1983-SW-77。



编者按：今夕拾忆，一位源头之上的教育家——甘绩镛，谨以档案史料再现他对川东师范学堂教育事业的灼灼贡献与抗战爱国的厚重深情。



川东联立师范学校移交经费收支清册首页和末页(自民国^①十七年八月起至二十四年七月止)^②

① 民国纪年方式以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为元年。民国十七年即公元1928年。

② 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0129-02-213。

川東聯合縣立師範學校校長甘績鏞報告本校十七年度經過大概情形

川師有正式校董會議自今日始諸公肯惠臨熱心維護前途成績可為預期學校全體感甚謝甚績鏞監學校長將及一年其中緣由經過諸公或未盡知茲逢會始擇要報告幸垂察焉績鏞自民元畢業四川工校後廁身軍民財政司法各界固已學非所用至於辦學尤非所長去歲忝尹東道因川師聯工向隸通署由職務上之考察始知辦學之不易感學校今昔之相殊更念學務改進之宜汲汲也暑期中周前校長天治既辭徐新校長天權又復不就軍部鑒於經費乏繼主持無人令其續鏞兼代校長從事結束在附學轉學限期畢業等事遵令辦理本極容易第念本校已往之成績現在之需要今後道屬寒苦學生之向學種種關係踴躍不安於其道者有臨時校董會之召集同時留堂學生代表校外同學各界人士函電紛馳共為援助赴會人員聯翻蒞止人數加增昔未曾有八月廿日大會後一致否認結束表決

川東聯合縣立師範學校校長甘績鏞工作報告^③

^③ 重慶市檔案館館藏檔案,0129-01-37。

民國十七年八月至二十四年六月捐款人姓名金額一覽表

姓名	捐助金額	備
劉主席市澄	七〇・九〇一	六四三
劉主席白乾	一〇・〇〇〇	〇〇〇
甘校長典燮	七・七五六	五〇〇
美豐銀行	三〇〇	〇〇〇
天錫生	三〇〇	〇〇〇
大呂祥	三〇〇	〇〇〇
同裕義	三〇〇	〇〇〇
和川公	三〇〇	〇〇〇
復興玉	三〇〇	〇〇〇
鹽幫公所	一・七〇〇	〇〇〇
錢業公會	一・〇〇〇	〇〇〇
航業公會	六〇〇	〇〇〇
正鈔公會	六〇〇	〇〇〇

十七年度捐來儲蓄子金七千二百九十七元十八年度捐來儲蓄子金五千九百九十九元十九年度捐來獎券等一萬〇四元六角四角三分共計一萬三千九百九十九元六角四分

甘校長除商歷年薪金全數捐助學校外又捐款購置圖書儀器其計如上數其津貼及獎勵家境貧苦與品學優良學生之款并未計入合併聲明

報告書

三

川东公立师范学校造民国十七年八月至二十四年六月捐款人姓名金額一覽表

④ 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0129-01-37。

中國抗日軍四川後援會學界募捐運動週三月二十七日會議

出席八

曾吉芝

伍所南

殷世澤

林東南

甘績鏞

張德欵

甘明蜀

議決案

1. 省公立各校自本星期起舉辦募捐事宜儘四週內完結
2. 募捐範圍限於教職員學生及二役等
 - (甲) 教職員捐款除自由捐助外照所得薪水百分之五分攤
暫以一次為限
 - (乙) 學生捐款分左列兩種辦法
 - (1) 固定捐款由各校在本期學生伙食項下每人抽五角
 - (2) 自由捐款由各級學生各班推舉代表負責進行每
週本校內將募得之數公布週知以便比較
 - (丙) 二役捐款每人最少以一角為限願多捐者聽之
3. 學工自由捐款每週交存各該校事務處其餘規定
一切捐款由事務處照扣一律送交委員會指定之
中國銀行取據備查
4. 第二項所列各件由各該校置捐款簿及收據備用
5. 各校捐款除第二項辦法外如有其辦法者得由各該
校酌量進行

甘績鏞出席中國抗日軍四川後援會學界募捐運動週三月二十七日會議記錄^⑤

^⑤ 重慶市檔案館館藏檔案, 0129-01-107。



展了反右斗争。由于受“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混淆了敌我界线,使反右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把一批教职工和学生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据统计,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全院5855名教职工和学生中先后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就有612人,占全院总人数的10%以上。^②

1958年全院掀起了下放劳动和勤工俭学的热潮。先后有两批共179名教职工下放到重庆北碚金刚乡农业生产合作社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另有1000多名师生奔赴北碚区转龙乡修筑水库。同时留在校内的学生也成立了“缝纫组”等劳动组织,广泛开展勤工俭学活动。这些生产劳动虽然对培养教职工和学生的劳动观念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占用的时间过多,影响了正常的教学工作。

1958年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学院开展了以“双反”(反浪费、反保守)、“交心”、“拔白旗”等为主要内容的“大跃进”运动。1958年3月学院开展了“双反”运动,揭发了基本建设、人浮于事等问题。在“双反”运动中又开展了自觉革命,向党“交心”的“交心”运动,在“交心”运动的基础上在师生中开展了“红专大辩论”,在辩论中对认真刻苦钻研也进行了批判,挫伤了师生在教和学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在“红专”大辩论中,学院进行了拔“白旗”、插“红旗”的运动。经过揭发批判,全院共拔“白旗”16面,有的教师还被从讲台上拉下来。1958年8月在“大战一个月,向党献大礼”的口号下,学院形成了大办工厂、大办农场、大办学校和大搞科研的“全面大跃进”高潮。学校几乎用了全部教学时间大搞形式主义,办起了44个工厂,试制出334类产品,改良58件农具,兴办各类学校418所,完成100多个科研项目,这些成果质量不高,数量上也存在浮夸现象。10月,学院又开展了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全院师生日夜不停地奋战。11月,学院还抽调3000多名师生开赴綦江铁矿大炼钢铁。这些运动严重违反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客观规律,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背道而驰,在运动中有一些努力钻研业务、在学术上造诣较深的

教师受到重点批判,一批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受到了伤害,同时运动的开展使教学时间得不到保证,严重影响了学院的正常工作。

1959年10月,根据中央关于反右倾的指示,学院在党内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反右倾”斗争错误地批判了一些敢于反映实际情况、提出批评意见的党员,挫伤了一些党员的积极性,使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严重破坏,团结受到影响,同时也使学院中断对过去一些“左”的错误的纠正,反而继续推行“左”的错误,给学院的事业和各项工作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1965年开始,学院先后抽调2000多名师生到重庆巴县、綦江县等地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或“四清”运动)。绝大部分师生被分配到生产队去工作,每期运动的时间都在六个月以上,打乱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严重影响了教学计划的全面完成。从1964年开始,作为四川省高校“社教”运动的试点单位,学院在教职员工中开展了为期八个月的由学生参加学习和讨论的校内“社教”运动。由于这次运动是在错误估计党员和干部中存在问题的情况下进行的,运动中有的干部受到了重点批判,有的干部受到了组织处理,运动伤害了不少人。到后来在运动压倒一切的情况下,教学科研都为运动让路,严重干扰了学校正常工作的进行。

二、排除干扰,在曲折中前进

虽然频繁的政治运动严重干扰了学院的正常工作,虽然学院也曾犯过一些“左”的错误,但学院对某些“左”的错误进行了一些纠正,加强了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建立了专职政工干部队伍,转变了工作作风,为建立正常教学秩序作了许多努力,在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推进教学改革,积极执行“高教六十条”^③等方面,取得了较大成绩。

(一)积极推进教学改革,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1.系科设置和专业调整

^② 报送落实政策的有关统计。见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1-1979-XZ11-49.0021。

^③ 高教六十条是1961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颁布的《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的简称,其主要要求有修改教学计划,调整课堂讲授时间,发挥老师的作用,加强教学经验交流,制订教学规划等。

1957年,全院设有教育(学校教育、学前教育专业)、中文、外语(英语、俄语专业)、历史、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音乐、图画等11个系和体育、图画、音乐三个专科及马列主义教研室。^④1959年,建立政治教育系,体育科与重庆体训班合并成立重庆体育学院。图画科和音乐科于1965年停办。1965年,图画系、音乐系分别

改为美术与汉语言文学系、音乐与汉语言文学系。另外,图画系、音乐系曾在1958年到1963年暂停招生;数学、生物、地理三个系曾在1959年到1960年举办工农预科班;1960年学院曾开办过8

个新专业,这8个新专业是政教系哲学专业,数学系计算数学专业,物理系核物理专业、无线电物理专业,化学系无机化学、核化学、物理化学专业,生物系机密专业,这些新专业除机密专业是在1963年停办的以外,其余7个新专业全部于1961年停办。经过不断调整,到1965年,全院设有政治教育、教育(学校教育、学前教育专业)、汉语言文学系、外国语言文学系(英语、俄语专业)、历史、数学、物理学(附设机械厂)、化学、生物学、地理学、音乐与汉语言文学、美术与汉语言文学等12个系、14个专业^⑤

2. 采取措施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1956年~1957年学院贯彻“全面发展”的方针,在教学中进一步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注意培

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能力,修订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调整课程设置,减少课程的总学时和公共课的授课学时,同时建立各专业的实验场所,加强对实习的指导。

1958年学院开展了以勤工俭学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大革命运动,进行了教育与生产

劳动相结合的探索。虽然由于以生产为中心进行教学,课堂理论教学时间大大缩减,削弱了基础理论课和基本实验技能的训练,影响了课堂系统知识的学习,教学质量有所下降,但学院采取因地制宜的方式,以现场



学院教师为蔡家乡培训农业中学师资^⑥

教学为主,在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作了有益探索。

1959年初,学院在中央的指示下开始总结教改经验,贯彻以教学为主的原则,建立和健全教学秩序,修订教学计划,整顿教学秩序。教师也认真备课,深入钻研教材,并采取各种方式加强对学生的课外辅导来巩固和加深课堂所学知识。

1960年,学院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学院以教学为主,科研和生产劳动为辅,将教学、科研、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定任务、定编制、定规模、定专业,建立良好的教学秩序,保证教师六分之五的业务工作时间,并注意劳逸结合,同时在学术研究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发

^④ 《西南师范学院情况介绍》。见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1-1979-XZ11-37.0028。

^⑤ 《报送1965-1966学年初报表》。见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1-1965-XZ11-1.0004。

^⑥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1-1960-SX122-1.0055。

表不同意见和进行学术讨论。这些措施极大地提高了教学质量。

1961年,学院开始进行以狠抓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简称“三基”)为重点的教学改革。固定教学计划、教材、教师、课表;提高基础课比重,加强基础课教学,安排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主讲;重视教材建设,精选教学内容;加强实验室和资料室的工作,加强学生的实验、绘图、阅读、写作、调查研究等基本技能的训练;坚持“少而精”的原则,减轻学生负担。这些措施加强了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的教学和基本技能的训练,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成绩。

1958年,刘少奇提出“学校分两种,一种是文化质量高全日制学校,另一种是半工半读有经济目的的学校”的主张。中共四川省委和重庆市委将学院确定为半工半农、半农半读的试点单位,于是学院又开始了半农半读的探索。

1965年10月,550名政教、中文、历史、生物四个系的新生和25名教职员在井口农场、北碚夏坝农场、梁平县屏锦农场开始了半农半读的试点。试点工作分两种方式进行,一种是生产劳动和教学都在农

场;另一种是生产劳动在农场,教学在学校。后来半农半读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了。

在提高教学质量的同时,学院还进行多层次办学的探索。1957年,学院在中文系开办函授教育,招生470人。从1958年起函授教育扩大到6个专业,并逐步完善教育管理,提高函授教育质量。1964年春季,除已毕业的学生外,共有函授学生2270人(包括进修生)。从1957年到1965年,全院在籍函授学

生累计有22563人。学院的函授教育为提高中等学校师资的素质和促进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

(二)努力改善科研条件,积极开展科研工作

1.改善科研条件,调动师生科研积极性

1956年在党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学院的科学研究蓬勃地开展起来了。学院先后制定出《西南师范学院1957年科学研究计划》、《西南师范学院第二个五年科学研究规划初稿》、《西南师范学院理科1963年~1972年基础科学、技术科学研究发展规划》等科研规划。同时还采取创办刊物等措施改善科研条件,调动师生的科研积极性。1957年5月,学院创办了《西南师范学院学报》,此外中文系还创办了文学刊物《桃园》、《语文》,刊载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和学术文章。这些刊物的创办调动了师生的科研积极

性,活跃了学术气氛,提高了学术水平。1960年3月,学院成立了科学技术情报组专门搜集教学、科研所需的资料,搜集并保存校内自然科学方面的论文,并且与校外各单位开展科技情报资料交流活动,扩大影响。科学技术情

报组的成立为学院的科研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促进了科研工作的开展。

2.开展学术讲座,推动科研工作的发展

1957~1958年学院举办了几十次各种类型的讨论会或报告会,学院的学术空气日益活跃,自由争论的风气逐渐形成。1959年,根据中央“关于继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开展学术讨论”的精



师生开展学术讨论活动^①

^①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1-1960-SX122-2.00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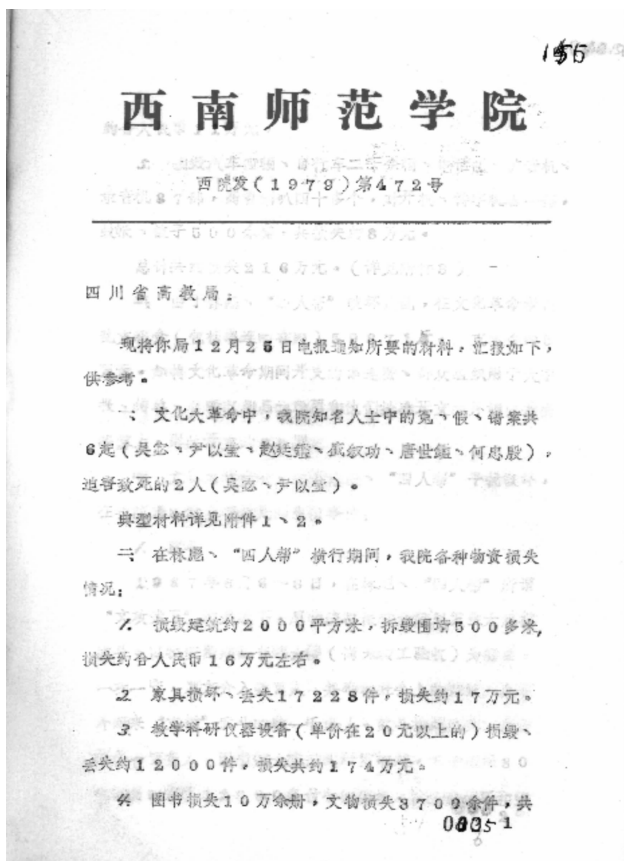
神,学院专门制定了《坚决贯彻“双百”方针,继续开展学术讨论的决定》,提倡大力开展各种学术讨论。各系科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结合教学任务和专业特点,采取校内外结合、重点与一般结合、大会与小会结合的方式,组织师生积极开展学术讨论。据不完全统计,仅1959年一年中,各系科就举办了88次学术报告会或学术讨论会。后来,学院贯彻“以教学为主”的方针,减少了学术会的规模和数量,学术讨论以小型讨论为主,较大的学术报告会很少举行。学术报告会和学术讨论会的举办对提高教师的理论水平和学术水平,加强教学的思想性和科学性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推动了学院科研工作的发展。在这期间,学院教师编写出版了《钓鱼城史实考察》、《心理学教学法》等专著,还有一批学术论文在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

3. 师生结合,促进科研工作

学院把组织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开展科研活动作为学院科研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给予极大的重视,号召学生特别是高年级学生踊跃参加科研活动。在学院的重视下师生的积极性特别高,从1958年8月开始,学生的科研活动广泛开展起来。在短短4个月的时间里,理科取得科研成果174项,文科写出学术论文、报告等5248篇。虽然一些成果质量不高,但其中也有较好的作品,如历史系学生杨丙昆撰写的论文《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海陆丰苏维埃》曾在国家一级刊物《历史研究》上发表。学院各系(科)还根据自己的专业特点,组织师生深入社会广泛开展各种调查研究,在促进科学研究的同时也提高了教学质量。如60年代初,生物系地理系的师生深入川西南等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地方进行野外考察,写出了450篇考察报告、研究文章和资料,绘制了200多幅图片,获得了“揭开大自然秘密,开发边疆,三年任务一年完成”的好评。学生开展科研活动特别是师生走出课堂开展社会调查不仅加深和拓展课堂知识,培养了学生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能力,提高了学生科学研究的兴趣,对促进教学科研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十年动乱,深受其害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是一场由领导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全党、全国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和内乱的运动。和全国其他高校一样,学院也经历了一场浩劫,遭受到建校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在“文革”中,学院经历了文革发动后的大混乱、清理阶级队伍、迁校等一系列风波,党的领导被取消,党的各级组织陷于瘫痪,各级干部遭到批判和斗争,广大教职工受到批判和斗争,甚至遭到毒打,身心上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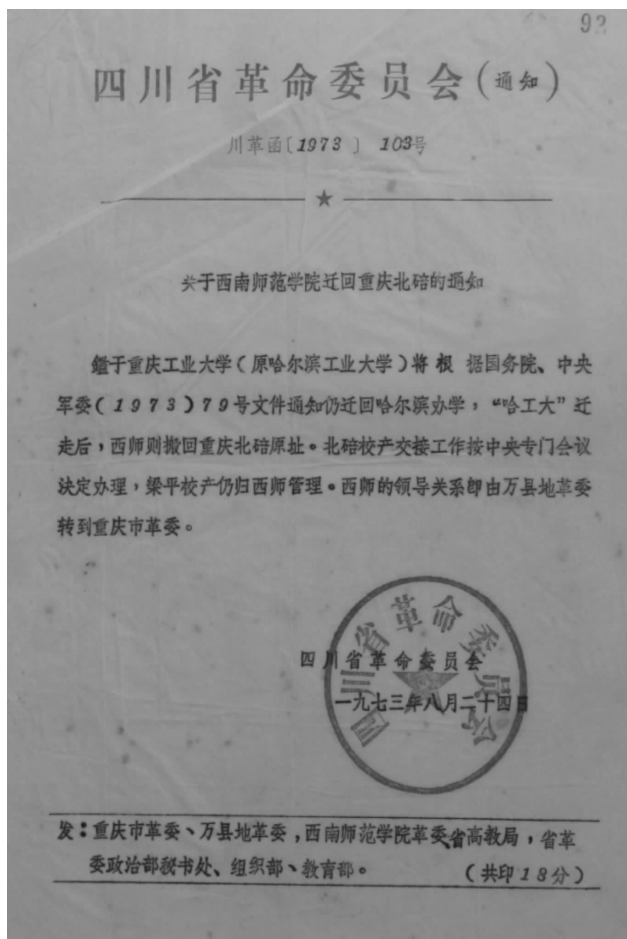


关于文化大革命中知名人事冤假错案 各种损失等的情况汇报^⑧

极大伤害。据统计,在“文革”中,教职工有6人被迫害致死,有302人立专案审查,约占教职工总数的四分之一,其中干部28人,教授、副教授59人,其它教

^⑧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1-1979-XZ11-1.0001。

职工 215 人。^⑨另外,物资设备也遭受巨大的破坏,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据统计,“文革”中毁坏建筑约 2000 平方米,家具损坏、丢失 17228 件,文物损失 3700 件,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损毁丢失约 12000 件,图



1973 年 8 月关于西南师范学院迁回重庆北碚的通知^⑩

书损失 10 万余册。^⑪然而更大的影响在于由于迁校学院被搞得四分五裂,完处于瘫痪状态。1970 年 11 月,学院 600 多名教职工被迫离开北碚搬往万县专区的梁平县和忠县的农村,文科各系迁往忠县师范

学校和忠县中学,理科的数学系、化学系、生物系、地理系和党政机关、后勤部门等,迁往梁平县中学和屏锦中学,而物理系、外语系及工厂等单位 700 多户教职工和学院的食物、设备等仍留在北碚原址。一个完整的学院被一分为五,根本无法进行教学、科研和正常工作。^⑫直到 1973 年 8 月学院由梁平县、忠县迁回北碚原址后才恢复招生。即使在恢复招生后,由于“四人帮”^⑬的干扰破坏,学院仍不得安宁。批林批孔^⑭、研究与宣讲儒法斗争史、学习“四人帮”炮制的“朝阳农学院经验”、评论《水浒》等成为学院的中心任务,干扰了学院的正常工作,直到 1976 年 10 月党中央采取坚决措施打倒了“四人帮”,学院才重新获得生机。

四、忍辱负重,在逆流中重生

十年的“文革”虽给学院带来了严重的创伤,但广大师生员工在极“左”路线的高压下并没有屈服,而是同“左”倾错误和林彪、“四人帮”进行了艰苦曲折的斗争,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使学院的一些日常工作还能运转,减轻了“文革”对学院的破坏程度。1973 年初,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撤离学院,一些学院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重新站出来工作,改组革委会核心小组,恢复各处、科建制和原来各级干部的工作,调整各系党、政组织成员,使学院的正常工作秩序逐步恢复起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虽然困难重重,但在全体教职员工的努力下,教学科研等工作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一)坚持教学工作

1973 年 8 月学院由梁平县、忠县迁回北碚原址,

^⑨ 报送落实政策的有关统计。见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1-1979-XZ11-49.0021。

^⑩ 关于文化大革命中知名人士冤假错案、各种损失等的情况汇报。见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1-1979-XZ11-1.0001。

^⑪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1-1975-XZ11-24。

^⑫ “四人帮”是指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结成的帮派。“四人帮”成员早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重要成员,后全部进入中央政治局,并担任极其重要的职位。在其政治活动期间,领导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名义上执行“左”的革命路线,对大批老革命同志,国家干部,知识分子进行迫害,试图夺取国家政权。

^⑬ 1973 年 7 月,毛泽东指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江青一伙接过毛泽东提出的这个口号,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1974 年 1 月“批林批孔”运动遂在全国开展起来。这个运动历时半年左右。在这期间,江青一伙借“批林批孔”之机,露骨地攻击周恩来,借机进行夺权活动,后被毛泽东发现,其阴谋未能得逞。

^⑭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1-1975-XZ11-24.0019。

并从1973年秋季恢复招生。当时,学院尚处于迁回北碚的过程中,不少教职工还在梁平、忠县,北碚的校舍遭到严重破坏,仪器等教学设备所剩无几,图书资料残缺不全,财力、物质各方面的条件很差,政治环境也比较恶劣,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在短期内开学行课,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全院教职工没有被困难吓倒,千方百计创造条件,终于恢复了中断七年之久的教学工作。当时的招生是按“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方式进行的,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根据这种情况,学院决定各专业学生入学后都先用半年时间补课,并加强教师辅导等教学环节,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学生基础差的缺陷。为了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锻炼培养学生良好的作风和实际工作能力,学院安排了半年时间进行学军、学农、学工、教育实习等实践活动,其中以学军最为重要,每届学生都要到部队学军一个月。从1973年到1976年,学院共招收了四届工农兵学员2608人,其间还招收过函授生一万多人(未经入学考试,也不发文凭)。

从1974年上半年开始,各系开始把课堂搬到工厂、农村,实行开门办学。在开门办学中先后在城乡举办了几十个各种类型的短训班、训练班、培训班。1975年9月,学院在达县专区开办一届“社来社去试点班”,文、理科学院各召50人。学生由公社推荐入学,毕业后回到公社作教师。与此同时,学院还与万县专区合作,采取专区主办,学院派教师讲课的方式,举办了一届“社来社去试点班”。

由于受到“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和“左”倾错误的严重影响,“文革”期间按“以典型产品、战斗任务组织教学”的模式进行教学工作,教学质量得不到保证。但由于教师的尽职尽责和学生的勤奋好学,四年中还是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人才。

(二) 科学研究的开展和取得的成果

“文革”中,由于学院科研仪器被毁,科研材料和资料也残缺不全,科学研究无法开展而被迫中断了几年,直到1972年才开始逐步恢复。由于当时财力、物质各方面的条件很差,政治环境也比较恶劣,学院教职工忍辱负重,想方设法地创造条件进行科学研究,同时学院加强了对科研工作的管理。在学院和教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学院的科研工作很快得到发展。1973年后,省、市下达课题、合作和自拟课题都有增加。1972年~1973年仅21项,到1975年增加到了56项,增长了一倍多。从1972年到1976年,学院共有自然科学项目168项(完成42项,有69项按计划进行,有38项进展不大,另外有19项停止研究)。在完成的项目,《四川西北部植被调查》、《无氰电镀的研究》、《“优选法”的推广应用》等科研成果都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这些成果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文科的科学研究几乎被批林批孔等所取代,研究课题很少。主要就是编写《汉语大字典》,还有就是编写教材,如《基本乐理》、《英语语法手册》等,因受“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这些教材有的编成后仅短期试用,有的尚未使用便被封存。

(责任编辑 马云飞 李亚勃)



70年代学生“大批判”¹⁵

¹⁵ 高石汉摄。见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1-1950-1990-1.0028。

《海瑞罢官》中的吴宓

——解读《吴宓日记》一则

□文/刘重来

编者按：吴宓(1895--1978)，字雨僧(亦作雨生)，陕西泾阳人，国学大师，著名红学家、中国比较文学先驱。1950年起在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执教达28年。“以真为归，惟理是崇，遵道而前，任其所之。只知有是非，而不容以利害苦乐人我今昔之见，扰杂其间。无所用其惶惑顾忌”——先生如是说，亦如是行，即使因此获咎、遭难仍不改先生本色，直道而行。



吴宓先生 1963年9月1日摄于成都

吴宓与吴晗，抗战前虽曾同在清华大学，但当时一位是全国知名的教授，而另一位只是个在读的大

学生(吴晗1931年入清华大学史学系读书，吴宓则已在清华任教多年，时为外文系教授)，彼此自然没有什么交往。抗战时期，两人又曾一度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但或许因年龄及专业、志趣的差异，彼此也无什么交往。解放后吴宓远在西南一隅的重庆北碚西南师范学院任教，而吴晗则在首都任北京市副市长，彼此更无什么来往。

然而谁能料到，发生在“文革”之初的那场批判《海瑞罢官》的政治风暴也把吴宓卷入其中。在《吴宓日记》(三联书店2006年版)中，吴宓记下了他在这场政治风暴的遭遇和思想变化，读来让人感慨，让人钦佩，也让人深思。

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在并不显眼的位置刊登了姚文元写的，矛头直指吴晗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谁也没有料到，这篇开初并不起眼的文章，竟隐藏着一个精心策划的大阴谋，随即掀起了一场震撼全国的政治风暴。在“四人帮”得意忘形之时，这篇文章被他们吹嘘为“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而实际上，它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政治大冤案，并由此开场了惊心动魄的十年

浩劫、十年内乱。不仅吴晗身死家亡，成了“文革运动”开场祭旗的牺牲者，且使包括吴宓在内的成千上万知识分子惨遭迫害。

一、“愤怒不服，几于发作”

当姚文发表之初，并未引起多么大的反响，全国最大最有影响的几家大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并不买账，拒不转载，半个多月过去了，仍未有动静。据说毛泽东震怒了，下令出小册子。不久，这些大报被迫转载了此文，为了“引蛇出洞”，火力侦察，江青、张春桥等人又策划了对姚文的大讨论。

12月下旬，即姚文发表一个多月后，这场大讨论小册子已到了吴宓手中。他在12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

下午，读《〈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材料》小册子，遂取《明史》279（卷）《海瑞传》等篇阅之。^{①P312}

第二天（即12月22日），他又在日记中写道：

上午，读《〈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材料》小册子，完。^{P312}

你看，吴宓在读这个小册子时，并没有按姚文所定调子轻易下结论，也没有受讨论文章的观点影响而人云亦云，而是用了二天的时间认真看，并对照《明史·海瑞传》进行思考。而思考的结果，在第三天就显露出来，那就是“愤怒不服，几于发作”。这一天（即12月23日）下午，吴宓所在中文系根据上面布置“讨论”吴晗与《海瑞罢官》，这是他参加的第一次讨论。不少老师自然是按上面所定下的调子对吴晗和《海瑞罢官》进行批判，吴宓越听越不是味，越听越反感，就在当天的日记中表达了他的愤激态度：

下午2:30~5:30，中文系混合教研组（第一组）凡十二人，在古典文学教研室续讨论吴晗1961年所作京剧剧本《海瑞罢官》，中间休息一次，记录粘存（吴宓有个习惯，开会时认真记录每一个人的发言，然后粘存在日记中——笔者）。在讨论时，宓闻诸君之发言，愤怒不服，几于发作，然能始终隐忍含默，未露形迹，幸耳。^{P313-314}

在这里，吴宓虽然没有写明使他“愤怒不服，几于发作”的具体内容，但他的态度却是十分鲜明的，那就是对批判吴晗和《海瑞罢官》极为反感，极为不平，甚到了不能容忍，“几于发作”的地步。

二、“隐忍含默”的苦衷

但为什么吴宓对批判《海瑞罢官》，“愤怒不服”却又“隐忍含默”呢？一是在一年前的“四清”运动中，吴宓被当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横遭批判，甚至剥夺了他上课的权利，自此以后他被迫离开了一生安身立命的讲台。二是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往往都是先鼓动大家畅所欲言，保证言者无罪。后政治风云突变，又以言获罪，揪住不放，惨遭迫害，有冤难申。使吴宓等知识分子心有余悸、无所适从，只好“隐忍含默”。

此次批判《海瑞罢官》，也和过去的政治运动惊人相似。姚文刚出，一片死寂，大家敢怒不敢言，自然使策划这场大阴谋的江青、张春桥等人大为恼火。江青说：“要‘引蛇出洞’，让他们讨论这篇文章，把观点



吴晗先生

^①《吴宓日记·续编》第7册（1965~1966），三联书店，2006年4月版。本文所引日记原文，皆在此册，故只标页码。



1959年6月5日西南师院中文系进修班师生合影，
前排自左至右为苏鸿昌、徐德庵、魏兴南、赖以庄、吴宓、李运益

都暴露出来。”为此，他们操纵报刊发起对《海瑞罢官》大讨论，有意发表一些对立的意见，说是为了促进“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等等，实际上是暗藏杀机，欲一网打尽。

于是在吴宓手中，才有了《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材料》的小册子，才有了一时间在全国鼓动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的短暂“开明”现象。这种情况迅速在12月27日吴宓日记中反映出来：

8:00 分组座谈。古典文学教研室混合组，共十六人，仍×××^②主席，(一)×××朗读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八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附六条政治标准)，全文。命众多暴露思想、说出不同意见。(二)续评吴晗所作京剧《海瑞罢官》，……^{P318}

从这篇日记可以看出，为了鼓动大家放心大胆畅所欲言，特安排学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强调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吴宓心有疑虑，他在“命众多暴露思想，说出不同意见”句中用了一个“命”字，颇耐人寻味。虽然当场也有几位教师发了言，但吴宓仍“隐忍含默”，未发一

言。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在3天后（即12月31日）的日记中多少可以找出答案来：

去年1964年除夕前后，在社教运动中，宓方受斗争甚烈，检日记犹为惊心，……此乃是宓1965年除夕之心情。^{P323}

此时此刻的吴宓，仍为一年前在“四清”运动中横遭批判而心有余悸，一想到那些“斗争甚烈”的场面“犹为惊心”，他哪里还敢畅所欲言呢？

三、“奉命”的无奈与“痛攻”的荒唐

对全国掀起的批判《海瑞罢官》运动，吴宓从心底里是极不情愿和极为反感的。这种心情从1966年1月6日的日记中十分清楚地表露出来：

下午2:30至5:00，在中文系资料室奉命读《海瑞罢官讨论资料》，多不胜读。宓今日所读，凡二篇：(一)吴晗自作检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先登十二月二十四日《北京日报》，十二月三十日《人民日报》转载。极详尽，自承错误。(二)方求再痛攻吴晗《〈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刊登十二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二十八日作成)斥此剧为“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历史观、道德观在艺术中之集中表现”及“借古非今的反社会主义思潮”，且谓其与1962、1963之(A)台湾、印度进攻中国(B)国内要求自由市场、农业单干及包产到户等之恶风密切配合，云云。^{P331}

吴宓在日记里，用“奉命读”三个字，形象地道出了他对这场大批判的无奈。而对那些血口喷人、肆意歪曲的批判文章，则用“痛攻”二字表达了自己的反

^②《吴宓日记》中所涉及的人皆指名道姓，本文则以“×”代替。

感。他特别记载了一篇批判“佳作”，竟给《海瑞罢官》扣上了“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历史观、道德观在艺术中之集中表现”及“反社会主义思潮”的大帽子。更为荒唐的是，竟把这部颂扬海瑞精神的剧本与当时台湾叫嚣“反攻大陆”，印度挑起边界纠纷连系在一起，甚至卑劣地诬蔑这部剧本是与当时出现的要求自由市场、农业单干、包产到户“密切配合”。这样的上挂下连，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四、苦于不知政治运动“真实意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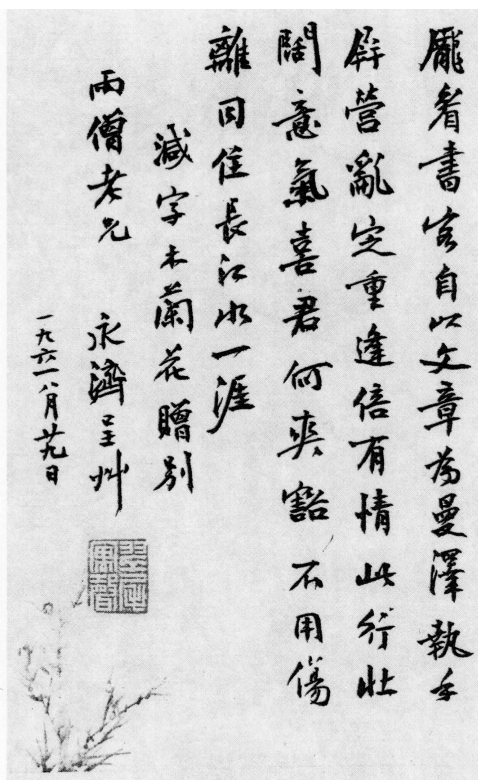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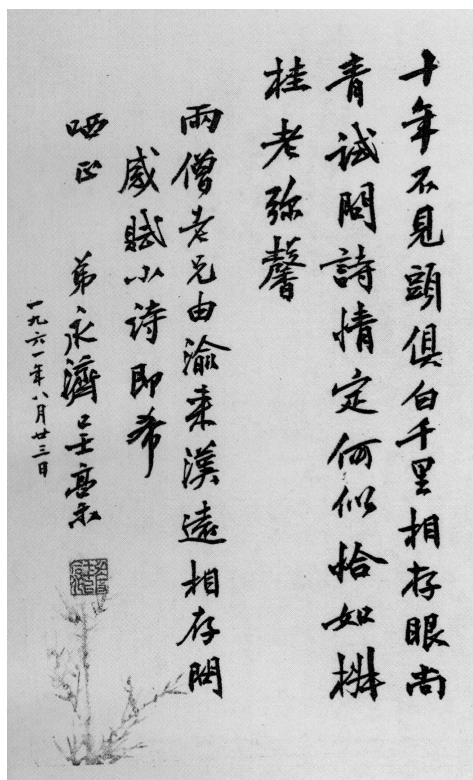
吴宓只是一介书生，平时只埋头于学问，不问政治，也不懂政治。而政治风云的变幻莫测，常使他如坠云雾之中，不知如何是好。为此，他吃了不少苦头。此次批判《海瑞罢官》，来势凶猛，声势浩大。他虽知来头不小，但仍苦于不明其真实意图。

1966年1月13日晚，吴宓所在的西南师范学院4位教授，皆民盟成员，齐集其一家里，以组织生

活会名义，座谈“《海瑞罢官》应如何讨论和理解”，吴宓本非民盟成员，但因与这几位教授关系好，也被邀请参加。也许是因为在私人家里，也许是参加者都是较好的朋友，气氛比较宽松。所以吴宓也发了言。这是他自批判《海瑞罢官》以来第一次发言，他向大家坦露了心中的困惑和苦恼。在这天的日记里他简述了发言内容：

宓谓：宓一意恭恪服从，但恒苦不知党政每一运动中之真实意旨所在，然自1964年春以来，加强阶级斗争，阶级观点，批判吴晗，评斥《海瑞罢官》，只是教我们如何认识历史、文学，即是“封建社会，地主官僚阶级，从来无一好人，无一好事”，勸我们如是想，如是说而已，云云……^{P338}

实际上，像这样的困惑和苦恼，岂止吴宓一人。说起《海瑞罢官》，其作者吴晗本人更是有苦难言，有口难辩。1959年4月党中央上海会议期间，许多同志在总结1958年以来“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时都提到要提倡敢讲真话问题。这期间毛泽东看了有海瑞



1961年8月吴宓由渝赴汉访友，刘永济赋诗相迎又作词赠别



出场的清官戏《生死牌》，认为海瑞虽然攻击皇帝很厉害，但对皇帝本人还是忠心耿耿的，提出要学习海瑞“刚直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并希望找几位历史

瑞》和京剧《海瑞罢官》。可谁知天威叵测，风云突变，宣传海瑞精神一下竟成了一桩反党反社会主义大罪状，《海瑞罢官》也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五、善良愿望与“引蛇出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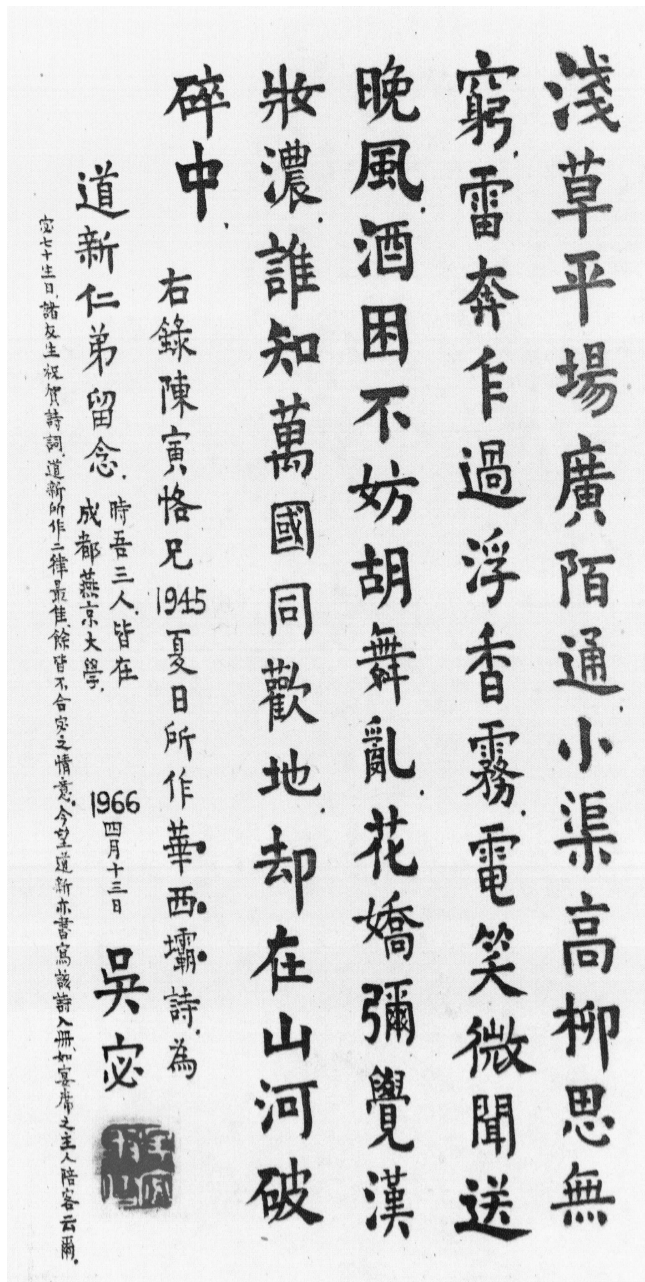
然而像吴宓这样的知识分子尽管疑虑重重，但仍然是从善良的愿望正面理解这场运动，哪里能料到江青、张春桥等人仓藏的祸心和“引蛇出洞”的阴谋呢？吴宓在1月13日晚的日记里记载了当他坦露心迹，道出困惑后另一位教授的发言内容：

最后×君（西南师范学院民盟支部负责人之一，中文系教授——笔者）乃本其所独知而作指示，谓当局发动《海瑞罢官》之广泛讨论，其目的有二：（一）望我们重新学习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知政治与学术攸分（吴晗之作《海瑞罢官》，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学术思想，而非政治问题），俾我们学习时，可以畅所欲言，不存顾虑，而不至尽向一边倒，同众完全一致，弗敢“争鸣”矣。（二）望在学习讨论中，培养成平等地一同虚心讨论之风气，庶几老年教授、干部不至妄自尊大，不受批评，而青年助教、领导人亦可从容无惧地、对老辈提出批评意见，云云。众称善，谢×君而散。^{P338}

这些知识分子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这场政治风暴即将凶猛刮来之前，他们的所思所想，是何等天真，何等善良。他们虽然心存疑虑，但仍相信上面布置学习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的目的，是要大家明白批判《海瑞罢官》只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学术思想而非政治问题。因此，可以畅所欲言，可以不一边倒，甚至可以通过这场运动，来“培养成平等地一同虚心讨论之风气”。这样的一厢情愿的想法代表了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善良愿望。

发言的那位教授是西南师范学院民盟负责人，在吴宓心目中，是有“所独知”而可“作指示”的人，他的发言很符合吴宓等人的心愿，故“众称善，谢×君而散”。吴宓似乎也精神振作了一些，在第二天（1月14日）的日记里写下了他此时此刻的思想态度：

自1964年至1965年社教运动以来，更知宓出身地主阶级，受资产阶级教育，其关系之重大，而思



1966年4月13日，吴宓先生为燕京大学毕业生、西南师范学院同事凌道新录陈寅恪先生旧作《华西坝》诗留念

学家研究一下海瑞。由于吴晗是著名明史专家，一位领导同志向他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鼓励他研究、宣传海瑞。自此，吴晗才陆续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

想改造在宓尤为急要,应勉力去作。宓今后一切思想行动,均必遵从毛主席之指教,而目前则首应为王杰“不怕死、不怕苦之精神”。按宓年过七十,老人最注意、首应解决者,为生与死之矛盾。宓今生活满意,心情乐观,健康无病,对于生死问题,宓今不思不计,×君谓是“置之度外”。听取其自然。宓在1958年已曾宣布“对于现今之宓,我即刻死,明天死、二年五年十年二十年死,心情上都是一样的,早死不悲,迟死不喜,临死亦不惧。”云云。然在世一日,仍必勤学勤读,努力工作,一若我尚可在世许多年者。——附言,宓今虽不授课,然勤学勤读为宓之生性与习惯,故造行不辍,不问其有用与否,亦不能言其目的何在,此宓今之实在情形也。^{P339-340}

又过了几天,吴宓等人对这场运动真实意图的善良愿望似乎又得到了进一步证实。2月16日,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总支书记传达上级关于对《海瑞罢官》问题的精神。吴宓在当天的日记中把这位书记的传达记录了下来:

×××书记又谈及《海瑞罢官》等学习,勸宓等直陈所见,畅所欲言,盖既是学术讨论,而非政治问题,即座齐放、争鸣,不必亦不当“一边倒”,云云。^{P356}

看来,这位书记所传达的上级精神正符合吴宓等知识分子的善良愿望。而出自基层党组织领导嘴里的这些保证和鼓动,自然又和那位民主党派基层领导的教授发言份量大不一般。他们心动了,顾虑打消了,想要“直陈己见”,也不打算“一边倒”

了。然而他们根本没有想到,此时此刻江青、张春桥一伙布下的无形大网已张起,只等鱼儿上钩了。几个月后,凡敢“直陈己见”,大胆“争鸣”,没有“一边倒”的人,包括吴宓及那4位教授,统统被真正打翻在地,实实在在体尝到了“畅所欲言”的滋味。

六、明白真相,气愤“不能自持”

“引蛇出洞”时间虽然短暂,但望洋兴叹在这短暂期间,不少人为吴晗鸣不平,为《海瑞罢官》仗义执言。仅历史学界就有著名史学家翁独健、翦伯赞、周谷城、周予同、李平心等人发表文章痛斥姚文。仅《文汇报》就收到三千反对意见的稿件。

但形势急转直下,江青、张春桥见“引蛇出洞”的目的已达到,便露出了狰狞面目,开始了大收网。2月23日,即某书记传达上级意见,做出种种保证才7天,西南师范学院突然召见几个系的教师30多人开会,吴宓也参加了。会上,从北京来的《人民日报》理论部副主任××向大家讲述了北京及各地批判《海瑞罢官》情况。使吴宓大吃一惊的是,风向发生了大转弯,学术讨论已转化为严酷的政治斗争了,开始了



1994年6月各地到西安参加纪念吴宓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讨论会的学者为先生扫墓

已不是什么人民内部矛盾，更不是什么“学术讨论”，诚如他在5月7日的日记里所说：“近由批判吴晗起，始知此是阶级斗争。”^{P427}。也就是说，批判吴晗和《海瑞罢官》，早已被定为你死我活的严酷政治斗争，只是不过对吴宓等大多数人来说，一直蒙在鼓里。

果然，对吴晗和《海瑞罢官》的批判升级了，那些断章取义、颠倒黑白、肆意歪曲的“声讨”、“批判”席卷中国大地，吴宓的反感、抵触和痛苦也加剧了。3月15日，吴宓在日记中记下了他在“批判”《海瑞罢官》的痛苦心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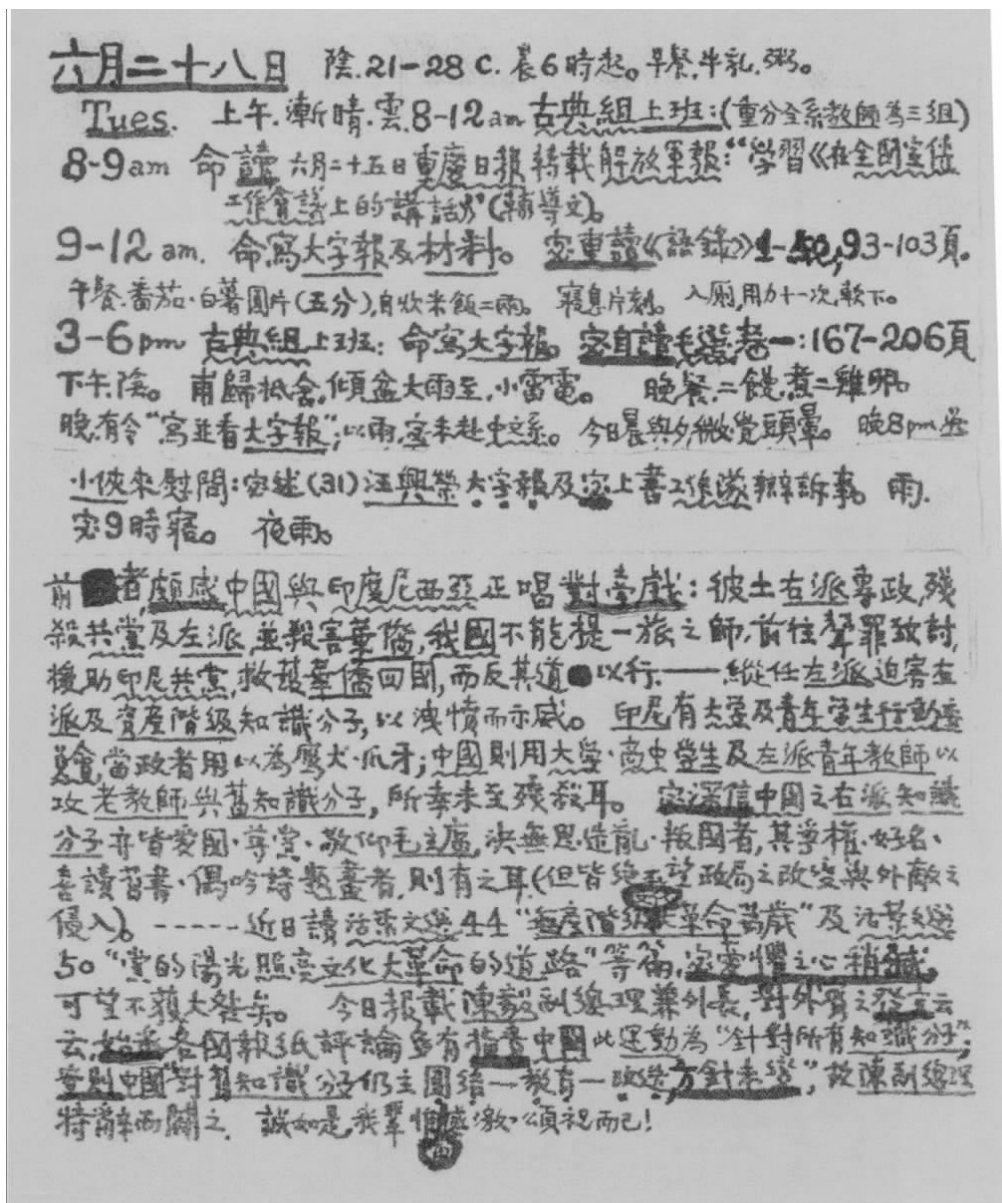
下午，早到中

文系。2:30~5:00 续讨论近日师生《海瑞罢官》学习之佳作九篇其五、其六，记录粘贴。中间几乎不能自持，十分气愤。此长期学习为大苦，宁愿速死为佳，立觉左肺甚痛（日来头沸耳鸣仍甚）。^{P394}

看阅一篇篇歪曲诬陷的所谓批判“佳作”，吴宓火冒三丈，痛不欲生，他的态度是多么鲜明！

七、痛苦中的思考

此时的吴宓，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联想到他在



1966年6月28日吴宓日记手迹

“一边倒”的大声讨、大批判。吴宓在日记中写道：

××同志讲话，首言此来乃为《人民日报》学术副刊征稿，望诸君就学习所得，多投讨论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及批判《海瑞罢官》、《谢瑶环》、《李慧娘》之稿件。次论北京及各地批判《海瑞罢官》之情形，乃知凡“批判”即是政治问题，而吴晗之罪，实因其作此剧本，意在为1959年庐山会议后，许多党内之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罢官”者鸣不平耳！

.....^{P379-380}

××的讲述，使吴宓等知识分子如梦方醒，才明白既然是“批判”《海瑞罢官》，那么就已注定这场运动

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四清”运动遭到的种种凌辱,他更感到前途暗淡。3月23日,他在日记中倾述了自己的痛苦:

近年厉行阶级斗争,督促思想改造,既举中国数千年之德教习俗、学术文化,摧残湮灭净尽,已使吾侪伤痛已极,而在各种演讲、报告、学习、讨论会中,更视宓等老教授为阶级仇敌,反动、落后、顽固分子,冷嘲热骂,使耳聆、目击、身受者,更不能堪。宓今日下午学习会中,又起此感,惟盼早日死去,如×老(吴宓好友、老教授,不久前去世)之长眠地下,真成无知,是诚幸福也已!^{P403-404}

4月6日,他在中文系一次政治学习会上检查了自己的思想,虽然他自认很诚恳,但“犹不合格”,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

上午8至12,中文系三八作风学习会,……宓发言一次,自己检查,虽言之甚诚,犹不合格。盖按照“阶级观点”,则凡我辈地主及资产阶级出身之人,决不能有任何善言善行,且必不能改造。而数千年之中国,古与今之西洋,除马恩列斯及工人、农民外,亦无一好人,无一好事,无一长之可取,无一德之足记。……如此,焉得为真,焉得云平?故学习会中之发言者,率皆依据公式、定规,而巧佞其辞,自眨自责,言不由衷。即座中听其言者,亦共知其非诚,然必如此乃可生存栖息于今之学校、社会。呜呼!是教民相率趋于诈伪而已。其合情理,强人所难,更不待说也。^{P408}

这是一段多么沉重、犀利的剖析。在那“一言堂”盛行,以言获罪的时代,吴宓清醒地认识到“左”的极大危害,看到了大家都不敢说真话,都以假话自欺欺人的种种无奈,他十分痛苦。但是吴宓却不愿说假话。就在写了上述文字后的第三天(4月9日),他终于发言了:

上午8至12,又下午2:30~6:30,中文系民兵训练,学习会,座谈“昨聆×××讲毛主席1957年《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讲话》后之体会与收获”。宓首先发言,暴露自己之真实思想情甚多,自命为中共进忠言,或且以此获咎,亦未可知。^{P410}

你看,吴宓在经过深思熟虑后,在学习会上第一个发言,他明明知道“暴露自己之真实思想感情”可能会“以此获咎”,但他下决心要向“中共进忠言”。但

他不明白“忠言逆耳”的后果。我们虽然没有在吴宓日记中看到 he 发言的内容,但他2个月以后的悲惨处境就完全证实了他不仅为讲真话“获咎”,而且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八、明白宣言:“晗之所论皆宓之所欲言”

当吴宓终于明白了批判《海瑞罢官》的真相后,他对这场卑鄙阴险的政治陷害极为抵触和反感。4月13日中文系批判《海瑞罢官》的会上,他竟在会上“昏睡”,后来当他“昏睡既足,醒后发言,甚流利生动”^{P414}。可惜,他在日记中也没有记载发言的内容。但第二天的日记(4月14日)中,我们终于明确看到了他对批判《海瑞罢官》的真实思想:

阅《重庆日报》对吴晗批判汇编。实则晗之所论皆宓之所欲言,特宓之不涉政治,既无讽刺指责之和愤,亦乏谏说谎箴规之愚忠耳。^{P414}

此时此刻,全国上下正是铺天盖地对吴晗及《海瑞罢官》进行大声讨、大批判之时,吴宓竟然在这样的时刻公然宣称“晗之所论皆宓之所欲言”,铿锵之声,振聋发聩。在当时的中国,敢如是说,如是想的有几人?

不仅如此,吴宓还对吴晗的著述进行仔细研谈(一年以后,他已被打成牛鬼蛇神后,还在悄悄读吴晗的《灯下集》和《读史札记》),直言宣称吴晗所论著“实悖谬之处”,并宣吴晗的论著“固宓皆所赞同者”。这些话都记在他5月19日的日记中:

下午3—6,古典组学习会……自读西南师际编印《学习讨论参考资料(4)》:吴晗论历史研究。宓按:……吴晗论历史研究,论道德继承,实无悖谬之处,固宓皆所赞同者。(但为《海瑞罢官》所累耳)^{P437}

吴宓居然在批判声讨吴晗最激烈的时刻,旗帜鲜明地表明赞同吴晗论著观点,实在是太难能可贵了。

到了5月下旬,文化大革命伴随着一批批无辜的人被“打倒”、“横扫”、“炮轰”惊心动魄地开始了。批判《海瑞罢官》也更加升级。5月30日,中文系从上午到下午,都集中学习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并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的《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等,晚上又继续进行。此时的吴宓,痛苦、愤懑、疲惫交

织,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控制不住自己,再也无法“隐忍含默”了,郁积在心的满腔怒火终于爆发了。这天晚上他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在日记中写道:

座谈时,宓以久久感愤悲郁至极,今晚疲倦特甚,不能控制自己,遂作出甚长之发言,一发难收,倾泻而出,众为动容……宓回舍休息,爽然清醒,乃悔发言激动,尽泄心情之失,或将由此得祸(谓宓不肯学习改造,以自杀、寻死吓唬领导)。但后悔已无及。^④

可惜的是,吴宓在日记中并没有留下他“甚长之发言”内容。但果不出吴宓所料,他为自己“倾泻而出”的真话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一个多月后,他被打成牛鬼蛇神,戴高帽、挂黑牌(竟和吴晗一样,黑牌上都写的是“反共老手”),天天被批斗,受尽凌辱。一次批斗会上,他被革命小将架进会场时摔断了腿,从此,吴宓就一瘸一瘸的走路,直到他逝世。

九、结语

“文革”十年,是悲剧、闹剧、怪剧、荒诞剧竞相上演的十年。在那个舞台上,有些是卑鄙、丑恶、虚伪、阴险、凶残、谄媚的原形毕露;有些则是正直、耿介、真诚、善良的人格展现和思想升华。从吴宓日记中,我们看到了他守正不阿、真诚善良、表里如一的本色。吴宓的学生、著名作家杨绛(钱钟书夫人)曾说“吴宓先生是真诚的”,也是一位“老实得可怜”的人,但却“又不是糊涂人”,他“能看到世道人心和他的理想并不一致”,但“还是坚持自己一贯的为人”^⑤在批判《海瑞罢官》的政治风暴中,可以看出吴宓正是这样一个人。

(责任编辑 徐林)



1998年6月吴宓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暨吴宓学术研讨会与会人员合照

^④ 杨绛:《吴宓先生与钱钟书》,载王泉根主编《多维视野中的吴宓》,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4页。

校地合作，比翼双飞

——记西南大学科技扶贫之石柱模式

□文/马云飞 整理编辑

编者按：2003年10月原西南农业大学(西南大学前身之一)与重庆市石柱县正式建立县校合作关系,学校各学院与地方乡镇和政府部门开展了“一院一镇一部门”的产、学、研对接工作,共同推进科技扶贫。当时这在全国尚属首创,被《光明日报》誉为“石柱模式”。历经七载,县校全方位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成果喜人,引起诸多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广泛报道与关注。2006年初得到时任重庆市委书记汪洋、副市长黄奇帆等领导的肯定,并指出在新农村建设和整村推进的扶贫工作中应大力宣传和推广“石柱模式”。

一个是渴望寻求教学科研实习实验基地的高校,一个是希望科技之光照射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西南大学与重庆市石柱县的合作有人称其为“黄金搭档”,也有人称其为中国城乡统筹发展中的奇葩。

石柱县地处重庆东部,是一个集少数民族、三峡库区移民、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为一体的农业弱县。农业产品附加值低、产业科技含量低、农民科学素质低,一直是困扰当地政府的难题。重庆变直辖市后,由重庆市农工委扶贫集团牵头对石柱进行对口扶贫。西南大学(时为西南农业大学,2005年与西南师范大学合并,组建为西南大学)参与了对石柱的对口帮扶。起初,西南大学只是通过组织讲座、捐赠现金、提供物资来帮扶,这种“输血式”扶贫,对一个经济落

后的国家级贫困县来说,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造血功能”问题。石柱是农业县,有丰富的农业资源但基础薄弱,特色产业看好但后劲乏力,十分需要增加科技含量。西南大学是国家重点大学,专家学者云集,有大量的科技兴农成果,而且也渴求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寻找教学科研实验基地。两者如果能够有效合作,一定会相得益彰。于是双方都萌生出创新合作模式、扩大合作领域的强烈愿望,这样,共同的需求和愿望促成了县校合作模式的诞生。2003年10月,双方正式达成协议,决定把石柱县建成西南大学的“农业科技综合示范基地”,西南大学的有关学院与石柱的有关乡镇部门结成对子,在产、学、研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合作,实施科教扶贫,全程参与石柱经济的发展。7年多的实践证明,这是一种有效的县校合作模

式,是一种互利互惠、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合作模式。

创新: 实行科技扶贫新模式

基于校地合作的需要,学校成立了以党委书记为组长的校地合作领导小组和以校长为组长的校地合作专家咨询组,并组建了常设机构——校地合作处,校地合作处在石柱设办公室,派员长期驻扎。在全国高校中,有“校地合作处”的,恐怕仅西南大学一家。全校 10 多个涉农学院,与石柱县的政府部门和全县 12 个乡镇,开展“一院一镇一部门”产学研对接。各个学院结合学科特点和所对接乡镇的资源及产业优势,转化相关农业科技成果,引进业主,兴办科技产业,“示范几户,带动一村;示范一村,带动一镇”。学校将各学院在对接乡镇推进高效生态农业和农业产业化的成绩,纳入年度考核。学校经常性地选派科研人员前往石柱各乡镇、村社,举办各种农业技术培训班,培训乡镇、村社干部和农民。两年间,仅接受重点培训的乡镇村社干部和农民技术骨干就超过了 2000 人。这些人组成了覆盖全县的农业科技普及网。除了校地合作处派驻石柱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外,长期蹲在石柱的还有学校根据石柱县地方发展的需



冯昌荣教授(左三)在石柱指导养猪

要,专门组建的一支身体好、专业优、肯奉献的离退休科技专家顾问团——“晚霞专家组”。他们常年跑田坎、入农家,帮助一家一户解决农业科技问题。发挥“一个专家带动一个产业”的作用。在开展农业科技扶贫的同时,西南大学还启动了“智力扶贫”。发动全校教职员在石柱开展“1+1”帮困助学。2005 年仅此项资助的金额,就超过了 20 万元。西南农业大学和西南师范大学合并后发挥师范教育的优势,通过优秀的师范本科生到石柱乡村中小学“顶岗”的方式,更深入地开展助教助学工程。

互动: 全方位合作与发展

(一) 专家带动产业

如何发挥专家特长、服务地方经济?西南大学的专家学者首先是以严谨科学的态度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编制了一系列产业发展规划,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石柱县绿色生态经济重点产业发展规划》为石柱确立菜、药、畜、游四大经济支柱产业理清了思路,通过了国家和市级专家评审;《石柱黄连产业链策划》为石柱中药材产业——黄连产业发展提供了蓝图;《猪鬃产业发展规划》、《辣椒科技示范园区规划》、《大风堡原始森林旅游规划》、《药用植物园总体规划》等,则为产业发展提供了科学的、可操作的依据和措施;与石柱共同制定的《“十一五”县校合作规划纲要》更成为县校双方合作的指导性文件。特别是“晚霞”专家组的成员,深入开展重点产业的技术研发、技术服务和技术培训工作,打造当地的特色产业。

(二) 实施院镇对接,深化县校合作

“院镇产学研对接”是县校合作模式的精髓。西南大学的蚕学院、园艺园林学院、食品学院、药学院、农学院、植保学院、水产



2010年4月16日西南大学农林试点实践基地建设暨石柱黄连研发合作签字仪式在石柱县人民宾馆举行,图为石柱县县长冉茂忠在仪式上讲话,图右四为西南大学校长王小佳

学院、荣昌校区等12个学院(校区)与石柱县农业局、畜牧局、农办、经贸委、旅游局、县人大办、县计委、林业局、扶贫办等12个部门及南宾、西沱、黄水、下路、龙沙、大歇、马武、三河、冷水、六塘、三星等12个乡镇开展了院镇及产业对接。在教学科研等方面把院、乡镇、部门、产业融为一体,发挥了县校双方资源优势,推动了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了农业产业化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如蚕学院在南宾、马武、三河大力推广大棚省力化养蚕技术,建立了高效生态蚕桑科技示范基地;园艺园林学院在南宾、黄水、冷水、六塘等地的辣椒、蔬菜品种选育和栽培技术推广取得较大突破,还启动了高山反季蔬菜试验及魔芋品比试验、病虫害防治效果试验,均取得较好效果;食品学院与有关公司合作,在龙沙、大歇等地以辣椒为原料成功研制出“德庄牌”酸菜鱼、香水鱼调料,新型保健食品“生物富集钙”已进入市场运作;药学院在黄水进行黄连副产物的利用开发,研制的黄连花茶供不应求,“兽用复方中草药添加剂”防治长毛兔热应激及生猪无名高热成效明显;农学院在龙沙镇建立两杂良种制种基地,制种水稻、玉米近1000亩,为制

种农户增收近200万元,并开展了何首乌人工驯化扦插栽培技术的试验;植保学院在六塘等地对烤烟、板栗、花椒、直杆兰桉等作物的病虫害防治进行实地诊断,提出了综合防治方案;水产学院为做好龙河大鳍鲩种质资源的保护进行了专题研究;经管学院在下路为石柱宏达畜产品有限公司猪鬃产业发展作了详尽规划;荣昌校区在家畜家禽饲养技术、渝西乌鸡新品系列繁殖等方面作了大量的培训与指导。2010年4月16日西南大学农林试点实践基地建设项目再次落户石柱。

(三) 引进培育业主,促进成果转化

为尽快把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西南大学一方面在外地引进企业,另一方面在当地培植业主,以业主为转化的主体,通过业主的产业化经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目前已成功引进了重庆瑞洋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落户西沱建立了优质牛羊肉生产加工基地、引进重庆德庄餐饮集团公司落户大歇建立了辣椒加工基地、引进重庆新资源蜂业有限公司落户鱼池建立了千野蜂业有限公司、引进重庆利农一把手科技有限公司落户龙沙建立优质粮油制种基地。同时还为县中药材公司、县黄连公司、县种兔场等多家企业以及种养业大户提供技术支持,培植县级龙头企业、专业大户40多个。

(四) 攻克技术难题,推动重点产业

针对农民在长毛兔、生猪、辣椒、烤烟、蚕桑、花椒等产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重大技术问题,西南大学的专家进行了专门的研究。石柱长毛兔存在夏季仔兔死亡率高、秋季母兔受孕率低、冬季成年兔体弱三大难题,畜牧专家冯昌荣^①成功研制出中兽药制剂,使仔兔死亡率由45%降到5%以下,秋季母兔受孕率由30%提高到90%。冯昌荣教授在石柱生猪无名高热病发生期间,主动参与疫病的扑灭工作,

^① 冯昌荣,1963年四川农学院兽医专业毕业,1963年至1974年在四川南充农校工作,1979年在西南农学院兽医专业系担任教员,1985年后任西南农业大学副教授、教授,长期担任动物科技学院教学与研究工作,是著名兽医专家和畜牧专家,1994年退休。见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3-TX0505-006。

研制的治疗生猪无名高热中兽药制剂使其发病死亡率由 36.7% 下降到 4.4%，为农户挽回经济损失 16000 多元；植物保护专家邓先明^②为大歇乡和力场乡近 4000 亩花椒提供病虫害防治技术指导，有效地控制了锈病、白绢病及蜗牛、红黄蜘蛛对花椒的危害；蚕林专家林元吉^③向农民传授大棚养蚕技术，并使“桑、蚕、草、兔、菇、气”的“高效生态蚕业”渐成气候，推动了循环经济在石柱的实践；荣昌校区水产系主任郑曙明^④教授曾指导了石柱县的水产工作。研究

院的专家还卓有成效地解决了佛手规范化栽培、脆香甜柚不开花不挂果的难题。

(五) 引进新兴技术, 开展农民培训

西南大学还在石柱推广庭院养蜂技术，引进意大利蜜蜂，提高养蜂效益近 10 倍，调动了农民养蜂的热情，养蜂产业因此有望成为石柱经济的后续骨干产业。类似的新品种、新技术项目的引进和推广，近年累计达 9 项。为把石柱农业科技综合示范基地建好建实，西南大学派出专家，在田间地头开展各种

技术培训，加大了学校对基地建设的支撑力度，尤其注重发挥退休专家的作用，一批身体好、专业技术能力强的专家组成“晚霞专家工作组”到石柱基地开展工作。如 2010 年 6 月 23 日西南大学张盛林^⑤研究员在魔芋科技实践基地针对农民当前的魔芋生产田间管理进行了详细的讲解。此外，西南大学还利用寒暑假组织在校学生开展智力支乡活动，近年来，西南大学共派出科技工作者 1701 人次，发放科技资料 12000 多份（册），举办蚕桑、辣椒、食用菌、畜牧业等专题培训讲座 68 期，受培乡镇、村社干部和技术骨干 5350 多人次，直接或间接培训农民 9.1 万人次。



2010 年 6 月西南大学张盛林研究员在魔芋科技实践基地向农民讲解魔芋生产田间管理

^② 邓先明，男，教授。1955 年至 1959 年在西南农学院植保专业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1993 年被评聘为教授。长期从事以棉花病害为主的研究工作，获得全国、省、学校的多项科研成果奖，在《西南农学院》和《西农科技》等刊物上发表有一定水平的论文 10 余篇。1992 年获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见西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网站。

^③ 林元吉，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1959 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蚕桑系，留校任教。曾任蚕桑系党支部副书记、副主任、蚕桑丝绸学院副院长、常务副院长、代理院长。西南大学、石柱县人民政府科技合作晚霞专家组组长。1958—1960 年先后受到董必武、陆定一、胡耀邦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1965 年秋天，代表西南农学院参加了重庆市人民政府举行的欢迎国务院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陪同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访渝的隆重盛会。1995 年受国家农业部的委派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市举行的国际 16 届蚕业代表大会。见西南大学生物技术学院网站学院概况离退休教授专栏。

^④ 郑曙明，西南大学荣昌校区水产系主任，硕士生导师。中国水产学会淡水养殖分会委员，重庆水产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重庆动物学会副理事长，重庆遗传学会理事，重庆市市级“科技特派员”。主要从事水产动物遗传育种和水产动物病害防治等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对中药防治鱼类细菌性疾病进行了系统研究，形成了优势和特色，主持参与省（部）级等科研及教研项目 20 多项，发表论文 60 多篇，主编出版专业书籍 6 本，主编的《养鱼全书》获全国优秀畅销书奖等奖项，被评为重庆市优秀教师。见西南大学荣昌校区水产系网站师资队伍专栏。

^⑤ 张盛林，1986 年毕业于西南农业大学蔬菜专业，后留校作科研工作，1995 年获西南农业大学在职硕士学位。现任西南大学园艺园林学院研究员和硕士生导师。西南大学魔芋研究中心主任，重庆高校魔芋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园艺学会理事，中国园艺学会魔芋协会会长，重庆市首届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先后主持省部级课题 8 项，主持横向合作课题 10 项，在省级以上学术刊物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60 多篇，出版著作《魔芋防病丰产栽培技术》和《魔芋栽培与加工技术》，编导《魔芋防病丰产栽培技术》科教片光盘，参编《魔芋学》等。见西南大学园艺园林学院网站学院概况全院职工专栏。

(六) 设立专项基金, 服务石柱发展

为鼓励专家教授结合教学、结合石柱生态资源和农业产业化发展需求开展系统研究, 西南大学启动了石柱农业科技创新专项基金, 依托石柱产业研究和基地建设, 已成功申请到国家、省市级课题 20 余项, “辣椒深加工关键技术研究”、“提高长毛兔成活率的技术研究”、“蜂毒系列产品开发”等 36 个研究项目已由相关领域专家领衔研究。同时, 西南大学还在石柱建起了养蜂研究所、蜂产品实验室、石柱黄连研发中心、中药材研究室等一批科研机构, 为学校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提供了社会实践基地。这些项目的研究开发、相应研究机构的设立, 为学校教学科

研, 为地方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撑和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在抓好科技扶贫的同时, 西南大学还发挥重点大学的校园文化优势, 对石柱的和谐发展开展综合性服务, 如参与石柱整村推进示范村建设工作, 连续两年被市农工委扶贫集团评为对口扶贫先进单位; 开展“1+1”帮困助学活动, 共捐资 31.05 万元, 资助贫困儿童 1125 人次; 同时还为石柱中小学捐赠书包、衣物、电脑等 4000 余件(台), 发挥师范教育的优势, 每年都派出实习支教学生。

见证: 县校合作取得双赢

(一) 社会各界有口皆碑

按照“出成果、出人才、出效益、出经验”的工作思路, 县校合作提高了产业的科技含量, 促进了产业的增产增收, 实现了县校发展的双赢。西南大学与石柱县的合作, 为全国高校如何转化科技成果、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经验, 受到了各级领导和多家媒体的关注。《光明日报》就校地合作对西南大学校长王小佳^⑥进行了专题采访, 并誉其为产、学、研相结合科技扶贫的“石柱模式”。2006 年 12 月, 时任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康纲有^⑦亲自组织了专题调研, 在西南大学党委书记黄蓉生^⑧一行的陪同下, 考察了石柱农业科技综合示范基地, 期间, 县校双方签署了



2006 年 12 月时任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康纲有(左二)在西南大学有关领导和专家一行的陪同下考察石柱农业科技综合示范基地

^⑥ 王小佳, 原西南农业大学校长, 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2005 年 7 月至今任西南大学校长,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审组成员, 全国高等农林院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园艺学科分委员会主任, 中国园艺学会理事, 重庆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见西南大学园艺园林学院网站学院概况全院职工专栏。

^⑦ 康纲有, 高级经济师, 1996 年 6 月任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 1997 年 6 月任重庆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党组成员。2000 年 1 月至 2007 年 1 月任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秘书长, 市一次、二次党代会代表。

^⑧ 黄蓉生, 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2002 年担任西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2005 年 7 月担任西南大学党委书记至今。现任重庆市第二次、第三次党代会代表; 重庆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见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学院概况师资队伍专栏。

县校合作的“十一五”实施规划^⑨(纲要)。康纲有题写了《县校合作是转变农村经济增长方式的有效途径》的调研报告,高度称赞县校合作使我们“看到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希望,坚定并鼓舞了解决三农问题的信心”。时任重庆市委书记汪洋^⑩、市长王鸿举^⑪要求认真总结和推广石柱与西南大学的合作经验,常务副市长黄奇帆^⑫、副市长陈光国^⑬指出在新农村建设和整村推进的的扶贫工作中应大力宣传和推广“石柱模式”。新华社、《光明日报》、《重庆日报》等多家媒体在头版头条等显著位置对西南大学县校合作进行了大篇幅的专题报道,人民网、华龙网等多家网站刊登文章称赞“石柱模式”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探索”,称赞西南大学“一个专家带动了一个产业”,专家们“带着课题”跑田间、入农户,带动石柱人民走上了致富路。

（二）石柱的发展是最好证明

7年来,西南大学有关专家协助石柱县级有关部门和乡镇累计推广种植优质辣椒50多万亩,辣椒种植户30多万户,种植辣椒每亩比种粮食增收500多元,农民累计增收2.8亿元以上;累计种植优质蔬菜2.8万多亩,每亩增收600多元,累计增收1680多万元;优质粮油制种1200亩,农民增收200万元;推广复方中兽药防治兔病,解决了夏季仔兔高死亡率问题,农民增收约500万元;正在开展的黄连副产物开发和养蜂产业实现预计目标后,农民增收将达到1个多亿。2007年,西南大学协助石柱县农业局推广种植魔芋1.5万亩,总产4.1万吨,产值达6000多万元。石柱还以科技为支撑,探索出高效、生态、立

体蚕业模式,5年累计养蚕70050张,产茧2101.5吨,实现蚕茧销售收入3125万元。另外,西南大学还帮助石柱招商引资,截止2008年,通过县校合作引进5家企业,争取各类项目资金2887万元,培育了300多个种养殖大户,有力地推动了石柱农村经济的发展。县校合作7年来,石柱农村经济发展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农民人均纯收入连年增长。据不完全统计,在200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为20%左右。

启示:创新机制,实现双赢

有人说,石柱对于西南大学是一间巨大的“实验室”,而西南大学对于石柱则是栽下了一片“摇钱树”。就其启示有以下几点:(一)实现双赢是县校合作的基础。县校双方以建设农业科技综合示范基地为平台,以出人才、出成果、出效益、出经验为目标,实现产学研对接,县校互补共赢的合作正好满足了双方这种迫切的愿望,实现了优势互补,从而使县校合作变为现实。(二)成立了相应机构。学校设立了校地合作处、专家组,并在地方设立基地办事处,派专人到地方的县校合作办公室处理日常工作。(三)制定了合作规划。《县校合作规划纲要》明确了合作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主要内容、机构设置、保障措施,确保县校合作紧密、规范运行。(四)加强了合作管理。并把县校合作工作纳入双方年度工作目标,严格考核奖惩。(五)保障了经费投入。县校双方每年落实100万元资金作为建设石柱农业科技综合示范基地专项经费,专项用于农业科技研发、推广和成果转

^⑨ 十一五规划,2006年两会后提出,其关于农村扶贫的基本内容有加大扶贫开发力度,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素质,改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开辟增收途径,因地制宜地实行整村推进的扶贫开发方式。西南大学与石柱县合作的“十一五”实施规划(纲要)全名为《建设石柱农业科技综合示范基地“十一五”实施规划(纲要)》。

^⑩ 汪洋,中国科技大学工学硕士。2005.12—2006.01为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候选人,2006.01—2007.10为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2007.10—2007.11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2007年11月至今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

^⑪ 王鸿举,1997年6月在重庆市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第一届重庆市委副书记、重庆市副市长。2003年1月当选重庆市市长。2007年5月,在中共重庆市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市委副书记。2008年1月连任重庆市市长。2009年12月26日被任命为十一届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⑫ 黄奇帆,工商管理硕士,研究员,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党组书记,重庆行政学院院长(兼),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兼),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兼)。

^⑬ 陈光国,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

化。除此之外,还共同申报产业项目和科研课题,其经费全额投入农业科技综合示范基地建设。(六)健全了合作机制。包括产、学、研互动机制、成果转化机制、普及推广机制、科技下乡机制、人才聚集机制。产学研互动是县校合作的核心,成果转化是县校合作的重点,示范带动是县校合作普及推广科技的切入点,送科技下乡是县校合作的主要内容,发挥人才聚集优势是县校合作的保障。石柱模式充分展示和体现了学校对地方经济建设的贡献度及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经济社会职能的全面实现;彰显了西南大学弘扬“勤勉朴实、爱国爱民、建设新村、造福民众”的人格精神。

参考文献:

- [1]马世洲,李朝荣.高校服务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新探索——西南大学与重庆市石柱县合作探索解决“三农”问题[J].中国民族教育,2009(3).
- [2]范蕾蕾.“石柱模式”的有益探索[J].农家科技,2006(7).

后记:如今,“石柱模式”早已走出石柱。西南大学已和重庆市的忠县、巫山、荣昌及四川的遂宁等地签署了校地合作协议,与西部60个市、县建立了固

定的科技合作关系。据不完全统计,通过校地合作,学校近年来已在21个省区市的305个县市累计推广先进实用技术352项,转让技术151项,培训农民400多万人次,新增农业产值130余亿元,社会服务的“产业链”不断延伸。“顶岗实习支农”是西南大学彰显教育和农业办学特色开发出的“新产品”,也是校长王小佳主持的教育部本科教学质量工程项目“农学类专业‘顶岗实习支农’创业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的组成部分。2010年初,西南大学分别在农学、植保、园艺、农业资源与环境、动物科学和动物医学等6个专业设立“顶岗实习支农实验班”,按“校地合作模式”、“校企合作模式”、“校所合作模式”,分别在重庆、四川的8个企业创建了19个顶岗实习支农基地,首批派出了150余人,分片区开展顶岗实习支农。除“顶岗实习支农”外,还逐渐形成了“顶岗实习支教”(师范专业)、“顶岗实习支企”(工学专业)、“顶岗实习支社”(社会与管理专业)等系统的顶岗实习基层实践模式。比翼双飞,合作仍在继续。“石柱模式”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有理由相信,西南大学的校地合作将会迎来更辉煌的明天。

(责任编辑 李亚勃)





我的“大跃进”

□口述/王远伦^① 郭兰 整理编辑

编者按：1958至1960年，在我国历史上发生了“大跃进”运动，它是我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践中的一次失误。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议发出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向技术革命、文化革命进军”的号召，力图使中国在十五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在十年内超过英国、十五年内赶上美国，即所谓“超英赶美”。会后，全国各条战线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以下内容是王远伦老师亲身经历的“大跃进”，是他记忆中的历史。

我们在黑石坪办了钢铁厂^②

1958年西南农学院开始了“大跃进”运动，当时的操场还没有现在这么规范，每个系都在操场上挖个坑，拉起手风箱便开始大炼钢铁。重庆市北碚区区委分配了两个地方，一个是西师，分配在缙云山下的红苕沟建高炉，一个是西农，分在缙云山下的梁家山建高炉。三八社办公室的李业茂^③，也是学校办公室主任，在行政楼下碰见我^⑤，告诉我要大炼钢铁，今天就要上黑石坪。如果不去，团员开除团籍，党员开除党籍，国家工作人员要开除公职。



1958年西南农学院在黑石坪建炼铁厂^④

^① 王远伦，男，工程师。1947年考入原私立相辉学院文史系，毕业后留校参加西南农学院建校工作，此后在西南农学院基建处工作长达35年之久。负责并参加了学校新建校舍、人防工程、农场建设等工程，并于1956、1963、1986年组织制定了学校总体规划等。见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3-TX0408-042。

^② “大跃进”运动在建设上追求大规模，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全党全民“大办”、“特办”的口号，例如，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大办农业等。“大炼钢铁”是“大跃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在经济建设急于求成思想指导下发展起来的一个运动，其奋斗目标是全国完成1070万吨钢的任务。从1958年9月份起，炼钢指标层层分配下达，各级第一书记挂帅，采用“大兵团作战”、“各行各业支援”、“土洋结合”、“小土炉、小高炉遍地开花”等办法，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

^③ 李业茂，男，西南农学院办公室主任，其它不详。

^④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6。

^⑤ 正文中的第一人称“我”，系口述人王远伦。



同学们攀登高山寻找矿石^⑥

区里确定让我们学校(西南农学院)和梅花山小学在黑石坪合办钢铁厂,由宋怡宝^⑦当书记,我当厂长。梅花山的小学生也担矿,比大学生还厉害。几百人在黑石坪炼铁,没有任何房子。高地原来住的是农民,他们住的是一些土墙房子,后来房子都垮了,只剩下一些断墙残垣。我们就在地上铺些松桠,睡在上面,有些地方还很潮湿,我和宋怡宝睡在一个农民家的猪圈上面。那个时候政治压力大,教职工和学生都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几百人要吃饭睡觉,后勤保障是个很大的问题。炼钢铁首先必须修炉子,炉子修好了要挖煤,要担矿。煤矿由我们去挖,在2700尺的斜坡下面,学生很害怕。因为我从小爬煤矿,所以第一车煤就是我拉出来的,重约180斤。拉煤的小拖斗是用

竹子编的,由于物资匮乏,路板是由黄杨木改的,竹子的拖斗,就像拉船一样,一个钩挂在筐上,下面有四个车滚卡在路板上。人家看到西农的老师来了,欣喜若狂,以为西农有什么现代化工具,其实什么都没有,连电灯都没有,后来才找到矿灯戴在帽子上。

黑石坪的环境很恶劣,尤其是晚上,到处都是蛇虫鼠蚁。有了矿灯,学生才敢下煤洞挖煤矿,从洞口下去2700尺,根本不能伸直腰板,只能弯着腰走,否则就会撞到背脊,而且背拖着煤炭,也不能歇气,就像狗拉雪橇一样,很难受。当时米、肉的供应也只有天生桥才有,黑石坪完全没有。我们修的炼铁炉是0.9立方米的高炉,要炼铁肯定是要先修好高炉,不建高炉一切都是空谈。在旁边就是焙烧窑,而我们捡的是鸡窝矿^⑧,满山遍野捡,还把土化系的讲师何忠材^⑨调来,我们俩一道满山遍野找矿。找到鸡窝矿后,捶小,像大汤圆一样,然后用火焙烧,焙烧之后才能进炉炼。而炼钢最主要的是焦炭^⑩,焦炭靠分配,我也记不清我们当时是分了多少了。炉子修好了,又焙烧了一些矿,就开始手拉风箱炼钢。拉风箱的那个木棍有2米长,两人拉,一前一后。

我们炼出铁来啦

炼了几天后,炼出了一块白口铁^⑪,有8公斤多,领导很高兴。贾子群^⑫听说炼出铁了,就把铁拿上跑

^⑥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6。

^⑦ 宋怡宝,男,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至1949年先后参加了济南战役、淮海战役和渡边战役。1951年在川东党校学习并留校工作。1952年至1954年在西南局保卫科工作。1954年调入西南农学院工作,先后担任人事处副处长、总务处副处长、处长以及基建处处长等职,1983年7月离职休养。见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3-LX0703-001。

^⑧ 鸡窝矿,即零星分散、储量小、含铁量低的铁矿点。

^⑨ 何忠材(1918—1962),男,湖北荆门人。1939至1944年先后在湖北荆门市民众教育馆、县政府工作。1944考入四川大学农学院农业化学系,毕业后先后在联勤总部经理署、武昌县立人民教育馆等地工作。1951年调入西南农学院土壤农化系任教直至逝世。见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3-SW0702-012。

^⑩ 焦炭,是高温干馏的固体产物,主要成分是碳,用于高炉炼铁和铜、铅、锌、钛、锑、汞等有色金属的鼓风炉冶炼,主要起还原剂、发热剂和料柱骨架作用。

^⑪ 白口铁,生铁中的一种,因断面呈现白色而得名。

^⑫ 贾子群(1905—1995),男,四川南充人。1924年考入成都大学(四川大学前身)数学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随后在重庆、南充、江津、泸县、江安等地的中学以教师职业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川北行署撤销后,先后担任四川省教育厅副厅长、西南农学院教务长等职,1983年12月离休,享受国家副部长级待遇。见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3-SW1013-001。

去向市委报告。几百人在那里炼了不到一个月,就炼出了8公斤铁。

“大炼钢铁”的时候,学校全面停课。参加炼铁的女生只有少量,因为我们睡的是湿地,所以后来有



农经农机系同学参加“大炼钢铁”在黑石坪开采煤矿^⑬

些女生就从山上下来了,全国也没有多少个女矿工。

学校遍地开花,到处都是所谓的小炼铁炉。当时学校主要是在小高炉里炼铁,最缺的是焦炭,因为大高炉也需要,我们学校也分不上。到了最后,矿石还有一点,梅花山小学的学生非常积极,叫他们去找矿石,他们也找了一些。但是焦炭就成问题了,所以炼铁一开始,由于缺少焦炭,无法继续进行。煤是我们自己挖,每一天有几十个乃至一百个左右的学生去挖原煤,那个煤的质量还是很好的,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挖煤下坡要走2700公尺,必须弯着腰走,而上坡连气也不好歇。

我们学校的学生一共上山参加炼铁的有300多人,煤我们还是继续在挖,但是吃的东西却越来越紧张,凭票买的肉要在天生桥那里才能买到,只有这么一个供应点,其他的地方没有。解放后的米价是四个价格,最初是4分钱一斤,之后是7分钱一斤,再后

来是1角1分2,可能1958年的时候是7分钱一斤。那个时候的米大约是7分钱一斤,最后就是1角4分2一斤。从7分涨到1角1分2,由于我是宣传委员,就先通知我,所以我也比较先知道这个事情。

副食供应一律在天生桥,在天生桥买完后,再挑上山,我们劳动力比较多,很快便挑上山了。学校炼铁厂一直拖到国庆节后,再也拖不下去了,这个我非常清楚。国庆节的时候,附近的农民参与大炼钢铁,就参与到我们学校,大家都盼望着国庆节吃点好的。我在山上用泔水养了一头猪,有100多斤,国庆节的时候,也没有其他的供应,我就把猪杀了,大约有六七十斤肉。国庆节的时候就和山上的农民联欢,李世俊^⑭院长也上山来了。我们还去打了十多斤酒,现在也记不清当时是怎样买到酒的。师生员工加上附近的农民大约有400

多人。大炼钢铁的时候,第一天上山了100多人,随后又上山了100多人。但后来有一部分人又从山上调下来了。因为大炼钢铁的时候,到处都需要劳动力。联欢的时候,李世俊的大儿子也来了,李世俊的儿子是西南钢铁代表团的副团长,曾留学苏联。他来看了后,指导我们怎样烧矿,以及检查煤炭的质量。



“大炼钢铁”^⑮

^⑬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3。

^⑭ 李世俊(1901—1962),男,山西万荣人。1932年毕业于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农化系,随即投身于屯垦事业。1938年经刘少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留延安负责筹建陕甘宁边区模范农场。1941年,调任南泥湾垦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兼军委总农场场长,挑起了开发南泥湾的重担。1948年8月正式调任石家庄华北农业试验场场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世俊于1950年6月,调任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担任计划司司长,参与国家农业生产的领导工作。1957年10月被调往重庆任西南农学院第一任院长,1962年被任命为党委书记兼院长。见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3-SW0709-010。

^⑮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3。

我们都是捡的鸡窝矿,有些只含一点铁,那个时候鸡窝矿也已经捡的差不多了,也没有额外谁来供应煤矿。国庆节这一天,我们在山上联欢,李世俊号召大家鼓劲“超英赶美”,当时这个口号是一股热潮,但是现在看起来,一点都不实际不科学。后来调人的时候,把宋怡宝调下去了,又把石黑成^⑥调到山上做支部书记。大家都巴望着快点出铁,出了铁自然就高兴。

我去学习炼钢经验

9月份,李世俊在重庆市开钢铁会议,因为他是九级干部,副军级。当时重庆市属四川省管,只是一个地专级^⑦的市,但重庆市领导的个人级别很高。李世俊的个人级别很高,把他找去谈北碚区的钢铁生产。会上大家压的最厉害的是基业^⑧,领导也明白,不过是掀起一股热潮而已。二公司,北碚区的建筑企业在大渡口,就是北泉出口的对门,已经建了高炉,9月份的一天晚上要开炉,我们就要去学习经验,有人专门送信给我,信上写:“晚上几点钟^⑨在大渡口有船等你,你必须去学习经验。”我从黑石坪出发,走到嘉陵江畔,伸手不见五指,逢崖跳崖,逢坎跳坎。当时天空还下着小雨,衣服都打湿了,很怕耽误了,要是批判起来是受不了的。

我是1956年3月12日被批准入党,1957年经过反右斗争的考验,1958年又遇到“大炼钢铁”的考验,1959年11月28日才转正。自己心里很怕迟到,怕受批判,硬是咬紧牙关走过来。二公司原先是四公司的,那些经理、书记都是转业回来的,我都熟,几个工程技术人员是重大建筑系41年毕业的,我也熟。正在学习经验的时候,发生了火灾。高炉上面有个平台烧起来了,这个平台是木质的,用来上料,一

下子烧起来了,整个大渡口,热闹非凡。

学校炼铁炉撑到10月过后,北碚区就要求全部拆了,我们便从高地上下来了。当时大中小学都停课,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不敢违背。但最为惨重的是砍伐树木,合川农场原有1000多根柏树,几十公尺高,还有青枫树、麻柳等。结果大炼钢铁的时候,砍了几百根烧高炉炼钢铁。“大跃进”对单位来说是大浩劫,对农村更是。农村大伐树木,都砍那种大的乔木,砍了几个月之久,用来炼钢铁,完全是森林大浩劫。

农业也要“大跃进”

大炼钢铁只是“大跃进”的一个部分,除外,教育要“大跃进”,农业也要“大跃进”,但其实农业是“大跃进”了。当年四川的气候很好,红薯收成也很好。但是所有的劳动力都去参加炼钢铁了,一些庄稼和红薯都无人收。完全是又差粮食,又没有人去收粮食,根本没有劳动力在农村,大家都跑到山上去炼铁了,所以从农业上来说是“大跃进”。



植保系师生夺得蔬菜大丰收^⑩

^⑥ 石黑成,男,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至1955年先后在晋冀鲁豫军区、山西太原十八兵团后勤部、西南实验工农速成中学、西南师范学院地理系工作。1955年5月调入西南农学院,先后担任膳食科副科长、土化系党总支副书记等职,1983年7月离休。见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3-LX0504-002。

^⑦ 地专级是指干部的行政级别,地专级、厅局级、司局级在级别上是相同的,只是称呼不同。地专级主要用于地级市地区的干部;厅局级主要用于省直机关的厅局干部;司局级则用于国家机关的司局干部。

^⑧ 基业,即产业。

^⑨ 口述者记不清具体时间。

^⑩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3。

当时农业生产“打擂”^①，“打擂”的几个数字，蔬菜亩产万斤，水稻亩产十万斤。我们周围还有个“打擂”的就是“牛金猪”。“牛金猪”是全国劳动模范、重庆市劳动模范张丽荣^②提出来的，她说她培育出了杂交的“牛金猪”，“牛金猪”能长500斤以上，牛金猪要出栏的时候，在沙坪坝还贴了广告，猪儿长得是又肥又壮，而且这个牛金猪还被领导公然接受。其实根本没有所谓的“牛金猪”。我们学校的人也宣传牛金猪产量高。

学校一些教师出去参观学习回来，就打擂水稻亩产十万斤。于是学校把水稻移栽到现在斑竹村对面的那个一亩田上，这么多水稻移栽在一亩田里一点都不通风，李世俊院长便让我在那里蹲守了两天两夜，用鼓风机吹水稻。李世俊让我们白天黑夜都要守在那里，用鼓风机向水田吹风，我只有守在那里，共坚守了两天两夜。其实李世俊也知道那是不科学的，但他作为领导不能泄气。对于水稻亩产十万斤，学校的几个老教师一开始就反对，他们设计了一下，要栽多少株，每一株有多少粒，这样一算便知道到底能产多少斤。秧子大合并就是这样来的，根据计算的株数来栽。虽然明知道不对，但是在那种政治压力下，学校还是支持。

后来又是蔬菜“大跃进”，亩产万斤，这还有点道理，当时种的是冬瓜，大的有一百斤重，搭两层架子还是可以亩产万斤的，当时还进行了一些设计，包括施多少肥等，感觉有些好笑。我们学校亩产十万斤的水稻在全市传遍，都知道西南农学院要亩产十万斤。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只要有人有一句话反对，就要向上汇报，被划为中间派。如果在会上不赞成，那就成了反对派了。

在全国“大跃进”的年代，那些跟风的人搞政治的升了官，搞技术的升了职，稍微有些反对的就成了“秋后算账派”^③。在那个年代，没有谁能够真正的将马克思主义结合实际，学校有一个地专级干部，少数领导是副部级干部，没有谁敢说不干。“大跃进”、“大

办钢铁”、“大办农业”，现在回想起来，只有一笑置之。^④

后记：编辑这篇文章已是夏末初秋，白日里天气却仍热得人直想泡池子。就在这样的时节里，我们忙忙碌碌地开始编辑整理这篇文章。文字不多，但是我们隐约觉得似乎整篇文章的思维太过跳跃了，甚至连我们这样的青年人都跟不上口述者王远伦先生的思维。一方面我们认为应该把这些故事理顺一点，让故事更明晰。而另一方面我们又觉得这是王先生的思维，这是他记忆中的那些岁月，我们无法去接近他故事中的某种东西，没有拿起笔来划掉他任何一个短短的句子的勇气，因为每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就想到我们正在拿着一把锋利的雕刻刀，把记忆一片片地切割下来，把这记忆雕刻成任何我们想要的形状。

我记得朋友们一段关于历史的清谈，他们曾如是说：当我们面对一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不说那是最真实的历史，我们只说那是历史；当我们面对一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不说那是社会的历史，我们只说那是一个人记忆中的历史；当我们面对一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不说历史没有温暖和感情，我们只说它就是这样素面朝天的、纤毫不染。历史就是历史，历史只是历史。

初秋时节，层林尽染，踏过枯荣的荒草，我时时想起一些无关宏旨的事来，有的时候不自觉地笑出声来。如果历史也同我一样，在初秋的时节，走过连天的荒草，是不是也会想起一些事来不自觉地笑出声来呢？

(责任编辑 朱林)

^① 1958年，农业战线上出现了“打擂比武”，提出了许多不切合实践的产量指标和以“浮夸风”为主要特征的口号。

^② 张丽荣，女，重庆北碚人。“大跃进”时期全国劳动模范，重庆市劳动模范。

^③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继续批判反冒进，把怀疑、反对总路线和“大跃进”的干部斥之为“观潮派”和“秋后算账派”。

^④ 1960年冬，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大跃进”运动停止。



编者按:每年11月4日是侯光炯^①院士的逝世纪念日,同时也是“侯光炯奖学金”的颁奖时间。侯光炯基金的建立为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学生带来了物质和精神上的激励。而这项基金的建立离不开一个人的大力协助。他就是侯光炯基金管理委员会的名誉会长之一谢世杰。1934年9月谢世杰生于四川梁平(现重庆梁平),1958年至1959年在西南农学院土壤肥料专修科学习,曾任雅安地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四川省政府副省长、省委副书记、省委书记等职务。多年以来,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时时关心着母校的发展,不遗余力地为母校操劳、奔波。

他眷恋着这方热土

□文/韦雪贞

每年11月4日是西南大学“侯光炯奖学金”^②的颁奖时间。这项基金用于鼓励和奖励那些有志于农业科学事业,德才兼备、学习成绩优异以及在社会生产实践中做出优异成绩的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学生,使其树立勤奋求实、敢于创新的精神,为农业科技的发展和农业科技转化做出贡献。这项基金的资金筹备和完善,离不开相关部门和工作人员的支持帮助,其中有一个人的不懈努力不得不提。他就是侯光炯基金管理委员会名誉会长之一谢世杰。

1934年9月谢世杰生于四川梁平(现重庆梁平),1959年于西南农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土壤肥料专修科毕业。他曾任雅安地委书记、四



2000年11月1日四川省人大主任谢世杰同志在西南农业大学(西南大学前身之一)建校50周年庆祝大会上讲话^③。

^① 侯光炯(1905—1996),上海市金山县人,1952年至逝世前历任西南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主任、名誉校长。我国及世界著名土壤科学家、国家一级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土壤学会名誉理事,曾任四川省科协副主席、重庆科协主席,被选为一至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从事土壤科学研究60多年,是我国土壤科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见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3-SW-0901-002。

^② “侯光炯奖励基金”是根据侯光炯先生生前的意愿,并在各界提议和大力倡导下所建立,目的是为进一步弘扬先生的学术思想,继承先生的未完事业。每年11月4日侯光炯逝世纪念日颁奖。

^③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2000-SX12-5。



川省委常委、四川省政府副省长、省委副书记、省委书记等职务,以及中共第十四届和十五届中央委员、连续三届被推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他现在虽年事已高,但仍为四川的建设殚精竭虑,为母校的发展操劳奔波。对人民,他是一位好公仆;对西南大学,他又是一位好学子,好校友。

谢世杰于1958年来到了西南农学院土壤肥料专修学科,在这里他仅就读了短短一年,但是他却深深的眷恋着这片美丽的土地,一直将它放在心中的重要位置。纵然离校多年,当母校面临难以解决的问题时,他毅然伸出了援助之手,出资出力,帮母校走出了困境。而“侯光炯基金”的建立就是其中一件。

侯光炯院士于1990年和1995年给资源环境学院领导的信件和与女婿高惠民的谈话中,多次提到:“要设立奖金(奖励基金),鼓励和奖励那些坚持自然免耕理论与实践方面的研究人员。这些人应是在科研工作上有道德,勤奋好学,刻苦钻研,热爱祖国,热爱土壤事业,并具有自然免耕理论和实践知识的科技人员,以土壤热力学为理论指导思想,勇于探索,

不断创新,具有自然免耕学的特色,让自然免耕理论发扬光大。”同时,他也表明愿将本人多年积蓄(共计12万余元人民币)全部用于基金设立。

1996年11月侯光炯院士去逝后,四川省委、省政府和重庆市委、市府大力支持建立侯光炯奖励基金,弘扬侯光炯精神,鼓励和奖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学生,为农业科技的发展和农业科技转化做出贡献。资源环境学院师生及广大校友在原西南农业大学50周年校庆(2000年)之际,向广大校友和关心此基金的同行发出了“大力捐助和支持发展侯光炯奖励基金”的倡议,倡议得到学校党政领导的大力支持。以此激励后来者学习“学界泰斗,一代宗师”——侯光炯院士“热爱科学、尊重科学、献身科学,艰苦奋斗、实事求是、忘我工作”的科学研究风范,学习他“淡薄名利、鞠躬尽瘁、甘为人梯”的高尚风格,树立勤奋求实、敢于创新的精神。

“侯光炯基金”受到广大师生干部的大力支持。此外学校培养了许多值得骄傲的儿女,校友遍及祖国各地。许多热心的校友也怀着满腔热忱为母校的



1990年谢世杰(左三)回校,与侯光炯(左二)、党委副书记李国诚(右一)、蒋兴鼎(右三)合影留念^④

^④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22。

发展出资出力。而谢世杰就是这些校友的带头人之一。

1996年7月,向仲怀^⑤院士刚刚就任西南农业大学校长。此时的西南农业大学,由于近年国家财力有限,办学经费紧张,学校的发展建设距社会和时代的要求还相差甚远。与北碚湖光山色、莺飞蝶舞,焕发着生机勃勃的景色相比,西南农业大学的现况可以用“萧条”一词来形容。财务处长给出的学校的家底:除了工资和日常开支,校长可以动用的全部家当只有97万元。行政处长也报告:校内被占房舍和违章建筑难以清理。科研处同样报告说科研经费相当紧张,许多课题难以开展。再加上侯光炯基金的建立也正急需大笔经费,一道道难题摆在向仲怀院士眼前,每一个难题都需要马上解决,而每一个问题的解决都需要钱,但是学校的经费却迟迟拨不下来。当时重庆要设直辖市,从四川独立出来,而学校80%的科研课题都在四川,而不是在重庆。如果经费一断供,困难就更大了。

临危受命的向仲怀院士想到了这位仅在学校就读一年的校友——谢世杰。于是在1996年利用休息时间,他与学校党委戴思锐书记一道踏上了前往成都的旅程,亲自去闽省委找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谢世杰,落实筹集侯光炯奖励基金款项。到了成都,他直接就要见谢书记。没有去办公厅常规登记、排队,而是直接就以院士、人大代表和校长的几重身份找去了。谢世杰很尊重眼前的这位院士,听了汇报,他马上明确表态:“请你放心,四川和重庆分立以后,原有科研课题不变,经费不变,招生不变!你没顾虑了吧?”

“太好了!”向仲怀院士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但是他表示了感谢,还不想走。因为还有一件



1990年四川省常务副省长谢世杰于西南农业大学题词^⑥

同样重要的事情萦绕在他心头。

谢世杰看着他:“你还有什么问题吗?”向仲怀院士又进一步提出来,学校里的土壤专家侯光炯老先生,是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因年事已高,长期住在乡下,一直不回来。他希望能把侯光炯先生请回来,让他当名誉校长。谢世杰马上说:“好啊,我支持!”

不久,谢世杰带了20多个厅局级干部来学校。一见面,就说,“我就是要带着他们来,给你带一点钱来。”当场,就给了学校30万元。1996年,钱很值钱,这笔钱,帮了很大忙。缺欠老专家、老教授们的费用,最高一万元,一般几千元,一下子把积压多年的一些老专家、老教授的困难补助和医疗费等问题都解决了。

校内被占房舍和违章建筑的问题解决了,学校的科研课题可以开展了,亏欠教职工的资金也可以到位了。谢世杰送来的钱帮学校走出困境,使其重新步上正常的运行轨道。

谢世杰不仅为侯光炯基金的筹集献计献策,并直接组织经费,为了扩大基金数目,使更多的人可以加入到科研建设的队伍中来。他先是向四川省政府

^⑤ 向仲怀,1954年考入西南农学院,1958年毕业。1996年7月至2003年1月任西南农业大学校长。先后任国务院第四、五届学位委员会委员,畜牧学科评审组召集人,中国蚕学会理事长,重庆市科协主席、名誉主席,重庆市学位委员会副主任,中共重庆市委委员,十五大代表,第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等。

^⑥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1990-SX12-57。



申请捐助，又向宜宾行署和重庆市政府申请捐助，为基金建立筹得大笔资金。后来，他听说重庆市的捐助款因故未能及时到账，他又前后奔波，积极联系重庆的企业商家，终于将此事落实，使侯光炯基金得以进一步巩固。

百忙之中谢世杰时时记挂着母校的发展，为其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除了为学校发展出谋划策，筹备资金，他还向学校的资源环境学院捐赠了松下原装摄影机一台，并对学院的发展提出建议和希望。此外，他向学校赠送了他所出的书籍，其中包括《求实创新——加快四川发展》、《勤奋拼搏——努力开拓前进》、《与时俱进——建设政治文明》系列书籍，这些书收集了他工作期间发表的作品和讲话，凝聚着他的心血和智慧，是他多年工作经验的结晶，为后来者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用。还有一本《党恩暖人生》的影集。这本影集挑选了近5000张关于谢世杰的照片，有中央领导视察时与领



1990年1月8日，四川省常务副省长谢世杰(右四)参观西南农业大学中心实验室^⑦

导的合照，有下乡考察时与乡民们的留影，还有与家人共享天伦的温馨瞬间。这些点点滴滴，无不透露着谢世杰乐观、和善、风趣、朴实的人格魅力。

他深深眷恋着这方热土。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这里的教师学子，已装进谢世杰的心中。所以，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多么繁忙，他总惦记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师生，关注着母校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刘功业.丝路驼铃[J].十月,2008(05).
- [2]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光炯行动[EB/OL].侯光炯奖励基金简介.http://zihuan.swu.edu.cn/view.php?ID=368,2010-05-17.

后记：本文成文过程中，得到资源环境学院魏昭林老师的热心帮助，于此特表谢意。

(责任编辑 郭兰)



2000年11月1日四川省人大主任谢世杰(前排左二)、西南农业大学校长向仲怀(前排右一)等人参加侯光炯院士塑像揭幕仪式^⑧

^⑦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1990-SX12-56。

^⑧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2000-SX12-5。

1960年代的共青团花园^⑨

班六十多名学生来到我们学校实习，进行工程测量和第一次规划设计工作。我们给这些学生每人每天五角钱的生活补助费，为此学校补助了几千元钱，并提供了住宿，他们自然很高兴，测量完成后进行画图设计。测量工作结束后，王德云告诉我，学校应该有一个总体的校园规划。于是，我向学校交了一份四十多页的书面报告。第二次测量规划工作由重庆市设计院负责，重庆市设计院属重庆市政府管，任务重、事情多，但还是帮我们规划设计了。最后我们又邀请王德云负责花园的第三次规划设计工作。

实际上，到1956年只形成了花园的基本框架图。按照框架图，花园的设计总面积约有两万平方米。1956年开始栽香樟树，香樟树是由园艺系的花

工张松林^⑩负责栽种的，栽培指导工作则由西南农学院园艺系的花卉教授马西岑^⑪负责，他来检查树栽的对不对。当时想的是香樟可以长成高大的乔木。之后共青团花园的茶花是陆续栽种的，每次买一点栽一点。茶花的品种到我退休的时候，是重庆市最齐全的。茶花、罗汉松都是在北碚静观镇^⑫买的，专门从一些老花圃买回来。学校还鼓励师生参加劳动，修建共青团花园。总的来说，今天的共青团花园是几十年慢慢形成的结果。

共青团花园前面的荷花池，原本是一个水塘，只是比较小，也有水。为了避免污染水池，我们当时就把自然水和污水分开了，怕污水流进池塘。建共青团花园的时候，就利用原先这个水塘，只是后来扩建

1980年代花园西边的全景图^⑩
(图中白色建筑即为现西南大学第二行政楼)

^⑩ 张松林，河南人。西南农学院的一名花工，后因阶级斗争返回河南。后来张松林几次给西南农学院的领导写信，请求返回西南农学院。

^⑪ 马西岑(1899—1997)，男，安徽宿县人，著名园林植物专家，中国民主同盟盟员。1925年毕业于日本千叶高等园艺学校，曾先后在安徽第二、三、四、五农业学校、浙江金华实验农业学校，成都高级农业学校等校任教。1952年调入西南农学院园林茶叶教研组工作，曾主持完成“野生观赏植物的驯化”等研究工作。1977年6月退休。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见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3-SW0301-084。

^⑫ 静观镇，因境内有一古庙“静观寺”而得名，素有“花卉之乡”的美称，是全国花木盆景艺术五大流派之一——川派之川东花卉艺术的发祥地。

^⑨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1。

^⑩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7。

了,并修了栏杆。后来主管后勤的王敬璠^①副院长在任时又主持修建了荷花池,并在周围栽上垂柳、修竹等。就这样,花园基本建成。当时修花园的资金比较困难,有一点钱就修一部分,有一点钱就买一些树、花栽种。其实我头脑里是很明确的,以共青团花园为中心,从校门到操场,从学生宿舍到斑竹村^②路口,容纳一万多学生活动是完全可以的,这在当时是很不简单的,这也是我们到省城考察了很多大学得到的启发。当时学校很多系都想在综合楼^③下面,也就是现在共青团花园的所在地建房子,我们一律不同意。因为只要把这块地占了,修成房屋,就不成样了。学校就没有一个中心,整个学校建设就没有一个中心。我们当时建共青团花园的时候就是以此为中心,不论是到校门、到学生宿舍、到操场、还是到斑竹村都是一个中心点。从共青团花园出发,有几条出路,到学校招待所是一条出路、到斑竹村是一条、到学生宿舍是一条,到校门口又是一条。这几条出路以花园为中心又能够相互循环。这样一来,从花园出发,不论是到校门、到学生宿舍,还是到操场、到斑竹村都很方便。



2000年西南农业大学校庆五十周年之际,四川省农业厅全体校友将赠送给母校的铜牛雕塑安置在他们曾经流连忘返的共青团花园^④

建共青团花园的时候,我几乎天天守在这里。现在我也常常走进共青团花园散步、看花,往日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责任编辑 李亚勍 朱林)



现在的共青团花园全景图

^① 王敬璠(1921—1992),男,山东桓台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40年起进入邮电战线工作,先后担任山东高苑县邮电局局长、北京邮电学校副校长、重庆邮电学校党委副书记、重庆市广播事业局党组副书记等职。1977年转入农业教育战线,先后担任西南农学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等职,1984年5月离职休养。见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3-SW0401-021。

^② 斑竹村,位于重庆市北碚区西南大学六号门斜对面,是西南大学教职工宿舍之一。

^③ 综合楼,即现在的西南大学第二行政楼。

^④ 西南农大报·校庆专刊,第266期,2000年11月25日。

六角塔的来历

文/郭兰 整理

在上一期的《校史求证》栏目中，我们向广大读者征询关于1960年拍摄的一张老照片里，光炯楼（原中国科学院重庆土壤研究室）门前左侧不远处修建的白色六角形柱子建于何时，为何而建。据时任西南农学院宣传部部长的唐蜀梁^①老师回忆，这个白色的六角形柱子其实是一座灯塔，用木料临时搭建而成，建于1958至1959年期间。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会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

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当时那个年代，总路线是照耀各项工作的灯塔，我们学校为了学习贯彻总路线，便修了这座灯塔以达到宣传总路线的目的。在灯塔的三面柱子上分别标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三条标语。后来由于搭建灯塔的木料坏了就拆了，但至于拆除的具体时间也记不清了。



1960年春节宋恩瀚^②和他的女儿宋家兰在光炯楼（原中科院重庆土壤研究室）门前的留影

^① 唐蜀梁，男，1953年1月调入西南农学院，先后任党委委员、宣传部部长、教务处处长等职，1984年9月离休。见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3-LX1002-002。

^② 宋恩瀚，男，曾用名宋恩汗，革命军人。1949年6月到1949年12月，在南京第二野战军政大学学习，1956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土壤系，毕业后分到中科院重庆土壤研究室工作，1980年5月转到西南农学院土化系任教。见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3-LX0703-002。



当我们想起年轻的时光

□文/吕进^①

编者按：初秋的风，弹唱着重生的咏叹；奔涌的江水，激荡着前行的力量。看今天，金秋八月累累硕果时，一批莘莘学子亮翼高飞，即将踏入大学校门，开启人生又一段美好旅程；望昨天，大学生活中有太多东西可珍藏、怀念与感悟。今天，你和我正以不同方式谱写着青春的华章；明天，它又注定成为峥嵘岁月中的过往。遡洄从之，道阻且长。遡游从之，宛在水中央。每个时代都有属于每个时代的大学生活。本期《葭葭之声》选登了诗人吕进的《当我们想起年轻的时光》，让我们在饱含笑语欢颜的诗人笔下，看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活又是怎样。

我们这一代大学生当年几乎没有不爱唱苏联歌曲的。广为流传的《列宁山》^②中有这样一句：“当我们想起年轻的时光，当年的歌声又再荡漾……”。于今，昔日的同学都开始步入老年。一旦相见，往往“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相比，我们的年轻时光虽说不无苦涩与遗憾，但是，青春的歌声终究是美好的：人生不回头，回头情太多。



诗人吕进

^① 吕进，男，教授。1963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留校任教，1987年被评为教授，1993年荣获世界诗歌研究会授予的第七届诗歌“黄金王冠”。博士生导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重庆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

^② 《列宁山》，1948年苏联诗人、词作家叶·多尔玛托夫斯基和数次获得斯大林文艺奖金的作曲家尤·米留金共同创作了歌曲《列宁山》。列宁山是莫斯科市区西南部的一座山丘，在山顶上可以俯瞰莫斯科全城，后来，1953年在这座山上建起了著名的莫斯科大学，它的尖塔形的主楼就矗立在列宁山之颠，塔尖高340米，为苏联建筑高度之最……这里是著名大学城、使馆区和大型文化设施的所在地，充满着浓厚的文化气息。这首于第二年获得斯大林文艺奖金二等奖的《列宁山》，因为当时苏联的影响力，迅速风靡了社会主义阵营。其歌词大致如下：亲爱的朋友，我们都爱列宁山，让我们迎接黎明的曙光。从高高的山上，我们瞭望四方，莫斯科的风光多么明朗。工厂的烟囱，高高插入云霄，克里姆林宫上曙光照耀。全世界的希望，俄罗斯的心脏，我们的首都，啊，莫斯科！当我们登上列宁山的高峰，我们的胸怀多么舒畅。伟大的城市出现在我们眼前，实现了人民美好理想。远处的太阳闪烁着金光，嫩绿的树叶轻轻歌唱。全世界的希望，俄罗斯的心脏，我们的首都，啊，莫斯科！列宁山啊，今天你更加辉煌，看高楼大厦排列成行。它们装饰着我们伟大的城市，大学生成群涌到这座山上。当我们想起年轻的时光，当年的歌声又在荡漾。全世界的希望，俄罗斯的心脏，我们的首都，啊，莫斯科！

未进学校,先找校长

1958年秋,来自成都七中^③的一群新生结伴到重庆。这群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无一例外地都没有出过远门。对他们而言,重庆也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小圆点而已。我们是过分性急的报到者,当时西师^④的迎新工作还没有开始。在重庆火车站东问西问,才得知还得乘车由重庆到北碚^⑤。扛着行李箱,提着行李包,一路爬坡上坎,汗流浹背地到了牛角沱车站(好怪的名字),十几个从川西平原走出来的中学毕业生,首次领略到了山城的“滋味”。不过,大家没有太在意,以为再坐一会儿车就可以结束平生第一次长途跋涉。

上车时人很挤。一个脸晒成古铜色的瘦瘦的老太婆,按重庆的规矩,手执一根长长的“响杆”,不断地敲打着涌上车的旅客的头,维持着上车秩序。四面通风的公交车摇呀晃呀,走了很久,还在不停地往大山里钻呀钻(难道西师在荒无人烟的蛮夷之地?)。我忍不住问年轻的女司机:“同志,北碚还没有到吗?”历来小姐脾气大,大姐脾气小,回答是硬梆梆的重庆口音:“忙啥子^⑥?到了会喊你!”

到达北碚汽车站已是下午。又累又饿,忙去问路。一位老太婆遥指远方(使人想起:“牧童遥指杏花村”):“一点儿都不远咯,那不就是西师!”大家顺着她的手望去,倒吸了一口冷气,天哪,西师还在前方,更要命的是学校居然在山上。有一句关于山区的俗语:“看到屋,走得哭。”几个女同学首先“喊黄^⑦”了,一屁股坐在箱子上,再也不愿动弹了。我也把出发前妈妈特地为我买的竹箱从肩上放下来,喘着气。汽车



1958年,外语系的同学们积绿肥^⑧

站里熙熙攘攘,我们占据了一个角落,都不想说话。休息了一会儿,有同学想出一个主意:“打电话找西师院长!”一群人又活跃起来。所幸,站上有电话,当年车站的公用电话是免费的。先查询到西师总机的号码,便拨通电话:

“西师吗?”

“找哪里?”

“找院长。”

“什么事?”待了一会儿,电话那一端变了一个男声。(看来,总机把电话接到了院办)。

“找院长。”

“找哪个院长?”

“就找院长。”

“你是哪里的呀?”

于是自我介绍:我们是新生,我们提前从成都来了,我们坐了一夜的火车,我们坐了半天的汽车,我

^③ 成都七中,四川省一所著名的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是中国4所“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样板学校”之一。

^④ 西师,西师是原“西南师范学院”和后来的“西南师范大学”的简称,2005年“西南师范大学”与“西南农业大学”合并,更名为“西南大学”。

^⑤ 北碚,北碚区位于重庆市区西北郊的缙云山下,嘉陵江畔,是重庆的风景旅游区和智力型清洁工业基地。本世纪20年代末,由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先生开拓,抗战时期为陪都重庆迁建区,被誉为“陪都的陪都”。是重庆的历史文化名城,重庆都市圈的重要组成部分,1997年被命名为国家级社会发展综合实验区和重庆市第一个山水园林城区,西南大学校址于此。

^⑥ 啥子,四川方言,意为“什么”。

^⑦ 喊黄,四川方言,有叫苦、抱怨、玩不转、搞不掂等多层意思。

^⑧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1-1958-SX122-3。

们……总之,我们很累,请院长来帮一下忙。传来带笑的声音:“你们在车站等着吧,不要乱走。”

不一会儿,来了一个身穿旧军装、戴眼镜的高个儿(院长真朴素)。怎么就他一个人呢?正在纳闷时,他以熟练的军人腔调发出口令:“大家立正!”然后指着我:“以这个高个子为基准,向右看齐!箱子扛上肩!齐步走!”大家老老实实在地排成队列,跟在后面迈步。好不容易捱到了西师院墙下,又得爬几十个梯坎,有人开始埋怨了。院长鼓劲说,这是最后一段路,上去就是校园,加油。带到教务处后,院长问,你们当中有外语系^⑨的吗?我和另一个同学举起手。他说,那我们一路走。在去外语系的途中才知道,哪里是什么院长,他是外语系的高年级同学。因为是调干生,所以年龄大一些。“成都娃娃就是娇气!你们以为院长有时间来给你们扛行李呀,那么容易见呀!”他用不无幽默的目光扫了我们一眼,哈哈大笑起来。

创卫咏叹调

那个时代,大学生在创卫上的时间不算少。做清洁本无可厚非,但有点像世界足球劲旅中的巴西队,表演性比较强。最滑稽的是除草。不知为什么,当年会把青草“定性”为创卫的“敌人”,非拔尽而后快。好像没有绿色的校园最卫生,如同《红楼梦》所写:“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但是,从大一到大四,忙了



1958年中文系同学在张贴刚写出来的群众报^⑩

四年,青草景况依然,正应着了白居易那联名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青草永远拔不完,创卫也就没有尽头。

对男生而言,更“可怕”的是检查寝室卫生。男生一般在这方面都是马大哈,平时丢三落四,一到卫生检查的时候,总是顾得东来顾不了西,在“评比”中,男生寝室就老是“西望长安不见家(佳)”。一次,我们寝室痛下“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搞清洁。检查组一进门,我们就作谦虚状:“欢迎多多提意见!”“检查官们”东摸摸,西看看,我们用得意的眼光瞧着他们。谁知,情况直转急下,我们脸上的得意顷刻之间荡然无存——一位“检察官”将电灯的拉线开关一拉,然后指着闪亮的灯泡说:“这上面有灰尘呀!”我们只好认输,当然,也没有见谁去“成仁”。女生们却从来稳操胜券。一次,我们检查女生寝室,哇,不但窗明几净,而且还在地板上洒了香水。被香水熏得晕头转向的我们,实在挑不出任何毛病,只好打满分。

险象环生的是突击检查,事先一点影儿都没有,说来就来,真叫人猝不及防。一天下午,我们正在寝室里上自习,突报学校检查组已在路上,似乎正奔我们寝室这个方向走来。放下书本,紧急动作。原来的基础还过得去,几分钟的光景,寝室就进入“临战状态”。然后,一大堆没有洗的脏衣服臭袜子什么的,怎么办?洗,是绝对来不及了。急中生智,一位同学说,快用水泡在各人的脸盆里。这主意颇有水平。说时迟,那时快,检查组到了,我们笑眯眯地恭候。“脸盆里是——?”“衣服。换洗的衣服。”这个回答居然得到的是赞许——这些男生真爱卫生哩!

世界一个样

评比层出不穷。几乎要不了几天,各个系的公告栏就会贴出一张红色喜报。流行的口号是“比、学、赶、帮、超”。其实,人是丰富的、有个性的,人和人很不好比。人的一生主要是和自己

^⑨ 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现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前身之一。

^⑩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1-1958-SX122-1。



比,向前方看,而不要左看右看。评比发展到极致,就是当年的“一个样”运动。准确说法是:“全党一条心、一股劲、一个样,为实现大跃进而奋斗。”这是四川省党代会 1960 年提出的口号。撇开“大跃进”^①不说,前两个“一”还说得过去,“一个样”就离谱了。列宁说的不错:真理向前跨一步就成了谬误。可以运用榜样的力量,但要求“一个样”,就远离了辩证法:同一只手的五个手指是一个样吗?同一个母鸡下的蛋是一个样吗?同一棵树的叶子也并非一个样。一切“一个样”,不仅不现实,而且这世界多乏味!

各个层次、各个角度都有一个样的“样板”。我从小学时代就有记日记的习惯,手里凑巧有一份夹在日记本里的当年外语系团总支《关于开展“一个样”运动的决议》。且不论该一个样还是不该一个样,从这个决议还是看出蕴涵其间的当年的青年人的生存状态和青春活力。

外语系助教团支部的样板只有一个,90 年代担任过学校科研处处长的陈贤义^②,他“以毛主席思想为纲,千方百计提高教学质量”。学生样板就有好几个:郭奕珊、黄雪琴、潘明远、罗信群、牟泽森、张兴林、余邦辅、章伟明。现为四川省副省长的徐世群^③,和我同年级,但不同专业。我们 1958 年一起入学,又一起在 1960 年读二年级时提前毕业,再一起于 1961 年重回学生班读书,最后在 1963 年一起毕业。他为人直率,重友情,有魄力,能吃苦。有一次在成都开会时,徐世群突然说:“吕进,我们俩当年当书记的那阵……”,语焉不详。在场的省教委的人有点儿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我当年当过什么书记。其实徐世群是回忆学生时代。作为各自班上的团支部书记,我们有一些共同的记忆。《决议》对他是这样表



1960 年苏联青年代表团来西南师范学院访问^④

述的:“高举毛主席思想红旗,自觉革命,积极忘我地劳动,要像徐世群同学一样。他这种政治挂帅,自觉革命,劳动中干劲冲天,不计报酬,不计时间,以身作则,团结全班出色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当年的样板也有我一个:“学习刻苦钻研,工作巧取时间,要像吕进同学一个样。他工作不讲价钱,苦思勤干,巧取时间,奋发学习,成绩优秀,奔向红专。”如今的大遗憾是,当时的头脑发热,“时间”还“取”得不够“巧”,要不,现在的外语水平应当更理想一些吧。对历史强加给我们这一代的苦涩和遗憾,我们要有历史性的思考。

印章难题

西师从来就有一方诗的天空,这是什么道理,我现在还没有想明白。一代一代的学生诗人挺多。各个

^① “大跃进”运动,指 1958 年至 1960 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左”路线的运动,是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不断地错误批判 1956 年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是“左”倾冒进的产物。

^② 陈贤义,男,1960 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留校工作,1988 年调西南师范大学(现西南大学)科研处,1994 年被评聘为教授。全国高校社科学科研究会理事,俄罗斯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炭基金属实验室主任,欧洲科学委员会成员。长期从事于俄语专业课教学及科研工作。见《西南师范学院教授名录》(《西南师范学院教授名录》编写组编,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9)第 163 页。

^③ 徐世群,男,1958 年至 1963 年在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英文专业学习。1985 年至 1988 年任四川省委常委、省外办主任。1993.04—2001.02 任四川省副省长。2001 年 2 月任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中共十二、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七届省委委员,省十届人大代表。见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网站校友风采专栏。

^④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1-1960-SX122-3。

系的墙报、黑板报总有不少诗歌。上一年级有一位被错划为右派^⑤的同学,劳动一年后,安排到下一个年级的我们班读书。他到班上后,给团支部写的思想汇报,居然是一首长诗,使我这个团支部书记从内心对他刮目相看。我本来就醉心于诗,从小就开始在报刊涂鸦,到了这块诗的沃土,我的诗自然也就生产得多。到西师后的第一首诗是写大校门的毛泽东塑像的。那个时候,这样的塑像很少见,人们对领袖人物又十分崇拜。我一进校门,仰望塑像,兴奋不已,激动不已,诗句如潮水一样涌入胸怀:

敬礼啊,你真理的形象
一落笔,便是一篇豪放的诗章
北国群山的飞雪
万顷银波的长江
一抬手,挥去蒋家王朝
一微笑,召来满目春光
广阔的前额能装下四海
一句话,能道破世界的风向
凡是朝向你的,身上都披满阳光
凡是跟随你的,都拥有青春的力量
……

所谓“风向”,指毛泽东当年那句引自《红楼梦》的名言:“东风压倒西风。”校报在办公大楼前设有投稿箱。我将诗稿塞进去后不久,就收到了编辑部的样报和稿费单——金额:一元。“凭单到财务科领取”。问到地点后便去财务科。

柜台后面的女工作人员不知为什么穿旗袍,在大跃进时代可算勇士了。她接过稿费单后说:“盖你的章!”我的天!十八年的人生旅途中我还从来没有和盖章发生过联系哩,此时就像阿Q第一次握笔画圆圈那样惶恐:“老师,我没有私章。”

“那不能领!”

“老师,那是我的学生证。我可以签名吗?”

“不行!”

“老师,怎么办呢?”

“盖章!”

无计可施,我退出财务科,上街去刻章。又遇麻烦:刻章,要派出所或单位的证明。

“章都是随便刻的吗?拿证明来。我哪个晓得^⑥你不是坏人呢。”街边一个小摊后面坐着的那个长须老头的革命警惕性还蛮高的。再次无计可施,回校保卫科开证明。跑来跑去,一元钱稿费实得八毛,刻章花去两毛。不过,从现在起我可有了自己的印鉴。而且,班上一些同学共同分享了这笔稿费。有人分享的快乐,就是双倍的快乐;犹如有人分担的痛苦,就只有一半的痛苦。世事如弈。名利是最不可靠的东西,最容易被时光流水冲走,淡泊名利的人是大智者,值得珍藏的是青春的美丽。

有朋自远方来

西师的客人不少,与现在不同,在我们的学生时代,来客中政治家多于学者,这不难理解。贺龙^⑦是由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⑧和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

^⑤ 右派,在这里指1957年6月,乘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之机,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的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为此,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右派斗争,到1958年夏季反右派斗争结束。但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1978年,中共中央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全面复查,将错划的予以改正。

^⑥ 哪个晓得,“哪个”在重庆方言里有两种读音,一是读作“啷个”,二是读作“啷锅”,但它们都指向同一含义,作“怎么、怎样、为什么、干什么、做什么、想怎样”。晓得,即明白,知道。

^⑦ 贺龙(1896—1969),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原名贺文常,字云卿,湖南桑植人。他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斗争生涯中,为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建立了不朽功勋。

^⑧ 李井泉(1909—1989),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曾任中共川西区党委第一书记、川西行政公署主任兼军区政委,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语系的,注意不要说外语。”这是当时的规矩——在外事活动中,中方人员一律说本民族语言。在接见时,诺畏弗·白奇谈到了前一天的座谈会。他说,那个座谈会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雷锋很了不起,他也要学习雷锋。而且,他的爸爸就是英国的雷锋。

毕业前夕,班上来了一个远客,这是一位女同学的男朋友,唐山铁道学院(现西南交通大学)学生。面临毕业分配,全班都表示听从祖国召唤,将个人的困难放在第二位,不填具体志愿。这位女同学也不例外。当时有一首歌:

不是我不爱你呀,
亲爱的姑娘。
为了祖国到处都有春天,
要离开你呀到远方。

这一对朋友的关系相当密切。那位女同学有时要把男朋友的来信拿给我这个团支部书记看。中秋节,来信里画个月亮,生日,来信里画上两个心,这在

当时是够浪漫的。男朋友提出,要求她分在铁路沿线的城市。这个要求在今天看来完全合情合理。但那位女同学不答应:全班服从分配,我一个人提要求,合适吗?情急之中,那位男同学就从唐山跑来西师,全班男同学热情接待他的同时,开了个欢迎会。大家畅谈对毕业分配的想法。都是热血青年,客人呆不住了,站起来发言,说出他此行原来的打算,然后表示支持女朋友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教室发出热烈的掌声。为了张扬群体,要以牺牲个人为代价,这是当时的道德规范,应当说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道德规范,处在文化转型的今天反思,就觉得有些默然了。

(注:文章选自《缙云山下一支歌》(第一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文章标题有改动。)

(责任编辑 马云飞)



1960年西南师范学院院庆十周年活动²⁴

²⁴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1-1960-SX122-4。

走进兰州大学博物馆

□文/杜玫娟 整理编辑

编者按：1905年，清末甲午科状元张謇，创建南通博物苑，成为中国人自己创办的集自然、历史与艺术为一体的具有近现代意义的第一个综合性博物馆。自此，中国博物馆事业开始逐渐兴起和发展。高校博物馆是重要的专业教育、素质教育和科普教育基地，同时也是高校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目前，我国高校博物馆有108所，其中四川大学博物馆是成立最早的博物馆，以书画、陶瓷、美术雕刻以及民族文物、民俗文物方面收藏最有特色；北京大学塞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以收集考古各时期的典型标本的为主要特点；复旦大学博物馆珍藏了300余片弥足珍贵的甲骨文片，其高山族民俗文物藏量居大陆之最；中山大学生物博物馆馆藏大量珍稀动植物标本，包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熊猫、金丝猴等。与之相比，兰州大学博物馆则以其馆藏总类之丰富，数量之宏大著称。该馆馆藏各类藏品逾23万件，展出的藏品既有厚重的先秦葬器，精美的汉唐陶俑，也有数百万年乃至千万年的生物化石、西北独有的动植物标本。

博物馆是现代文明的产物，是人类学习、休闲的第二课堂。高校博物馆当然成为重要的文化教育、素质教育和科普教育基地，同时也是高校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兰州大学建校一百周年之际，兰州大学博物馆应运而生，其宗旨：一为传承兰大百年学脉，彰显名师巨擘之风采；二为展示“吾校百年收藏，虽敝帚而自珍”；三为典藏研究西北文物，保存

自然与人文基因。

西北的高山，没有浓郁的青翠遮体，浑然上下通



兰州大学博物馆外景

透着苍劲而有力的气息。苍山下的兰州大学博物馆，全馆建筑形似展翅高飞之苍鹰，视野高远，雄踞长空，庶可作“自强不息，独树一帜”校训之表征。博物馆种类丰富、数量宏大的馆藏文物再现了璀璨的丰富多彩的西北历史文明。现今，博物馆内各类馆藏物品逾 23 万件，不仅有厚重的先秦彝器等历史文物、远古时代的生物化石，还有珍贵的西北特有的动植物标本等。博物馆建筑面积 9600 平米，其中展厅面积近 5000 平米，内设六大展厅：兰州大学校史展、历史文物展、古生物化石展、动植物标本展、黄河古象厅及民俗厅。六大展区展出的物品各有特色与韵味，请读者随我们到各个展厅走走、看看。

校史展厅

兰州大学校史展厅位于博物馆内部，面积 1824 平米，内容再现了从 1909 到 2009 兰州大学百年走过的风雨历程。在戈壁大漠之中屡创奇迹，在长河落日之中延续梦想。创业先贤筚路蓝缕，在祖国腹地，发出了中华奋起的坚强呐喊。独立大漠，环瞰荒鄙，



兰州大学校史展厅



兰州大学校史展厅陈列图

没有安贫乐道之忧，则无以生；艰苦卓绝，锲而不舍，没有坚忍不拔之志，则无以立；志存高远，永不言败，无心忧天下之情，则无以续。

校史展展出了 1000 余件各类图片、出版物、奖状(牌)、手稿、教学仪器等物品，见证了兰州大学的发展与变迁历史，沉淀着具有丰富内涵的兰州大学精神：“扎根西部、心忧天下”的社会抱负，“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博大胸怀，“艰苦奋斗、自强不息、争创一流”的进取精神，“淡泊名利、爱国敬业、直面清贫、乐于奉献”的人格风范，“严谨笃学、崇尚学术、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与治学风范，“勤奋、求实、进取”的优良学风，“知行合一、服务社会”的价值取向，“勇于创新、独树一帜”的时代精神。

校史展内，“历史沿革”与“今日兰大”两个展厅，全面反映了 1909 年兰大建校至今百年的办学历程，从甘肃贡院到甘肃法政学堂，从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到兰州国立中山大学。充分展现了数代兰大人身居西北，胸怀天下的浑厚风骨。从辛树帜到江隆基，从顾颉刚到赵俪生，从李吉均到秦大河，兰州大学名人无数。浓郁的历史文化氛围之中，行进在展室，犹如在聆听一位百年老者正在将毕生的故事娓娓道来。

历史文物展厅

占地 518 平米历史文物展厅以展示陶器、青铜器、瓷器以及杂器四大类文物，共 500 余件。其中馆藏的精品有著名的青铜文物“马踏飞燕”，出自东汉时期的“马踏飞燕”又称为“马超龙雀”、“铜奔马”，其



青铜文物——马踏飞燕

形象矫健俊美,别具风姿。马昂首嘶鸣,躯干壮实而四肢修长,腿蹄轻捷,三足腾空、飞驰向前,一足踏龙雀。一匹躯体庞大的马踏在一只正疾驰的龙雀背上,小龙雀吃惊地回过头来观望,表现了骏马凌空飞腾、奔跑疾速的雄姿。其大胆的构思,浪漫的手法,给人以惊心动魄之感,令人叫绝。

出土于甘肃的汉代彩陶是历史文物厅展出的大亮点。甘肃彩陶素有彩陶之冠的美名。摩尔根说,陶器是人类文化的分界标志,中国的陶器文化源远流长。在中国各地的陶器文化中,只有甘肃彩陶堪称彩陶之首。甘肃彩陶,产生的时代最早,地域广大。甘肃



甘肃彩陶

东部渭河、西汉水流域是中国彩陶的发源地之一。在距今约 5000 年~4000 年间,中国各地的彩陶渐趋衰落,马家窑文化彩陶却独放异彩,在甘青地区形成了中国彩陶的鼎盛阶段,其艺术水平之高、文化成就之大,使其他彩陶文化均难以比肩。在距今约 4000 年以后,大部分地区的彩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甘青地区依然生存着一批坚持使用彩陶的先民,并进而将彩陶艺术向西传入新疆。除了光鲜的彩陶和厚重的先秦彝器,历史文物展厅还有精美的汉唐陶俑和清丽的各代瓷器,令人不由得发思古之忧思,欣然畅往。

古生物化石展厅

与历史文物厅面积同样大小的化石展厅以模拟地层及大型生态环境复原图为烘托,完整的展示了古生物化石骨架及模型,让人不由得产生了错觉,恍惚铲齿象、三趾马、大唇犀、萨摩兽、和政羊及鬮鬃狗等嬉戏其间,仿佛步入数百万年乃至数千万年前的远古动物园。

动植物标本展厅

兰州大学博物馆堪称汇聚了“西北独有的珍禽异兽”。除有古生物化石展厅以外,还专为动植物标本开设一展厅,且面积仅次于校史展厅达 1177 平米,展示各类动植物标本 1000 余件。展厅利用声光电多媒体与实物景观结合起来,真实复原了植物栖息的生态环境,充分展示了“两原两区”的区域性特色,融专业性、科学性及科普性于一体,使人观之可知自然之妙,生命之奇。

黄河古象厅

在众多的动物化石骨架中,举世闻名的黄河古象化石骨架单独陈列在面积 409 平米黄河古象厅。这具化石被命名“黄河象”,它身高 4 米,体长 8 米,象牙长达 2 米多,好像两把长剑,所以又叫剑齿象。剑齿象在几百万年前分布很广,在外国也发现过它



举世闻名的黄河古象

的化石。黄河象的骨骼化石,是全世界已经发现的剑齿象骨骼中个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具剑齿化石。在大型生态环境复原图及树石造景的衬托下,黄河古象仿佛在低声嘶鸣,健步前行。据考古学家推测,在300万年前,甘肃地区不像现在这样干燥,到处有河流和湖泊。有一天,一只剑齿象在河边饮水时,失足陷入泥潭之中,逐渐被泥沙掩埋,随着时间的推移,泥沙堆积的越来越厚,因而它的骨骼得以完整地保存。而经过复杂的地质演变,这一地区被抬升为高原,黄河象得以重见天日。

民俗厅

甘肃地处西北,有着辉煌的史前文化,文化发展呈现出不均衡性,然而正是这种不均衡的发展带来了民俗文化的繁荣与丰富。在兰州大学博物馆的民俗厅(面积409平米),展示了立足于西北文化特色的民俗风情。甘肃环县的皮影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也是民俗厅展出的亮点。皮影作为中华传统的一种艺术形式,曾有着辉煌过去,传承着深厚

的民族智慧和精神寄托。民俗厅展出的还有兰州大学老校长聂大江先生惠赠的傩面具,傩面具体现了东方独有的审美情趣和精神气韵。这两种抽象又具体的艺术形式,演绎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心灵轨迹,折射出中华民族文明的浩瀚博大。

寻觅着历史的足迹,兰州大学立


足于西部而独树一帜;传承着华夏文明,兰州大学不为艰辛而自强不息。兰州大学走过了百年办学历程,总结百年办学经验,系统分析现实状况,思考未来发展策略,“立足两原两区,实施西进战略”是推动学校科学发展、建设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综合性、研究型、国际知名高水平大学的重要方略。其中“两原”即指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两区”指西部地区和中亚地区。提出这一战略构想,是基于其百年办学历程的基本经验,建设优势特色学科、取得重要突破的重点领域带来的重要启示,是面向未来、建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大学的战略选择。其博物馆自2009年建成并开放以来,吸引了无数参观者前往观摩,其发展当如“既始发轫,自当勇猛精进,增藏品,美陈设,俾可使观众徜徉其间,有所得,有所悟,有所乐”。

(资料来自兰州大学博物馆)

(责任编辑 张小兰)

每一张照片，都在讲述一个动人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会唤起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记忆。《西南大学记忆》作为一本记述历史的杂志，我们想达成这样的野心：提供一份镌刻在史册上的视觉记忆。那些被定格在镜头中的历史，那些史无前例的年代，将通过《影像记忆》栏目为您倾情呈现。

学生塘

文/王贤 牟乔雅 整理编辑



编者按：1957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为主题，以及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西南农学院的整风运动，经过大鸣大放，反右斗争后即进入整风运动的第三阶段——着重整改阶段^①。西南农学院的整改工作之一就是精简机构，下放人员，参加体力劳动^②。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的影像资料中，关于学生塘的一组老照片，正是记述了当时这段历史史实。

^① 《西南农学院整风运动总结报告》。见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1958-TQ-3，第53页。

^② 《西南农学院整风运动总结报告》。见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1958-TQ-3，第55页。



1958 年春,学院党委批准和组织部分教师、干部、学生下放农村参加体力劳动。与此同时,又组织未下放的全部学生和部分教职工根据重庆市关于寒假组织学生兴修水利支援农村的通知精神^③,于 2 月 4 日开始在北碚东阳乡先锋公社修建一口面积 9.5 亩,可蓄水 12000 吨,能灌溉田土 372 亩的堰塘。



同学们在拖稀泥^④



西南农学院党委书记李兰(前右二)看望修塘师生^⑤

接到命令后,同学们十分兴奋,立即掀起了挑战、应战、写保证书的决心。同学们还纷纷赶制撮箕、担钩和扁担。在工作中,全体师生积极热情的投入劳动,贯彻了“不怕冷、不怕累”的战斗口号。不论男女,同学们的双腿都要浸没在冰凉的稀泥里工作;手脚擦伤仍要坚持工作;规定休息 15 分钟,只休息几分钟后马上又开始工作;他们甚至还发出“请战书”要求展开夜间战斗。

^③ 西南农业大学校史编纂委员会,西南农业大学史稿(1950-1984),第 68 页,1990 年 11 月 1 日。

^④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6。

^⑤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6。

在紧张的劳动中,同学们也不忘苦中作乐。修塘筑堤时,需要打夯,大家就自编一些与当时的时事及美好生活向往有关的打夯词。



同学们唱着自编的夯歌奋力打夯^⑥

修学生塘筑堰塘堤坎时,要打夯,每个夯是4个人抬着一齐操作,必须喊号子才能使4个人的动作和用力整齐一致,形成合力;喊号子也是鼓劲加油的好办法。开始时,大家都不习惯,喊不出声来,但不喊是打不了夯的,很快大家便喊起来了。

这种打夯号子都是打夯者即兴自编的,一人领唱,大家齐呼应。待大家会喊号子后,便随心所欲了。正儿八经的夯词不少,如:



(领)同学们啊,(众)咳呀着!

(领)大跃进啊,(众)咳呀着!

(领)加油干啊,(众)咳呀着!

(领)修好塘啊,(众)咳呀着!

(领)多打粮啊,(众)咳呀着!

临近下班肚子饿了时,便有逗人开心的打夯词了:

(领)同学们啊,(众)咳呀着!

(领)加油干啊,(众)咳呀着!

(领)快收工啊,(众)咳呀着!

(领)肥沱沱啊,(众)咳呀着!

(领)吃下去啊,(众)咳呀着!

(领)力气大啊,(众)咳呀着!

(领)夯得实啊,(众)咳呀着!

(领)好关水啊,(众)咳呀着!

曾参加修塘的农学系 1956 级学生刘启鑫^⑦
回忆记述当年修塘时自编自唱的打夯词

^⑥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6。

^⑦ 刘启鑫,男,教授。1960年毕业于原西南农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工作期间,曾主持过多项科研项目,如“油菜新品种选育”、“油菜新品种栽培特性研究”等。见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3-TX0607-050。



“学生塘”完工纪念照^⑧



师生修塘归来^⑩

原计划半月左右修好的堰塘，师生们用9天的时间宣告完成。先锋公社管理委员会为了感谢师生的辛勤劳动，决定将修好的大塘命名为“学生塘”，在庆祝完工的联欢会上还给修塘师生献了一面锦旗^⑨。

(责任编辑 李亚勃)

^⑧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1。

^⑨ 西南农学院院刊1958年,第58期,第3版。

^⑩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6。